

下面顯示的作者使用了美國提供的聯邦資金司法部並準備了以下最終報告：
文件名：最終技術報告草稿：評估警察使用武力政策和結果

目錄

執行摘要	一世
第一章	
介紹.....	1
文獻評論.....	4
文獻中的差距.....	8
第 2 章	
項目概況.....	10
研究目標和目的.....	10
研究設計.....	11
第 3 章	
第一階段.....	12
目的.....	12
方法.....	12
採樣框.....	12
樣品選擇.....	13
調查分佈和響應.....	14
分析和發現.....	15
連續體設計.....	15
戰術放置.....	17
摘要.....	32
第 4 章	
第二階段.....	35
目的.....	35
方法.....	35
代理商資格和選擇.....	36
數據採集.....	38
代理商比較.....	40
政策說明.....	42
哥倫布.....	42
夏洛特-梅克倫堡.....	43
波特蘭.....	44
阿爾伯克基.....	45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46
聖彼得堡.....	47
韋恩堡.....	48
諾克斯維爾.....	49
數據元素.....	56
第 5 章	
巡邏人員調查數據.....	58

方法.....	58
調查人口.....	58
調查協議.....	59
調查回復率.....	62
分析和發現.....	64
更少的致命武力政策認識.....	64
摘要.....	68
減少致命力政策的結果.....	69
摘要.....	73
培訓和減少致命力政策.....	74
摘要.....	79
背景和人口統計.....	80
摘要.....	90
第 6 章	
強制報告數據.....	91
方法.....	91
分析和發現.....	94
通過工作量測度得出的力的頻率.....	94
力和阻力類型.....	96
雙變量分析.....	107
摘要.....	127
多元分析.....	127
摘要.....	134
可疑傷害和武力.....	135
軍官受傷與武力.....	139
第 7 章	
公民投訴數據.....	145
方法.....	145
分析和發現.....	147
投訴頻率.....	147
摘要.....	149
處理投訴.....	151
摘要.....	154
紀律處分.....	155
摘要.....	161
通過工作量措施進行投訴的頻率.....	161
摘要.....	166
武力和警惕幹事的總數.....	167
摘要.....	170

多元分析.....	170
摘要.....	171
第 8 章	
民事訴訟數據.....	174
方法.....	174
分析和發現.....	175
摘要.....	179
第九章	
項目摘要調查結果.....	180
第一階段.....	180
強制連續體策略.....	180
第二階段.....	181
巡邏人員調查數據.....	181
更少的致命武力政策認識.....	182
182	
減少致命力政策的結果.....	186
186	
培訓和減少致命力政策.....	188
188	
摘要.....	191
強制報告數據.....	192
報告的總幹事使用情況	
犯罪和逮捕.....	192
總幹事部隊.....	194
總體可疑抵抗力.....	194
相對於阻力的力... ..	196
力和阻力比較.....	198
可疑傷害和武力.....	199
軍官受傷與武力.....	200
摘要.....	202
公民投訴數據.....	203
投訴頻率.....	203
處理投訴.....	206
投訴的紀律處分.....	206
有關服務請求，舉報的犯罪，逮捕， 和力量.....	207
武力和警惕幹事的總數.....	208
多元分析.....	210
摘要.....	211
民事訴訟數據.....	212
和解或敗訴的與部隊有關的訴訟數量.....	213
與部隊有關的訴訟的金錢支付.....	213

摘要.....	213
第 10 章	
討論.....	214
警察管理員.....	214
官員關注.....	216
公民問題.....	217
總體部門關注.....	218
警察研究員.....	219
學習挑戰.....	219
學習限制.....	221
未來研究.....	224
參考資料	226
附錄	231

執行摘要

儘管在警務文獻中經常討論武力連續性政策，無論學者還是從業者，對於多少機構實際使用連續統一體。此外，在兩個連續體設計中都存在潛在的變化（例如，線性，矩陣，輪等）和戰術放置（例如 OC 噴霧，CED 等），關於連續性政策中的差異是否重要，如果有，以什麼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該項目設定了兩個單獨但相互關聯的目標：確定使用範圍的變化程度強制全國各地的警察機構使用政策，並確定是否某些類型的政策為警務人員提供了更有利的結果。陳述更多直接地，該項目試圖（1）確定使用武力政策的現有差異，特別是那些採用強制連續方法的企業，以及（2）確定提供哪些類型的政策對警察從業者更有利的結果，以哪些政策不一：（a）向軍官提供有關武力的協助和指導（b）與較少的武力（即數量和類型）相關的傷害犯罪嫌疑人和官員，公民投訴和因不當武力而提起的訴訟。去完成這些目標將項目分為兩個主要階段。

階段 1

在初始階段，我們對分層的隨機警察樣本進行了郵件調查根據代理機構的規模（即宣誓就職的官員）和類型（即市政，警長）。該調查的目的是破譯現有的武力政策類型。該調查的關鍵要素反映了一個機構是否有關於非致命武力的書面政策，在其政策，所用連續體的形式或類型中採用了強制連續體方法，在連續性框架內放置各種策略，並進行報告和審查機制。有關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第 3 章。

主要發現

<超過 80% 的應急機構使用某種類型的部隊連續統政策：

<其中 73% 依賴線性設計，其次是矩陣/盒子設計和圓/輪設計各佔 10%。

<關於部隊戰術的戰術佈置（軟手，疼痛合規控制，硬手）和武器（警棍，化學噴霧劑，CED），以及警察機構如何根據進步程度對這種次序進行排序，關鍵發現存在的變化量：

<就力級數而言，總共有 123 種不同的排列未發現，範圍從三到九個不同級別（82.0% 依賴五個或六個級別）。

<就公民抵抗的進展而言，共有 23 種排列被發現的範圍從三到七個不同的水平（92.4%，取決於五個或六個級別）。

<對於使用部隊連續統並向官員提供明確信息的部門針對不同類型的力量最合適的力量類型指南抵抗（即，將公民抵抗武力聯繫起來），很難確定通常使用的首選項：

<最常使用的方法只有 20%部門，而第二和第三最常用的方法僅是 10%的一半。

<化學噴霧劑和 CED 的放置為警察管理人員在部隊連續區內的正確位置：

大約有 30%的代理商使用化學噴霧劑時會感到疼痛合規技術，另外 30%的部門化學噴霧劑採用硬手策略，並且超過三分之一機構使用撞擊武器噴灑化學噴霧。

<與化學噴霧相比，它的變化較小關於 CED 的位置，但遠未達成明確共識。近百分之 60 幾的機構將 CED 置於衝擊武器級別，而另有 2.0%的人將其與致命武力一起放置。剩餘的機構將 CED 置於某種程度的強製作用下（機構將 CED 與空手戰術保持在同一水平，另有 13.1%的 CED 採用疼痛順應技術放置）。

摘要

總體而言，鑑於文獻中最近的討論，這些發現很有趣關於力連續性的潛在負面影響，尤其是線性設計（參見 Aveni, 2003； Peters and Brave, 2006； Petrowski, 2002； Williams, 2002）。進一步來說，一些人反對在許多方面使用武力連續性，例如妨礙決策，對責任問題的恐懼，並且比法律更具限制性。但是，從這裡顯示的結果可以明顯看出，絕大多數警察機構確實將強制連續性納入其政策中（80%），首選模型是設計線性（73%）。此外，很難確定警察使用的標準做法全國各地的部門。儘管某些部門在允許軍官僅對積極進取的嫌疑犯使用更嚴厲的武力機構是相當自由的，通過允許他們使用幾乎所有類型的力量來抵抗幾乎所有類型的抵抗不平衡（例如允許對合規嫌疑犯進行指揮棒攻擊）。最常見的方法是只有 20%的部門使用，而第二和第三最常用方法只是 10%的一半。從本質上講，實際上並沒有使用“普通”就部隊連續性政策而言（即，各種形式的應對各種形式的嫌疑人抵抗動手並放置武器）。部門通過多種方式進行選擇和調整，然後進行調整-不幸的是，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哪種方法最好甚至更好。

階段 2

根據代理商調查的結果，選擇了 8 家代理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勘探是該項目第二階段的一部分（俄亥俄州哥倫布，夏洛特-梅克倫堡，NC，波特蘭或俄勒岡州，阿爾伯克基，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科羅拉多州，聖彼得堡，佛羅里達州，韋恩堡，IN，以及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代理商的選擇基於確保以下方面的適當差異不同的政策類型，但根據司法管轄區規模，犯罪率，工作量和社會經濟地位。與警察管理員達成協議後，研究團隊在每個機構的兩年中進行了多次現場訪問。數據蒐集的內容包括對巡邏人員進行調查，以評估他們對保護區影響的看法。該機構的決策力政策。此外，使用武力，公民投訴和民事訴訟數據以及隨附的信息來源（例如組織結構圖，名冊，規則和規章手冊，所報告的犯罪數量，逮捕，求職電話）是追溯收集 24 個月。此外，進行了一系列非正式訪談與中高層管理人員一起。總而言之，這些數據源作為本報告中提出的分析和發現的基礎。有關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第 4 章到第 9 章

主要發現

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不同政策方法的差異程度（例如，戰術部署各種形式的基於物理和武器的武力，以及公民如何在這八項政策的每一項中，抵抗力是否與強制選擇權相關聯）。兩個部門（即哥倫布和韋恩堡）僅提供部隊晉升級別-沒有與公民抵抗的明確聯繫。但是，這些機構在部隊戰術上仍存在差異放置。例如，哥倫布呼籲軍官使用柔和的手/疼痛的合規性，其次是化學噴霧，CED，然後是硬手，分別處於不同的水平。堡韋恩的方法稍有改變。首先，將化學噴霧劑與軟噴霧劑置於同一水平手和疼痛的依從性，而不是其自身水平。其次，CED 受到了影響武器等級，這是在硬手之後而不是之前。六個機構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將兵力選擇與不同級別的公民聯繫在一起抵抗性。再一次，變化的程度是顯而易見的。夏洛特-梅克倫堡地方化學噴霧劑，硬手和 CED 處於不同水平，而阿爾伯克基放置所有這些相同力量水平上的力量類型（以及柔和的手法和疼痛順從性）。然而，當將公民抵抗力納入方程式時，它將變得更加複雜。在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

化學噴霧劑具有防禦力，而衝擊力 CED 的使用需要更多的防禦防禦能力。相比之下，Albuquerque 允許手軟硬地，順從疼痛，化學噴霧和 CED 力在口頭和防禦上抵抗嫌疑犯，為主動抵抗的嫌犯保留衝擊力。政策中也有其他變化。波特蘭放置化學噴霧劑，CED 在反對防禦性公民抵抗的連續統一體中間，而聖彼得堡在致命武力出擊之前將 CED 放置在連續體頂部附近積極的抵抗。諾克斯維爾指示軍官在口頭上使用柔軟的手和疼痛合規性和被動抵抗者，然後所有其他力量都對防禦性和主動抵抗者致命。

也許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發現了一種更有趣的代理方法。相對於線性類型的模型，使用車輪的原因之一是官員不要以階梯或分步格式考慮力的變化。實際上，他們的車輪設計甚至可以確保沒有明顯的力行進（例如，致命力放在旁邊一側是化學製劑，另一側是軟控制技術）。但是，在公民抵抗政策的文本以漸進格式列出，並與適當的力量選擇。下面我們簡要介紹每個代理機構模型，然後提供主要發現根據機構根據七個結果相互比較得出的結果（請參見並在第 9 章中對許多其他發現進行了匯總排名）。

- 1.與工作量因素（例如，要求服務，逮捕，報告犯罪）。
- 2.軍官使用武力的程度與他們遇到的抵抗成正比：
- 3.強迫性相遇中公民受傷的程度。
- 4.武力相遇時軍官受傷的程度。^{1個}
- 5.一級官員對他們機構的看法有多好效用方面的政策（即協助，明確，指導，限制，公平）。
- 6.一線官員對他們機構的看法有多好戰前和在役部隊培訓方面的政策。
- 7.公民對有關不當武力/不道德行為的投訴的程度宣誓人員/工作量。

哥倫布

哥倫布採用了線性設計，稱為對阻力的動作響應/侵略（使用武力）模型，它沒有以圖形方式描繪出一個力連續體，而是只需佈置八種力水平（軟手，化學噴霧劑，電子設備，硬手，撞擊武器，犬類，較少的致命彈藥，致命的武器（另請參閱附錄 B 和機構政策）第 4 章中的說明）。

更多積極成果²

- <哥倫布軍官相對於公民抵抗使用的武力最少。
- <哥倫布的軍官受傷率最低。
- <哥倫布的公民傷害數量排名第二。
- <哥倫布軍官報告稱其在部隊訓練中的滿意度第二高。
- <哥倫布官員報告了在政策效用方面的第四高滿意度。

積極結果較少

- <哥倫布市民因不當行為而投訴率第二高力/粘性。
- <就工作量而言，哥倫布的武力率排名第三。

夏洛特 - 梅克倫堡

夏洛特-梅克倫堡使用線性設計，儘管他們的政策指令專門針對指出，“它不是設計成逐步進行的。”以圖形方式描繪的模型公民以線性方式抵抗的六個層次（合作，口頭和非口頭，被動，位於上方第 43 頁的水平軸上的防禦性，主動進攻性，加重主動性）另一個水平軸，以線性方式描繪了七個水平的力（專業存在和口頭對話和命令，柔軟的手，化學噴霧，堅硬的手，傳導的能量裝置，撞擊武器和致命力量）。這些強制選項，在水平方向上描繪軸也垂直移動。此外，兩者之間沒有完全重疊抵抗和武力選擇（例如，可以在防禦和防禦之間使用硬手主動抵抗）（另請參閱附錄 B 和第 4 章中的代理商政策說明）。

更多積極的結果

- <相對於工作量。

<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公民投訴率排名第三力/粘性不當。
<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軍官報告的滿意率排名第四力量訓練。
積極結果較少

<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公民傷害最高。
<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軍官受傷率第二高。
<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軍官使用的相對數量排名第四對公民的抵抗。
<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軍官報告的滿意率排名第四政策實用程序。

波特蘭

波特蘭採用線性力連續體設計，佈局並鏈接了公民抵抗力選項。該模型描述了公民抵抗的七個級別（但沒有圖形格式）以線性方式（順從，順從/語言，被動，物理，物理）進攻，身體進攻，武裝，致命）在右側，七級力量中間欄中以線性方式顯示的選項（官員在場，口頭髮言，控制權持有，化學噴霧和泰瑟槍，警棍和打擊/踢球，較少的致命彈藥，槍支），具有五個力量等級列在左欄中（狀態，語言，物理控制，彈藥，致命）（請參閱以及附錄 B 和第 4 章中的代理商政策說明）。

更多積極的結果

<波特蘭軍官受傷率第二低。
積極結果較少
<相對於公民抵抗，波特蘭警官使用的武力最高。
<就工作量而言，波特蘭的第二高比率。
<波特蘭官員報告說，在政策效用方面滿意度第二低。
<波特蘭的受傷人數排名第四。
<波特蘭軍官在部隊訓練中的滿意度最低，位居第四。
<波特蘭市民因不當行為而投訴的比率排名第四（並列）力/粘性。

阿爾伯克基

Albuquerque 採用線性力連續設計（稱為無功控制）模型或 RCM），將公民抵抗與武力選擇結合起來。這個模型以線性方式圖形化地描繪了四個級別的公民抵抗（合作，非合作，無武裝襲擊者，武裝襲擊者）水平軸以線性方式描述四個級別的力（警報，控制，活動，生存）。在四個主要級別的每個級別中，列出了特定的類型（例如，在活動狀態下，它指示軍官考慮從口頭命令到使用中間武器的任何事物）（請參閱以及附錄 B 和第 4 章中的代理商政策說明）。

更多積極的結果

<阿布奎基軍官報告政策滿意度第二高效用。
<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市民因不當行為而投訴的比率第二低力/粘性。
<阿爾伯克基的受傷人數排名第三。
<阿布奎基軍官報告說，在部隊訓練中滿意度第三高。
<就工作量而言，阿爾伯克基的第四位的命中率最低。

積極結果較少

<阿布奎基軍官使用的武力是公民的第三高抵抗性。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依賴於“情勢模型”（Situational Force Model）（也稱為“車輪”模型作為其連續力的一種手段。該模型以圖形方式描繪了一名軍官站成一個圓圈，周圍有各種力量選擇。力量選項以隨機順序放置，以指示沒有自然的力進行（例如，致命的力量放在軟手戰術旁邊）。沒有公民的圖形描述在不同類型的阻力下，哪種力最合適（儘管政策說明/文本確實在某

種程度上建立了聯繫，從而表明了某種程度儘管採用了循環模型方法，但線性進度的變化）（另請參見附錄 B 和代理第 4 章中的策略描述）。

更多積極的結果

<相對於工作負載，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受利率最低。

<相對於公民抵抗。

積極結果較少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民對不當行為的投訴率最高力/粘性。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報告了最低的（平局）滿意率訓練。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受傷人數排名第三。

<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官員報告政策滿意度第三低效用。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受傷率排名第三。

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依靠對抵抗（使用武力）的反應矩陣。這個模型在垂直軸上以線性方式圖形化地描繪了六個級別的公民抵抗（存在，言語，被動身體，主動身體，攻擊性身體，加重身體），其中六個在水平軸上以線性方式顯示力級別選項（軍官存在，交流，物理控制，中間武器，無能的控制，致命的力量）。合適的然後，通過複選框中的複選標記將力量類型鏈接到各種抵抗類型（例如，如果公民表現出侵略性的物理抵抗力，辦公室可以使用最多的喪失控制力的能力（請參閱以及附錄 B 和第 4 章中的代理商政策說明）。

更多積極的結果

<聖彼得堡的公民傷害最低。

<聖彼得堡市民對不當行為的投訴率最低力/粘性。

<聖彼得堡軍官使用的武力是公民的第三低抵抗性。

<聖彼得堡的軍官受傷率第三低。積極結果較少

<聖彼得堡官員報告說，政策效用最低。

<聖彼得堡軍官報告說，部隊訓練的滿意度最低（並列）。

<相對於工作量，聖彼得堡的第四大武力。

韋恩堡

韋恩堡採用線性設計，儘管該模型沒有以圖形方式描繪出力連續體，而是簡單地以線性方式佈置六個級別的力（軍官在場，口頭，軟手，硬手，中間武器，致命），然後部分識別出通過敘述/文本的抵制（另見附錄 B 和第 4 章中的代理政策描述）。

更多積極的結果

<韋恩堡軍官報告了在政策效用方面的第三高滿意度。

<韋恩堡受傷人數第四低。

<韋恩堡（Fort Wayne）受傷的人員數量排名第四。

積極結果較少

<韋恩堡（Fort Wayne）承受的工作量最高。

<韋恩堡軍官使用的相對於公民而言第二高的武力抵抗性。

<韋恩堡軍官報告說，部隊訓練的滿意度第三低。

<韋恩堡（Fort Wayne）因不當行為而受到市民投訴的比例排名第四（並列）

力/粘性。

諾克斯維爾

諾克斯維爾的政策以線性方式圖形化地描繪了公民抵抗的五個層次垂直（順從，被動，主動，攻擊和攻擊/致命）連續體，在垂直方向上，在垂直方向上具有五個線性作用力選項連續體（軍官存在，空手軟/警棍軟，順從技術，防守守法技巧，致命的力量），在場景中間垂直放置五個情境連續體（戰略，戰術，動盪，有害，致命）（另請參閱附錄 B 和代理政策第 4 章中的說明）。

更多積極的結果

- <諾克斯維爾官員報告說，政策效用的滿意度最高。
- <諾克斯維爾軍官報告說，部隊訓練的滿意度最高。
- <諾克斯維爾軍官相對於公民使用第二少的武力抵抗性。
- <諾克斯維爾相對於工作量而言具有第三低的武力率。
- <諾克斯維爾市民因不當行為的投訴率排名第四低力/粘性。

積極結果較少

- <諾克斯維爾的軍官受傷率最高。
- <諾克斯維爾的受傷人數排名第二。

最高排名

對於那些對哪些機構在考慮不同的結果，我們在排名的頂部和底部列出了那些代理商：

1. 與工作量因素（例如，要求服務，逮捕，報告的犯罪）：

最佳政策：

1.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2. 夏洛特-梅克倫堡

最差的政策：

1. 韋恩堡
2. 波特蘭

2. 軍官使用武力的程度與他們遇到的抵抗成正比：

最佳政策：

1. 哥倫布
2. 諾克斯維爾

最差的政策：

1. 波特蘭
2. 韋恩堡

3. 公民在強行相遇中受傷的程度：

最佳政策：

1. 聖彼得堡
2. 哥倫布

最差的政策：

1. 夏洛特-梅克倫堡
2. 諾克斯維爾

4. 軍官在激烈遭遇中受傷的程度：

最佳政策：

1. 哥倫布
2. 波特蘭

最差的政策：

1. 諾克斯維爾

2.夏洛特-梅克倫堡

4a。公民和官員受傷的程度，平衡公民和官員就更高和更低的傷害而言）：

最佳政策：

- 1.哥倫布
- 2.聖彼得堡

最差的政策：

- 1.諾克斯維爾
- 2.夏洛特-梅克倫堡

4b。軍官使用武力的程度與他們遇到的抵抗力成正比，同時還考慮了公民和官員受傷的程度：

最佳政策：

- 1.哥倫布
- 2.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最差的政策：

- 1.韋恩堡
- 2 領帶 波特蘭
- 2 領帶 夏洛特 - 梅克倫堡

5.直屬級別的官員對其代理機構的政策持積極態度的程度效用條款（即協助，明確，指導，限制，公平）：

最佳政策：

- 1.諾克斯維爾
- 2.阿爾伯克基

最差的政策：

- 1.聖彼得堡
- 2.波特蘭

6.直屬級別的官員對其代理機構的政策持積極態度的程度職前和在職訓練的條件：

最佳政策：

- 1.諾克斯維爾
- 2.哥倫布

最差的政策：

-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 2.聖彼得堡

7.公民在何種程度上針對不當使用武力/不道德行為提出申訴宣誓人員/工作量：

最佳政策：

- 1.聖彼得堡
- 2.阿爾伯克基

最差的政策：

-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 2.哥倫布

摘要

就像讀完這份執行摘要（以及最終報告的 200 多頁）一樣

無疑，就像我們自己一樣，可能會有一種失望感。理想情況下，一個人想走路遠離這項研究，知道哪種使用武力策略是最好的，哪種使用策略是最好的應避免一項或多項政策。不幸的是，採取的經

驗方法（即檢查多個結果）也可能是最大的方法弱點。因此，我們不能一致贊成或譴責一種武力政策另一個。

從進行的許多分析和排名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沒有針對所有結果的理想（或有缺陷的）政策方法。好消息是我們提供在許多重要的警察結果中各種優勢和劣勢的經驗證據。我們將其留給警察高管來考慮與他們最重要或最相關的結果及其組成部分，並查看哪些政策方法在這些方法中表現更好尊重。僅舉一個例子，如果希望減輕公民的傷害和抱怨，首要的警務問題，聖彼得堡的方法可能值得考慮。但是，有還應意識到軍官們通常不認為聖彼得堡的政策有利光。因此，“警察”警察領導人可能會優先考慮與警官有關的問題，並予以開除聖彼得堡的政策，而是認可諾克斯維爾的做法，該做法獲得了出色的認可巡邏人員的反饋（無論諾克斯維爾巡邏人員是否受傷以所有城市中最高的比率）。其他任何例子也可以給出城市。最後，必須權衡每種政策方法的利弊反對各種理想的（或不良的）結果。當然，讀者也必須謹慎解釋本摘要和整個報告中提出的發現。雖然這是作為一名精明的審閱者，迄今為止進行的最全面，最不致命的武力研究準確指出-關於變化的程度，我們才剛剛開始摸索政策類型可能會影響不同類型的結果。

第 1 章

介紹

社會允許警察在執行職務時使用武力。與此同時，設定了限制條件，定義了警察在維持能力方面可以行使的強制性程度秩序和執行法律。這種限制具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第一莖由美國最高法院通過 *Graham 訴 Connor 案*，490 US 86（1989）提出，鑑於每個人的所有事實和情況，被捕時必須“...客觀上合理”特定案件...儘管來自高等法院的指示，但“客觀地確定武力”合理”並非易事（Terrill 和 Paoline，2010 年）。結果，警察部門依靠在第二部分，使用武力政策，建立適用於武力的參數並就可能被認為適當的武力向軍官提供更明確的指導。³在這種情況下，此類政策有時與強制連續性聯繫在一起（Terrill，2001）。⁴一標準部隊連續體政策通常以不同的等級對部隊和抵抗力進行排名的嚴重性，其明確目的是向軍官提供如何應對具體情況的指導抵抗的形式。因此，強制連續性政策試圖更容易地闡明可能是什麼。被認為是客觀合理的力量。多年來，結合了力連續性概念的幾種變體被提出。最早的線性設計之一是以梯形圖或分級步驟。McEwen 認為，這種“連續譜方法”首先要依靠該官員在場以平息局勢，如果失敗，則轉變為越來越嚴厲的類型（1997：p。49）。另一類連續體結構通常稱為修改後的線性設計，將主體抵抗力置於多個級別之一，並且為升級（和降級）顯示在每個級別中（請參見 Connor，1991）。其他設計以矩陣形式佈置或用輪子描繪（請參見 Hoffman 等，2004）。在矩陣中的方法，沿著不同的警察排成一排呈現各種形式的可疑抵抗響應在水平軸上提供。車輪設計通常由一系列同心圓，以局勢為核心，然後是中間嫌疑人圈抵抗行為，然後是一個外圈，顯示出各種適當的警察形式給出阻力的類型。不管特定機構採用什麼連續體選擇使用（如果有的話）在連續體結構內放置不同形式的力可以變化。儘管在警務文獻中經常討論武力連續性政策，

無論學者還是從業者，對於多少機構實際使用某種連續體，如果是的話，是什麼類型的連續體（例如，線性，車輪等）。也許更多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或產生了明顯的有益結果未知。部隊連續性政策實際上指導軍官使用部隊嗎？做一個連續性政策可提高軍官對嫌疑人的控制水平？有什麼影響關於武警人員使用，傷害，公民投訴和警察行為不當提起訴訟？如上所述，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的事實是，沒有理想或研究人員或從業人員通常接受的武力等級（美國政府官員，2005 年）。

a 一個部門的連續性策略可以與另一個部門的策略完全不同部。一些機構採用了更線性的力連續類型，而其他機構則選擇了輪式設計。一些部門具有非特定類型的政策，通過這些政策，強制和

抵抗力僅用模糊的術語來表示，而沒有歸類為特定級別，而其他人則提供了非常詳細的政策，列出了許多層次的武力和抵抗力。與此相關的是，應將特定類型的非致命技術放在何處放在連續標度上。例如，某些部門放置了傳導能量設備（CED），諸如 TASER A® 低的連續體（例如，口頭方向後右），而其他部門則將其置於連續規模上（例如，在致命武力之前）（美國高（2005））。因此，一些機構將 CED 的使用視為更多的“第一手段”，而其他機構鼓勵將 CED 用作“萬不得已”，儘管沒有經驗證據指示使用哪種方法的頻率更高。為了使水更渾濁，還存在關於是否使用武力的爭論。連續性政策實際上有助於或阻礙決策。顯然有支持從業者的連續性政策（Rogers，2001），但這種支持並未得到普遍共享。例如，彼得羅夫斯基（Petrowski，2002：第 1 頁）指出：“[強制]連續體意圖提供一個警官應進行主觀威脅評估時的機械應用”（另請參見 Aveni，2003 年； Peters and Brave，2006 年； Williams，2002 年）。因此，雖然一些警察機構可能將強制連續性方法納入其政策中，關於這種方法是否確實有助於增強官員的決策能力。鑑於警察機構採用的政策方法不同，再加上缺乏關於有效性的知識，本研究調查了使用差異的程度全國警察機構正在使用的武力政策，以及某些類型政策為警察從業者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包括不同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向軍官提供了有關武力的協助和指導決策，以及不同類型的政策方法與數量/類型之間的聯繫使用的武力以及傷害率（嫌疑犯和軍官），公民投訴和訴訟因不當用力而徵收。簡而言之，我們試圖確定某些類型的政策是否有考慮多種因素時更好。最後，我們相信對任何特定策略或致死以下技術（例如，TASER A®）除了的更廣泛的應用不同策略類型中的此類策略不必要地限制了潛在的洞察力。這是合併具有不同策略的不同政策類型，其中包括致命性較低的技術對於政策制定者和從業者而言，是最有潛力和最終有用的信息。

文獻評論

儘管部隊統籌政策是專門為軍官提供指導的為了以適當的程度控制犯罪嫌疑人，以前的研究通常忽略了這個研究領域，並且沒有已知的研究專門調查是否類型的連續性策略比其他策略更有效。⁵ 文獻綜述展示了關於力連續體之間相互作用的了解很少政策方針和切實成果。涉及力概念的研究與本研究最相關的連續體框架可以分解為兩個廣泛的領域，下面簡要介紹。⁶ 研究的一個領域集中於針對部隊的特定部隊戰術的影響連續尺度。這些研究通常對某些策略的效果最為感興趣（例如，喪失能力和受傷率）。化學刺激性噴霧劑，例如油樹脂辣椒（OC）可能受到最多的詢問（參見 Kaminski 等人，1999）。在一般而言，有相當多的協議認為 OC 噴霧劑可提供中度到高度的喪失工作能力，對長期傷害的關注較低；但是，有一些關於是否應使用 OC 噴霧劑應對口頭抵抗的辯論（請參閱 Adang 和 Mensink，2004 年，以及 Smith 和 Alpert，2000 年）。更現代的關注點圍繞使用另一種技術-CED（例如，TASER A®）。關於 CED 的有效性方面的證據（即高度控制，低傷害），目前正在出現。一些報告說明了有害影響。例如，大赦國際（2004 年）報告說，在被捕之後的前三年中有 74 人死亡。由 TASER 震驚 A®。其他研究的結果報告了一些有益的結果與 CED 使用相關。例如，史密斯（Smith）和同事（2007）在兩個方面研究了 CED 的使用機構及其對嫌疑犯和軍官受傷的影響。在兩個機構之一中 CED 減少了軍官和嫌疑人的受傷次數，並減少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二機構中，使用 CED 對受傷沒有影響，儘管有趣的是胡椒噴霧了。總體而言，除了研究 OC 噴霧的影響外，還有更多關於 CED 的工作有限，其他類型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很高的證據控制和低傷害，包括物理控制形式（例如，疼痛順應技術，武術形式）和中等或致命性較低的武器（例如警棍，胡椒丸，豆袋）具有一直缺乏。⁷

第二個研究領域更多地關注力連續性的基本原理政策，而不是連續統中某些類型策略的有效性結構（例如化學刺激性噴霧劑的有效性）。例如，1997 年，Alpert 和鄧納姆（Dunham）建議使用“力量因素”評分（減去最高的抵抗力水平）從警察可疑的個人遭遇中的最高武力）來評估相對與公民抵抗有關的武力程度。將此方法與官方數據一起應用來自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市和俄勒岡州尤金市/斯

普林菲爾德市的警察部門研究人員發現，邁阿密戴德（Miami-Dade）的官員使用的武力少於面對的抵抗程度，與尤金/斯普林菲爾德的軍官相比，他們使用的武力多於抵抗力面對（平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模式反映瞭如何指示人員並受過使用武力的訓練。這樣的發現提供了部門的初步證據。政策環境可能會影響警察使用武力的行為。另外，這個這項工作證明瞭如何比較機構與武力的關係，儘管範圍有限時尚（即只有兩個部門）。利用來自警區的項目（POPN）研究中的觀測數據印第安納波利斯和聖彼得堡，特里爾（2001，2003，2005），在通過評估不僅可疑抵抗和警察的最高水平的力量因素分數的想法在單個事件中使用武力，但發生抵抗和武力的所有情況，例如以及在可疑警察遇到的其他因素，除了可疑的抵抗之外，可能是使用武力的原因。在這方面，Terrill 能夠進一步確定鑑於總的使用量，使用武力可以更恰當地標記為“客觀合理”。情況，而不僅僅是呈現的抵抗行為。這項早期工作是第一個檢查警察和公民如何按時間順序相互回應在強制連續方法範圍內的方式；是第一次量化並分析這種類型的微型警察中多次警察與公民遭遇的互動性質自 Sykes 和 Brent（1983）的開創性工作以來，我們一直致力於面向過程。Terrill 發現軍官確實不會抓住機會向抵抗的公民施加武力，但總的來說，盡可能以非強制性方式解決此類遭遇的時間（通常是懷疑有很多機會遵守。相反，適當性問題更多當警官與無法抗拒的嫌疑人打交道時，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他們更可能使用比嫌疑人的抵抗力更高的力量。幸運的是，此後，其他研究人員提供了更多利用有點平行的方法。Alpert 和 Dunham（2004），再次使用來自邁阿密戴德警察局緊隨 Terrill（2001）的呼籲，進一步完善互動方式和武力的運用。他們的工作讓我們重新審視了警察和公民在武力和抵抗方面互相回應，因為警察-公民相遇不斷發展。這組作者說，發現之一是有一個警察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越大，即使遇到非暴力的公民抵抗。他們還報告說，“[p]搶救力量似乎是有效地減少了涉及使用武力的事件的總數。

但是，一旦開始了武力循環，似乎只有有限的機會升級武力水平（Alpert 和 Dunham，2004：第 122 頁）。有趣的是，Terrill（2001）發現了與 POPN 數據有些矛盾的結果是，先發製人的力量導致了更多的使用衝突中的武力，而軍官實際上在降級方面非常熟練公民通過抵制行為提高了賭注。這樣的發現只會導致更大的需求進行其他研究。

文學差距

雖然研究人員研究了一支部隊上各種戰術的影響連續規模，以及警察從根本上使用武力行為的性質連續方法的原則，先前的工作沒有研究不同類型的政策目前已被警察機構使用，並且這些政策的應用範圍更廣。關於全國各地的警察機構實際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甚少將強制連續性納入其政策，如果是，則採用哪種類型。而且，給定設計（例如，線性，矩陣，車輪等）和戰術佈局（例如，OC 噴霧，CED 等），關於連續介質是否存在差異，人們所知甚少政策很重要，如果有的話，以什麼方式。例如，關於部隊連續性政策與實際成果（如軍官）之間的聯繫他們對政策的看法，控制公民的武力類型，官員和嫌疑人，投訴發生率或提起的訴訟數量武力指控不當。從本質上講，以前的研究未能檢查某些類型的部隊連續性政策與有益（或有害）政策之間的關聯結果。本研究開始填補這一空白。

第 2 章

項目概況

研究目的

該項目有兩個單獨的但相互關聯的目標：確定項目的變化程度使用全國警察機構使用的武力政策，並確定某些類型的政策是否為執業者提供了更有利的結果。聲明更直接地，該項目尋求：

- (1) 找出使用武力政策的現有差異，尤其是那些採用強制連續方法
- (2) 確定哪些類型的政策可為警察提供更有利的結果從業者，以不同政策的程度來衡量：
 - (a) 就以下方面的武力決定提供人員協助和指導：製作，以及

(b) 與較少的武力（即，數量和類型），對嫌疑犯的傷害有關以及因武力不當而引起的官員，公民投訴和訴訟。

研究設計

與我們的兩個既定目標相關的項目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在最初階段，我們對 1,083 名警察的分層隨機樣本進行了郵件調查根據代理機構的規模（即宣誓就職的官員）和類型（即市政，警長）。該調查的目的是破譯現有的武力政策類型。更多直接調查的關鍵要素反映了一個機構是否採用了武力連續體在其政策範圍內使用的方法，使用的連續體的形式或類型以及各種方法的位置連續性框架內的策略。根據代理商調查的結果，選擇了 8 家代理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是該項目第二階段的一部分。代理商的選擇基於確保在不同的政策類型方面有足夠的差異，但根據管轄範圍，犯罪率，工作量和社會經濟地位。簽訂協議後在警察的管理下，研究小組在整個過程中進行了多次現場訪問每個代理商兩年。數據收集包括對巡邏人員進行評估以評估他們的調查關於該機構的武力政策對決策的影響的觀點。此外，使用武力公民投訴，民事訴訟數據以及隨附的信息來源（例如組織結構圖，花名冊，人力分配，規則和法規手冊，培訓記錄，記錄，報告的犯罪數量，逮捕，服務請求）24 個月。此外，在中間對官員進行了一系列非正式訪談和高層管理人員。這些數據源共同構成了報告中的分析和發現。

第 3 章 第一階段

目的

儘管有關注力，但在警務範圍內仍採取了連續性政策文學（Alpert and Dunham, 1997, 2004; Aveni, 2003; Connor, 1991; Crawford and Burns, 1998 年; Garner et al., 1995, 2002; 霍夫曼 (Hoffman) 等人, 2004。克林格 (Klinger), 1995 年; McEwen, 1997; Petrowski, 2002; Terrill, 2001, 2003, 2005; 威廉斯 (2002), 只有一個已知嘗試確定有多少機構實際將連續性方法納入其機構政策（即 1998 年 PERF 調查）。更重要的是，沒有一項研究試確定以任何系統方式使用的不同類型的部隊連續性政策。實際上，就一般的武力政策而言，報告中指出有多少人機構採用某種書面政策以減少致命力，並採用各種形式的報告和審查程序（Alpert 和 Dunham, 204; Hickman 和 Reaves, 2003; Pate 和 Fridell, (1993 年), 經驗文獻中存在很大空白。因此，第一階段的目的旨在設計和管理對警察機構的國家調查，以評估存在哪些不同類型的武警，尤其是使用連續武力的警察。

方法

採樣框截至 2000 年，根據美國國家和地方執法機構的人口普查。在愛德華·馬奎爾的幫助下，項目顧問，我們的抽樣框架包括 7306 個代理商，其中（1）維持居民治安的主要責任，（2）僱用 10 個或更多全職人員（3）是市級或縣級機關（請參閱表 3-1）。選擇依據這三個條件包括全國 90% 以上的專職宣誓人員（Weisburd 等, 2000）。

樣品選擇

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資源來調查滿足我們要求的代理商人數選擇標準，我們需要繪製這些機構的代表性樣本。由於大不同規模類別的代理商數量的差異，我們選擇了不成比例的基於代理機構規模和類型的分層隨機抽樣策略。對於代理機構規模，我們選擇了根據具有逮捕權的專職宣誓人員的數量，可分為五類。對於代理商類型，我們建立了兩個類別。首先是警察，由市，縣，和地區警察歸為一類。第二個是警長組織。一旦這些合併了細分數據，然後我們選擇了 5% 的代理機構，其中 10-49 名官員，25 擁有 50-99 名官員的代理機構的百分比，擁有 100-249 名官員的代理機構的比例的 50% 下兩個規模類別中的廣告代理商（250-749 和 750 以及更多）。該策略導致總樣本量為 1,083 個代理商。表 3-2 顯示了每個層中的樣本量。

調查分佈和響應

依靠完善的技術（請參閱 Dillman，1978 年），調查方法涉及一個多階段過程，首先對 17 位宣誓官進行了儀器測試一月和二月分別由位於五個不同州的 14 個不同的警察局僱用收到評論並進行修訂後，最終的調查工具為已於 2006 年 3 月郵寄給所有 1,083 個代理商。¹⁰響應機構在 2006 年 5 月發布，隨後在 2006 年 9 月進行了第三輪發布。為了進一步提高響應速度，每一個無響應的人都會打一個電話第二波和第三波之間的代理。¹¹第三波結束後，我們有了累積了 591 個響應，響應率為 54.5%（波動 1 = 273，25.2%；波 2 = 216，19.9%；波 3 = 102，9.4%）。盡最大努力確保最大可能回應率，在 2007 年 2 月，第四波寄給了其餘 492 位受訪者，結果又產生了 71 條回應。我們總共收到 662 條回復（率 61.1%）。¹²

如表 3-3 所示，就代理機構規模而言，五個組中的每個組隨著代理機構規模的擴大，響應率也逐漸提高。在在頻譜的兩端，差異最為明顯。雖然不到 40% 擁有 10 至 49 名宣誓就職官的機構對調查做出了回應（在 272 項調查中，有 105 項做出了回應），超過 90% 的大型機構（750 名或以上的宣誓官）做出了回應（有 67 項做出了回應）74 調查）。在機構類型方面，警察機關比警長更有可能做出回應機構。在調查的 762 個警察部門中，有 494 個作出了回應（64.8%）。對於警長機構，321 人中有 168 人（52.3%）。因此，從普遍性的角度來看，調查結果是最能反映中大型警察機構的情況。

分析和發現

連續體設計

代理商調查的關鍵方面是確定代理商是否使用武力連續體；如果是，則使用的連續體設計類型以及戰術/武器的位置連續體。因此，我們問受訪者，他們是否依賴強制連續方法？他們的殺傷力較小的政策的一部分。我們提供了明確的方向，以闡明我們的意圖聲明“[b]力連續體”，我們指的是（有時以圖形方式表示的）準則軍官可以用來確定在一般情況下可能使用的武力類型。這樣指南有時（但不總是）與公民抵抗的各種形式相關聯試圖協助軍官將武力水平與抵抗/威脅水平相匹配遇到。一些示例包括線性（例如，梯子，樓梯，FLETC），輪子和矩陣/框設計，儘管除了這幾個示例外，**連續體設計還有很多變體。**

超過 80%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確實依靠某種形式的武力連續統一體。¹³與 1998 年 PERF 調查相比，這裡發現的百分比是有點高。根據 Alpert 和 Dunham（2004 年：頁。156），“... 72% 基於連續使用武力。”¹⁴然後，對於那些指示使用連續體的受訪者，我們要求他們確定他們的代理使用的“連續體”類型。我們告誡說，這是不正確的或理想的連續體設計，但是有些代理機構只喜歡一種設計在另一個。為了幫助進一步指導他們，我們提供了基本的模板示例（如圖所示）附錄 A）中現有的一些連續體設計。結果顯示在表 3-4 中。到目前為止，最普遍的響應是“無”線性設計的使用圖形表示（例如，請參見附錄 A，問題 2a）。第二大頻繁的設計是“帶有”圖形設計的線性方法（例如，參見附錄 A，問題圖 2b）。因此，將近四分之三的受訪機構（73.4%）表示以某種形式使用線性設計。下一個最常用的設計報告的是矩陣/盒式方法（例如，參見附錄 A，問題 2c 的說明）和某種圓/輪方法（例如，有關插圖，請參見附錄 A，問題 2c 和 2d），兩種方法都使用了大約 10% 的時間（分別為 10.1% 和 9.3%）。總共，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警察機構確實依賴部隊連續性結構，並且最常用的設計類型在某種程度上是線性的。

戰術位置

除了向代理商查詢所使用的力連續體的類型外，我們還詢問被調查者通過提示他們詳細說明他們的武力和公民抵抗的進展“[p]租賃可確定您在公民抵抗和警察使用武力方面的進展連續性策略，從最低級別到最高級別，並指明針對他們遇到的每種抵抗/威脅類型向警官推薦的力量（即對於遇到的每種公民抵抗類型，軍官都可以使用強制選項）（例如，請參見附錄 A，問題 3 進行說明）。在 518

家表示使用武力的機構中作為其政策的一部分，有 476 位受訪者提供了足夠的詳細信息，以便來詳細說明他們的部隊進度，而 371 個機構提供了足夠的細節，以便詳細說明他們的抵抗進程。

為了簡化進度模式以達到說明目的，我們將力量和抵抗的類型多種多樣，分為六類。關於武力，類別分為：官員在場/語言指示，柔軟的空手（例如，觸摸，輕拍，牢固握持，簡單約束），疼痛順應性技術（例如，壓力點控制），堅硬空手（例如，徒手擊打，拳打，踢，不帶武器倒下），衝擊武器（例如警棍/ ASP /手電筒，胡椒球，豆袋）和致命力量（例如手槍，步槍）。除了這六個類別之外，化學噴霧劑（例如 OC 或胡椒）和傳導能設備（CED）也已編碼，但與其他六類區別開來，不同機構使用的連續體放置類型不同。關於抵抗力，類別分為：順從，口頭（例如拒絕口頭指示），被動（例如未能回應軍官/無視），身體防禦（例如支撐，拉開距離，逃跑），身體活躍（如對軍官的敵意和公開的身體攻擊），以及致命的（例如可能導致死亡的企圖或實際襲擊）。即使試圖將許多力量和抵抗類型合併到更廣泛的領域類別，在警察機構的運作方式方面發現了很多差異。詳細說明其策略與級別的數量和策略的位置有關。例如，在概述其部隊進展情況的 476 個機構中，共有 123 個不同的排列被發現的範圍從三到九個不同的水平（絕大多數是 390 或 82.0%，依靠五個或六個級別）。在列出公民抵抗進展的 371 個機構中，有 15 個總共發現了 23 種排列，範圍從 3 到 7 個不同的級別（多數（343 或 92.4%，依靠五六個級別））。¹⁶在此背景下，我們介紹了本節的發現採用多種格式，以描述最全面的衡量和了解全國各部門如何變化方式的圖片通過政策指導官員。不包括 115 家放置化學噴霧劑（例如 OC 或胡椒）和/或 CED 的機構（例如，TASER[®]）上的力自己獨特的水平，表 3-5 顯示了如何將剩餘 361 詳細說明他們的力量進步。¹⁷首先，觀察連續體的兩端，各部門將最輕和最嚴厲的武力置於自己的水平上。超過 86 百分之九十的機構將官員的存在/語言指導本身放在一個水平上，而 97.8 百分之一的地方單獨施加致命力量。但是，某些機構並沒有採取如此嚴格的措施在連續體末端施加力的限制。例如，有 49 家代理商將軍官的臨場/語言指導與軟手戰術保持在同一水平，而八個部門允許使用致命武力和非致命武力。

表 3-6 和 3-7 說明了在放置化學噴霧劑和 CED 設備時的位置這種力的類型與其他六個類別之一處於同一水平。化學噴霧和 CED 以這種方式進行分析，因為它們如何或在何處適合連續力從過去的研究中，進展還不是很清楚。此處顯示的結果顯示確切地說，這種機制在全國範圍內屬於哪個機構樣品。如表 3-6 所示，化學噴霧的位置變化很大。大約 30 的機構中，有百分之百的人使用具有疼痛順應性技術的化學噴霧劑

第 47 頁

大約 30% 的部門使用硬手戰術放置化學噴霧劑，超過三分之一的機構使用撞擊武器噴射化學噴霧。幾個，不多；屈指可數各部門甚至將化學噴霧劑的用量降低到空手軟技術（n = 12）和與致命力一樣高（n = 6）。如此廣泛的變化表明嚴重缺乏共識由警務人員決定應在部隊連續體上何處噴灑化學噴霧劑。

與化學噴霧方法類似，表 3-7 列出了 CED 的位置與其他類型的力一起嵌入時放置。與化學噴霧相比差異較小，但遠未達成明確共識。近 60% 的代理商 CED 位於撞擊武器級別，另有 2% 的 CED 與致命武器一起放置力。因此，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部門需要某種類型的動手才能訴諸 CED。但是，超過三分之一的代理商將 CED 放在某種程度上生效。特別是，四分之一的機構將 CED 的級別設置為與空手-手戰術，另有 13.1% 的 CED 採用疼痛順應性技術。

如前所述，476 家代理商中有 115 家提供了足夠的詳細信息來確定力變化將化學噴霧劑和/或 CED 置於各自不同的力水平上。表 3-圖 8 顯示了這些武器在連續體上的放置位置。化學噴霧劑的位置是與 CED 相比，差異更大。最常使用化學噴霧劑的地方是遵循疼痛順從技術（36.8%）之後，緊隨其後的是罷工的空手戰術（29.4%）。不到 20% 的攜帶者將它放在任何形式上都先付諸行動（正確

在軍官在場/語言力量之後)。關於 CED，大多數機構將這種武器放置在附近連續體的頂部。只有一個代理機構將其置於言語力量之後（以及），而將 CED 置於自己水平上的 13 家代理商中有 10 家則將其放在辛苦的手或影響。最後，在 CED 發現之後，有趣的是化學物質的放置當噴霧劑和 CED 一起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時自己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模態放置位置在疼痛依從性之後但在身體硬手（42.1%）。此外，超過四分之一的代理商在疼痛依從性，影響後歸零。

接下來，我們轉向研究機構如何制定公民抵抗運動關於力的連續性（見表 3-9）。記得有 371 家代理商列出了他們的阻力級數的詳細說明，以便對該信息進行編碼。如表 3-9 所示，在詳細說明其公民抵抗情況的所有回應機構中，有將近一半（ $n = 179$ ，48.2%）遞進按以下順序使用五級佈局：1 兼容，2 言語/被動結合，3 物理防禦，4 物理主動和 5 致命。第二頻繁使用的方法（ $n = 123$ ，33.2%）相似，除了口頭和被動抵抗是分開的，根據以下條件放在不同的級別上：1 兼容，2 言語，3 被動組合，4 身體防禦，5 身體活躍和 6 致命。這兩種方法結合在一起佔 371 家代理商中的 302 家（81.4%）。因此，雖然有 12 個其他排列使用時，頻率下降是驚人的（例如，第三頻繁使用的進程格式僅包含 16 個部門）。

然後，我們研究了警察機構連接不同級別和類型的程度公民對不同級別和類型的警察的抵抗。如表 3-10 所示，476 個機構表示他們將強制連續性方法納入其政策，125（26.3%）未指示軍官有關將使用的武力類型（或範圍）面臨的阻力。¹⁸

另一方面，那些同時使用抵抗和武力的機構連續（336，70.6%）。這些機構將特定類型的武力與特定類型的抵抗性。¹⁹在沒有要求的情況下，所有人都適用某種“從句”軍官以嚴格的形式“進步”上下部隊的連續體水平（例如，軍官必須在向上移連續體之前先用盡所有較低形式的力），但都指定了範圍給定犯罪嫌疑人的抵抗程度，應使用的力量。²⁰表 3-11 列出了最常用的 10 種方法。頂端只有 20% 的部門使用此方法，第二和第三最頻繁使用的方法只有一半，只有 10%。第四種方法又減半（ $n = 17$ ，5.0%）。其餘方法都只有不到 10 家代理商使用（超過一半的所有機構）。談到存在的巨大變化強制政策。許多不同的機構正在使用許多不同的方法。本質上，那裡就部隊連續性政策而言，確實不是戰術部署的“常用”手段（即，應針對各種形式放置各種形式的動手和武器懷疑抵抗）。各部門在眾多方面進行選擇和調整，並做出調整方式-不幸的是，所有方法都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哪種方法最好甚至更好比另一個。

摘要

機構調查旨在深入了解警察在多大程度上機構將強制連續性納入其政策。雖然有限制有關警察機構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其內部的武力連續性的信息政策方法，直到現在我們對設計類型的變化程度一無所知以及戰術上的語言和物理武力以及武器的部署。接下來是項目第一階段主要發現的摘要。我們發現，超過 80% 的代理商報告使用某種類型的連續體。的在這些機構中，線性設計是迄今為止最常用的（73%），其次是矩陣/盒式設計和圓形/輪式設計，每個都有大約 10% 的代理商使用它們。考慮到文獻中最近的討論，這一發現有些有趣。關於力連續性的潛在負面影響，尤其是線性設計（參見 Aveni，2003； Peters and Brave，2006； Petrowski，2002； Williams，2002）。進一步來說，一些人反對在許多方面使用武力連續性，例如妨礙決策，對責任問題的恐懼，並且比法律更具限制性。²¹甚至在本研究第二階段的實地考察期間，我們也聽到了警方的關注官員們談到使用武力連續體的潛在弊端。但是，什麼是從這裡提出的發現中可以明顯看出，大多數警察機構將強制連續性納入其政策，並且首選模型在設計上是線性的。關於武力戰術的戰術佈置（軟手，疼痛依從性）控制，硬手）和武器（警棍，化學噴霧劑，CED），以及警察機構的工作方式

按照進展順序排列這些順序，發現的關鍵發現是巨大的存在變化。即使試圖將多種力和阻力類型合併為在更廣泛的類別中，在警察機構的運作方式方面發現了很多差異關於詳細說明與級別和戰術位置有關的政策。²²的 476 個機構概述了他們的部隊進展情況，共有 123 種不同的排列方式被發現的範圍從三到九個不同的級別（絕大多數（390 個或 82.0%）依賴於五個或六個級別）。在列出公民抵抗進展的 371 個機構中，共有 23 個發現了 3 到 7 個不同級別的排列（絕大多數 343 或 92.4%，取決於五個或六個級別）。在研究試圖將強制連續性方法納入其中的部門時他們的政策，並向軍官提供最合適的兵力類型的明確指導給定不同類型的抵抗力（例如，將公民的抵抗力與暴力聯繫起來），很難確定通常使用的偏好。只有 20% 的受訪者使用最常用的方法第二和第三最常用的方法只是部門的一半 10%。這說明了存在的力量存在著巨大的變化政策。許多不同的機構正在使用許多不同的方法。化學噴霧劑和 CED 的放置似乎是最大的挑戰。警察管理人員在部隊連續區內的正確位置。大約 30 的機構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使用具有疼痛依從性的化學噴霧劑，另外 30 家百分之九十的部門使用硬手法進行化學噴霧，而三分之一以上的部門這些機構將化學噴霧劑與撞擊武器放在一起。幾個部門甚至地方化學噴灑程度低至空手軟技術（n = 12），高至致命力（n = 6）。與化學噴霧相比，在 CED 放置方面變化較小，但遠未達成明確共識。近 60% 的機構將 CED 置於影響之下武器等級，另有 2% 的武器與致命武力一起放置。因此，不到兩個三分之二的部門在訴諸 CED 之前需要某種類型的動手能力。但是，超過三分之一的機構將 CED 置於某種程度的作用之下。在特別是，四分之一的機構將 CED 設置為與嚴格的空手戰術相同，另有 13.1% 的 CED 使用疼痛依從性技術。總而言之，儘管某些部門在允許人員使用方面有嚴格的限制僅對積極進取的嫌犯施加更嚴厲的武力，其他機構則相當自由主義，並允許官員使用針對幾乎所有類型的抵抗力的所有類型的力量都面臨著極端的不平衡（例如，允許合規嫌疑犯罷工）。總體而言，幾乎不可能確定警察機構正在使用的標準方法。從本質上講，確實沒有“常見”就部隊連續性政策而言（即各種形式手和武器的擺放位置應與各種形式的嫌疑人抵抗有關。部門通過多種方式進行選擇和調整，然後進行調整-不幸的是，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哪種方法最好甚至更好。

第 4 章

第二階段

目的

儘管先前的研究已經調查了警察使用武力的許多方面，但付出的努力很少專注於嘗試將政策與成果聯繫起來。因此，該項目的第二階段是旨在檢查某些類型的策略是否比其他類型更有利；這是鑑於警察使用了許多不同版本的武力政策，因此特別相關如第一階段所示。我們更希望確定哪些類型的政策可以為從業者提供更多的有益結果，哪些是根據不同政策（a）為官員提供協助的程度和（b）與較少的武力相關聯（即，通過數量和類型），嫌疑犯和軍官受傷，公民投訴以及針對不當的力量。我們希望該項目的這一階段的結果能夠提供有關不同類型的政策是否實際上影響警察對武力行為的使用並提供從業人員通過允許基於明智決策的政策制定指南獨立的經驗評估。

方法

雖然理想的是在每個接受武力調查的機構中檢查武力使用情況政策，實際限制禁止使用這種方法。結果，並基於在代理商調查中，選擇了八個代理商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作為第二個代理商的一部分項目階段。

代理商資格與選擇

代理商資格基於幾個標準。首先，代理商必須從事通過軍官使用武力報告定期報告武力。²³此數據收集策略提供了最有前途的方式，以最有效的方式收集大量數據方式。還必須指出，目前越來越多的警察機構要求使用武力報告（請參閱 Terrill 等，2003）。²⁴第二，代理商必須保持一致連續兩年使用武力政策和報告程序，以確保儀表不是問題。包括已更改其兵力政策或報告程序試圖進行跨機

構的有效比較時，確定確定的結果。第三，我們尋求可以合理分類的代理商中到大型。我們不希望代理機構如此之小以至於無法獲得足夠的武力事件的數量將成為一個問題；我們不想要太大的代理商（例如，紐約，芝加哥，洛杉磯，休斯敦，費城）成為一個問題。如果滿足這三個閾值，那麼代理商選擇的關鍵過程涉及在部隊連續體設計和戰術佈局方面建立變化一方面，還可以確保根據司法管轄區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代理機構的可比性，犯罪率 and 社會經濟地位。

從“設計”的角度來看，我們最初的計劃是選擇八個破碎的代理商向下的兩個使用線性方法，兩個使用滾輪或圓形方法，兩個具有矩陣設計，另外兩個在其政策框架內不使用武力連續體。但是，如代理商調查結果所示，超過 80% 的代理商在他們的政策中運用某種形式的武力連續體，其中 73.4% 的人僱用了一些線性方法的類型，大約有 10% 的輪子和矩陣方法都使用。作為一個結果，我們想使用線性方法對代理商進行過度抽樣（選擇），充分反映全國各地的部門政策，而不是強加人工標準。因此，我們使用線性樣式選擇了六個部門，其中一個使用矩陣使用輪子設計接近一個。我們遇到的唯一挑戰是無法確定並選擇至少一個沒有在其政策中納入武力連續體的機構。儘管在所有回應機構中有 19% 表示他們不使用連續體，但這是幾乎普遍保留給最小的代理商（即提供不適當匹配的代理商）和/或沒有系統地記錄部隊使用情況的人員（即使用部隊報告）。²⁵除了設計方面的考慮因素（例如，線性，車輪，矩陣），我們還希望確保八個各機構的“戰術位置”各不相同。再次如該機構所示調查結果，即使許多部門可能使用線性類型的設計，如何描繪，也許更重要的是，關於如何指示人員，相差很大。因此，我們希望構建這種變體。最後，我們尋求與社會經濟學具有可比性的司法管轄區透視。更直接地，我們密切注意嘗試選擇沒有在種族，失業，貧困或犯罪率等指標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在簡而言之，機構選擇是基於確保不同政策方面有足夠的差異類型，以及基於司法管轄區規模，犯罪率 and 社會經濟狀況。完成以上所有考慮並完成列表後，就有 16 個代理商確定並接觸以確定可能的參與。經過無數次討論在這些機構的管理人員中，共選擇了八名參與者：俄亥俄州哥倫布，夏洛特梅克倫堡，北卡羅來納州，波特蘭，俄勒岡州，阿爾伯克基市，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CO，聖彼得堡，佛羅里達州，印第安納州韋恩堡和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

數據採集

與警察管理人員達成協議後，研究小組進行了每個代理商在兩年的時間內進行了多次現場訪問。至少我們花了至少每個地點在網站上呆了整整一個月。平均而言，我們到每個站點四次旅行並花了每次旅行一周。²⁶數據收集包括對巡邏人員進行的一項調查，以評估他們對以下方面的看法：該機構的武力政策對決策的影響（請參閱下文“官員”下的描述調查方法小節以獲取更多詳細信息）。此外，使用武力數據，投訴數據，和民事訴訟數據，以及隨附的信息來源（例如，組織圖表，名冊，規則和規章手冊，報告的犯罪數量，逮捕，要求服務）被回顧性收集了 24 個月（因此，為期兩年的研究期）。²⁷此外，在中間對官員進行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採訪和高層管理人員。這些數據源共同構成了報告中的分析和發現。

總體而言，數據收集過程非常耗費人力。一，八涉及的警察機構，我們不得不處理大量數據中的八個不同流程元素。例如，僅憑武力數據，我們就必須揭露警官如何以及何時施行武力報告，政策和/或培訓在我們的學習期限內是如何改變或改變的，部隊數據已在部門內進行分類，以及如何獲取數據。對於許多其他數據源，必須收集和收集類似類型的的信息，例如：好，例如投訴，訴訟，舉報的犯罪，逮捕，要求服務，人員配備以及許多其他元素。此外，由於該項目跨越了兩年的歷程在警務人員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更替。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主要聯繫人在該項目期間，警察部門內的聯絡人被調任，促使我們必須與可能對該項目不熟悉的其他人重新開始該過程當時。在一個城市，警察局長級別發生了變化。幸運的是，新任首長允許我們繼續該項目並提供了資源。簡而言之，這絕不是最省力的項目，也沒有要求警察部門簡單地“向我們發送數據”的項目。

至關重要，因為確保我們比較與武力有關的“共同措施”用法，產生投訴以及民事訴訟的性質，不能僅僅通過詢問來完成

警察機構向我們發送數據。責任必須在研究人員身上，而不是警察部門，具有相似性和信心，可以確保後續分析中使用的數據如下乾淨且可比。

代理商比較

表 4-1 列出了八個研究地點以及它們如何在多種因素之間進行比較從設計類型，人口，犯罪率到各種城市特徵不等。尺寸就人口和宣誓人數而言，城市中有 733,203 和 1,819 在哥倫布（Columbus）分別升至 182,337 和 382（諾克斯維爾（382））。一些城市特別在這兩個方面（例如，哥倫布和夏洛特-梅克倫堡，波特蘭和阿爾伯克基，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聖彼得堡，韋恩堡和諾克斯維爾）。此外，許多社會經濟指標處於相對緊密的位置。例如，非白色的比例從哥倫布的 32% 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近 20%。貧窮比率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 6% 到諾克斯維爾的 14% 不等。從比較從角度來看，紐約羅切斯特市（Rochester, NY）是最初被研究的 16 個城市之一，超過 50% 的人口比例和近 30 的貧困率；因此，它沒有被選為學習城市。我們傾向於在其他一些指標上看到更多差異。例如，八分之五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城市每千人的犯罪率最高，諾克斯維爾略低於 82%，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韋恩堡則處於中高水平 40 多歲。

政策說明

如上所述，我們有六個使用線性設計的代理商，一個使用滾輪設計，並且使用矩陣方法。以下提供每個代理商的說明政策。有關其他詳細信息，請參見代理商如何描述其內部的力連續體政策以及部隊選擇的戰術安排，另請參閱表 4-2 和附錄 B。

哥倫布²⁸

哥倫布採用了線性設計，稱為對阻力的動作響應/侵略（使用武力）模型，它沒有以圖形方式描繪出一個力連續體，而是只需佈置八種力水平（軟手，化學噴霧劑，電子設備，硬手，撞擊武器，犬類，減少致命性的彈藥，致命）。該策略無法識別或鏈接抵抗特定力量的類型。每次都會填寫《行動響應報告》表格使用了可報告時間。狼牙棒，CED 和槍支有單獨的附錄。對於 0-1 級，軍官完成了使用武力表並將其轉發給他們的直屬主管。如果使用武力級別是 3 級（CED）到 7 級（較少致命控制），或者受傷（以任何水平的力量），主管進行調查，審查強制報告（最初由軍官開始），並建議紀律處分（如果有）。EMS 稱為每次使用 CED 時，都需要移除 CED。8 級-致命的力量，該人員基本上將所有調查工作移交給直屬人員主管。完成後，指揮部將審查使用武力報告，而副局長對調查結果做出最終決定。如前所述，前線主管從頭到尾在使用武力調查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力報告還包括涉及宣誓人員的下班事件。內政保留一切使用力的記錄（1 級以上），而所有使用力的數據都存儲在培訓中學院。

夏洛特 - 梅克倫堡

夏洛特-梅克倫堡使用線性設計，儘管他們的政策指令專門針對指出，“它不是設計成逐步進行的。”以圖形方式描繪的模型公民以線性方式抵抗的六個層次（合作，口頭和非口頭，被動，防禦，主動侵略，加重主動）在橫軸上水平軸以線性方式描繪了七個水平的力（專業存在和口頭對話和命令，軟手，化學噴霧，硬手，傳導的能量裝置，撞擊武器和致命力量）。這些強制選項，在水平方向上描繪軸也垂直移動。此外，兩者之間沒有完全重疊抵抗和武力選擇（例如，可以在防禦和防禦之間使用硬手主動電阻）。每次使用可報告的部隊時，都會填寫“部隊使用情況報告”表格。當警官使用書面證明的武力級別時，他們必須聯繫其主管立即對事件進行調查（主管調查報告）。主管根據官員提供的信息完成報告，並且現場的公民（通過調查）。如果 CED 採用，單獨的 Taser[®] 數據下載報告已完成。還有用於 OC 噴霧劑和槍支的附錄。在對該軍官中士使用武力事件進行初步調查之

後，指揮鏈（司令部司長，服務區主管和內務）審查了事件，認為這是合理或不正當使用武力的行為。最終處置來自服務領域專業，而內部事務主要是對流程的檢查一致性和監督。每次使用武力事件都會進行電子跟踪，審查此案的文件，他們的評論以及持續時間。有 45 天的限制調查使用武力事件。

波特蘭

波特蘭採用線性力連續體設計，佈局並鏈接了公民抵抗力選項。該模型描述了公民抵抗的七個級別（但沒有圖形格式）以線性方式（順從，順從/語言，被動，物理，物理）進攻，身體進攻，武裝，致命）在右側，七級力量中間欄中以線性方式顯示的選項（官員在場，口頭髮言，控制權持有，化學噴塗和 TASER[®]，警棍和罷工/踢腿，非致命彈藥，槍支），五力左欄中列出的級別（狀態，語言，物理控制，彈藥，致命）。每個使用應報告武力的軍官都必須填寫《武力使用報告（UFR）》。涉及事件的主要官員必須填寫所有強制性報告。事件敘事通常不會記錄在主要官員的 UFR 中，因為它們記錄在保管/事件報告中。因此，敘事數據不會以電子方式記錄在主席團的數據系統

（PPDS）。無線電通信局的 UFR 於 2004 年 7 月通過。在此之前時間，CED 和較少的致命力量被捕獲在單獨的局表格上。槍支數據放電事件以單獨的形式記錄。不需要主管去每次使用武力事件的現場；主管被要求在現場對現場做出回應受到致命性較弱的武器打擊的對象，或警官疏忽或無意中退出了 CED。要求官員通知主管當警棍，化學噴霧劑，CED 或致命性較小的武器部署在學科。在這種情況下，主管應記錄下部門間的任何傷害備忘錄，通常是事後報告，是描述和描述評估警方的行動。這些報告必須最終存儲在酋長辦公室中，在一周之內提交給分公司負責人，分公司負責人將其轉發給培訓和內部事務。儘管並非所有情況下都要求主管去現場，負責審查其官員撰寫的每份 UFR。

阿爾伯克基

Albuquerque 採用線性力連續設計（稱為無功控制）模型或 RCM），將公民抵抗與武力選擇結合起來。這個模型以線性方式圖形化地描繪了四個級別的公民抵抗（合作，非合作，無武裝襲擊者，武裝襲擊者）水平軸以線性方式描述四個級別的力（警報，控制，活動，生存）。在四個主要級別的每個級別中，列出了特定的類型（例如，在活動狀態下，它指示軍官考慮從口頭命令到使用中間武器的任何事物）。每個使用應報告武力的軍官都必須填寫《武力使用報告》（UFR）

除事件報告（表格 42）外，還有氣泡表（例如，類似 scantron 的表格）。它是該官員的主管有責任確保在以下情況下提交 UFR 氣泡表使用了可報告的力量，但不要求他們去現場。如果人員沒有填寫報告，由主管負責填寫。這也是主管審查所有下屬人員 UFR 氣泡表。主管必須簽字表格並註明所使用的武力是否適當或是否需要進行調查。²⁹經主管審查後，將提供 UFR 氣泡表和事件報告的副本。在事件發生後的 72 小時內提交給運營審核中尉進行審核。該然後，運營審核中尉將報告分發給內部事務，風險管理，法律部門，戰術團隊和學院（如果適用）。行動審核中尉確保該報告由法律審核並轉發給內部事務。最後，司令官有責任確保所有上司和下屬遵守政策，並且所有報告均提交給適當的部門。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依賴於“情勢模型”（Situational Force Model）（也稱為“車輪”模型作為其連續力的一種手段。該模型以圖形方式描繪了一名軍官站成一個圓圈，周圍有各種力量選擇。力量選項以隨機順序放置，以指示沒有自然的力進行（例如，致命的力量放在軟手戰術旁邊）。沒有公民的圖形描述在不同類型的阻力下，哪種力最合適（儘管政策說明/文本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聯繫，從而表明了某種程度儘管採用了循環模型方法，但線性級數仍保持不變。每個使用可報告的人員部隊必須完成一份部隊報告（稱為“對侵略的反應”報告或 RTA）。作為...的一部分根據政策，主管必須對現場做出回應；但是，在極端情況下涉及受傷或監事認為需要執行逮捕令的

其他情況，監事會不採訪官員，證人或嫌疑犯。相反，他們只是在現場監督。完成後，RTA 將被轉發給第一位行政中士。對其進行審核，複製並提供該人員的文件的副本。然後將 RTA 發送給審核通過指揮鏈（中尉，司令官，專業辦公室）標準/檢驗單位）。RTA 表格存儲在專業標準辦公室/檢驗單位。

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依靠對抵抗（使用武力）的反應矩陣。這個模型在垂直軸上以線性方式圖形化地描繪了六個級別的公民抵抗（存在，言語，被動身體，主動身體，攻擊性身體，加重身體），其中六個在水平軸上以線性方式顯示力級別選項（軍官存在，交流，物理控制，中間武器，無能的控制，致命的力量）。合適的然後，通過複選框中的複選標記將力量類型鏈接到各種抵抗類型（例如，如果公民表現出侵略性的物理抵抗力，辦公室可能會耗盡控制力。該 CED 有其自己的政策。要求官員填寫抵抗報告回應表每當使用任何可報告的力量時。另外，要求官員在他們何時報告將槍支對準嫌疑犯。報告了平均售價，化學噴霧和物理力回應形式，但 CED 具有自己的形式（包括指向和意外放電。CED 出院後，主管會來到現場確保該官員收集了所有補充信息（例如 CED 表格，下載數據和拍照）。然後，要求主管查看並在以下表格上簽字：現場。完成對抵抗的回應和/或 CED 表格後，逮捕報告，通過指揮鏈發送（中士，中尉，少校，助理負責人）進行審查，然後再轉發給內部事務部進行最終審查。內部事務部保留一份武力報告副本，並提供給訓練司和原件抄送記錄和識別司。

韋恩堡

韋恩堡採用線性設計，儘管該模型沒有以圖形方式描繪出力連續體，而是簡單地以線性方式佈置六個級別的力（軍官在場，口頭，軟手，硬手，中間武器，致命），然後部分識別出通過敘述/文本的抵抗。根據政策，武力應該是“合理必要的”，並且僅在“討論，協商和說服”被認為是不適當的或無效。每個使用可報告武力的軍官都必須填寫使用武力報告除了事件報告之外的表格。CED 事件和槍支放電報告在單獨的表格，並與部隊報告/事件報告表一起保存。軍官填寫使用武力報告表後，中士進行審查並簽字。使用武力時，不需要主管去現場。使用武力報告表然後將其附加到事件報告中，並發送給專業標準辦公室，然後由專業標準辦公室將使用武力和事件報告的副本發送給培訓中心。訓練培訓中心的講師審查武力報告的使用情況，以確保正在使用由官員適當填寫，並確定使用的部隊是否有效或不。

諾克斯維爾

諾克斯維爾的政策以線性方式圖形化地描繪了公民抵抗的五個層次垂直（順從，被動，主動，攻擊和攻擊/致命）連續體，在垂直方向上，在垂直方向上具有五個線性線性作用力選項連續體（軍官存在，空手軟/警棍軟，順從技術，防守守法技巧，致命的力量），在場景中間垂直放置五個情連續體（戰略，戰術，動盪，有害，致命）。要求官員填寫級別 2 的“力報告”表（空手軟，警棍軟，接觸控件，方向控件）以上或嫌疑人受傷（或投訴）。沒有補充表格 OC 噴霧劑或 CED（但適用於 K-9 和火器放電）。一旦填寫了部隊表格出來，他們交給士官進行審查。³⁰ CED 的使用方式稍有不同，因為要求官員立即通知主管³¹並召喚 EMS 醫療援助如果探針被嵌入嫌疑犯的皮膚中，則可以去除探針。主管必須去警員使用致命武力的場景。一旦填寫了使用力報告（在班次結束時），它就會遍及整個鏈條命令。需要直接主管簽名（主管檢查音頻並簽名）。錄像帶），一名中尉和一名上尉。對使用武力的報告也進行了正式審查由內政部進行。巡邏副隊長還對報告進行了審查。

培訓處處長和 CALEA（訪問 KPD 時），儘管沒有簽名需要。使用武力報告存儲在內部事務股內。表 4-2 提供了戰術佈局的詳細佈局以及公民的抵抗力是（或沒有）鏈接到八項政策中每項的強制選項（另請參見附錄 B，了解如何每個機構都以圖形方式描繪了政策）。如圖所示，每個代理商都有不同的方法以某種方式。其中兩個部門（即哥倫布和韋恩堡）只提供武力進步水平-與公民抵抗沒有明確聯繫。但是，這些機構仍然有所不同在部隊戰術部署方面。例如，哥倫布呼籲軍官使用軟遵從

手/痛，然後分別進行化學噴霧，CED 和硬手和不同的水平。韋恩堡的方法略有改變。首先，將化學噴霧置於與柔軟的手和疼痛的依從性相同，而不是自己的水平。二，CED 放置在撞擊武器級別，該級別是在硬手之後而不是之前。六個機構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將兵力選擇與不同級別的公民聯繫在一起抵抗性。再一次，變化的程度是顯而易見的。夏洛特-梅克倫堡地方化學噴霧劑，硬手和 CED 處於不同水平，而阿爾伯克基放置所有這些相同力量水平上的力量類型（以及柔和的手法和疼痛順從性）。然而，當將公民抵抗力納入方程式時，它將變得更加複雜。在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化學噴霧劑具有防禦力，而衝擊力 CED 的使用需要更多的防禦防禦能力。相比之下，Albuquerque 允許手軟硬地，順從疼痛，化學噴霧和 CED 力在口頭和防禦上抵抗嫌疑犯，為主動抵抗的嫌犯保留衝擊力。

政策中也有其他變化。波特蘭放置化學噴霧劑，CED 在反對防禦性公民抵抗的連續統一體中間，而聖彼得堡在致命武力出擊之前將 CED 放置在連續體頂部附近積極的抵抗。諾克斯維爾指示軍官在口頭上使用柔軟的手和疼痛合規性和被動的抵抗者，然後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在防禦和主動上都致命的力量抵抗者。也許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發現了一種更有趣的代理方法。相對於線性類型的模型，使用車輪的原因之一是官員不要以階梯或分步格式考慮力的變化。顯然，如圖所示附錄 B 中的車輪描述盡可能地確保沒有明顯的力行進（例如，致命力在一側緊靠化學試劑，軟控制技術在另一邊）。但是，在政策文本中，公民抵抗是逐步發展的格式，並明確鏈接到適當的強制選項。例如，對於軟手技術該政策規定：“當主體無法回應口頭指示或在防禦中抵抗時方式，以及控制和依從性技術（例如，疼痛依從性，化學噴霧，CED）的政策規定：“主體已成為侵略者，襲擊軍官或感到恐懼為軍官和其他人的安全”（CSPD GO 705）。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在政策中不確定地發現。例如，直接與 CED 相關的政策部分指出當一個人“抵抗拘留和逮捕”以及其他在某些情況下，控制它們的替代方法不合理或不可用。（CSPDSOP P1-171）。

與強制政策有關的其他兩個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在三個在*所有城市*，*所有巡邏人員*都攜帶 CED（例如，波特蘭，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諾克斯維爾）。在四*大多數*（但不是全部）城市的巡邏人員都攜帶 CED（例如，哥倫布，夏洛特-梅克倫堡，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和聖彼得斯堡（St. Petersburg）-表示在任何指定的班次中都有一些人員與 CED 一起巡邏，而其他人員沒有 CED。此外，在韋恩堡，幾乎沒有的巡邏人員具有 CED，除非其中一名警官是緊急響應的一部分團隊（ERT）。其次，在大多數城市，巡邏人員自己負責通過部隊報告記錄了他們對部隊行為的使用情況，其中兩個城市（哥倫布和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有主管報告系統（例如，主管來現場記錄部隊使用情況。³²總而言之，我們有八個機構來改變其兵力政策有多種不同的方法。下面我們提供了有關每種政策變化的更多詳細信息機構。

數據元素

檢查某些類型的政策是否可以給警察帶來更有益的結果從業人員我們藉鑑了兩個主要的數據元素。首先是人員調查（第 5 章），這使我們可以研究不同類型的政策方法提供的程度軍官在部隊決策方面的協助和指導。這一策略使我們超越官方政策授權和行政措辭，直奔第一線負責執行代理機構政策的工人，以確定他們是否真的認為該政策作品。第二組數據元素屬於官方數據的廣義標題，但是實際上以武力報告的形式分為三個子元素（第 6 章），公民投訴數據（第 7 章）和民事訴訟數據（第 8 章）。在這裡我們可以調查哪個政策類型與不同程度的武力，對嫌疑犯和軍官的傷害，公民投訴和因不當武力而提起的訴訟。

第 5 章

巡邏人員調查數據

我們的巡邏人員調查（請參閱附錄 C）旨在收集有關以下方面的信息：軍官對使用武力政策的態度（即協助，限制，清晰，指導和審查公平性），政策對各種結果（即公民）的影響傷害，軍官受傷，公民投訴和訴訟），以及與政策。該調查還捕獲了標準的人口統計信息。該調查已預先測試在管理之前對現任和前任密歇根州和佛羅里達州警察的樣本他們交給我們的八個機構。除了一個地點³³，巡邏人員的調查是開始之前，由受過訓練的項目人員在組織唱名會議期間進行管理軍官的班次。本章詳細介紹了調查的管理以及巡邏軍官回應。

方法

調查人口

我們選擇調查分配給巡邏任務的警察人數，而不是而不是選擇人員樣本。做出此選擇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我們在唱名會議上管理調查，並且有足夠的資源進行訪問對於每一個班次，我們的目標都是抓住所有巡邏人員的態度，而不是選擇一個小組。此外，鑑於某些調查主題的敏感性（即使用武力），我們做了不想引起官員對為什麼他們被選中參加會議的懷疑其他。實際上，我們對每個唱名冊的標準介紹都通過以下方式解決了此類問題：

解釋說，作為一個組織，沒有選擇人員（個人或集體）研究他們做不到或做錯了的包容性。其次，由於我們的目標之一是最終將態度調查的回答與各種行為結果（例如，使用武力，投訴，訴訟等），我們不想通過隨機過程可能會丟失一些組織成員的風險，這些成員可能稍後會引起關注（例如，使用力過大或過低的用戶）。接下來是對巡邏人員調查協議以及調查結果。

調查協議

在進行官員調查時，項目人員通常在現場工作一周至十週天，目標是至少訪問每個地理位置的每次巡邏班次兩次。³⁴為了最大限度地延長現場調查時間，我們獲得了所有工作的總花名冊我們八個機構各自宣誓就職。名冊確定了巡邏人口官員，以及他們的分配時間和地點。然後將這些信息進行匹配與日常巡邏花名冊，以確保分配信息正確。基於此信息，然後項目人員準備了一項調查計劃，使他們能夠調查每個在各個區域/地區兩次移動兩次。通過這樣做，項目人員建議在警官安排的放假時間進行探訪。例如，如果位於 X 部門計劃在周四，週五和周六放假，調查人員確保安排該小組在周日至週三的調查時間。在較小的機構中，例如聖彼得堡，這很簡單，而在夏洛特-梅克倫堡這樣的部門中，更艱鉅。在前往每個站點（大約一周）之前，我們每天獲取最新信息從該機構巡邏名冊，以確保在人員方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分配。這使調查人員可以預先編號（和命名）每個調查。在開始進行唱名拜訪之前，我們的每個代理商聯繫人都會分發紙質備忘錄或我們的調查時間表的電子郵件，以提醒指揮人員研究人員擔任測量人員的日期和時間。這樣做是為了消除值班主管的任何“驚喜”元素，並使調查合法化指揮人員的支持。每個機構的調查時間和人員分配都不同，根據規模，空間差異（例如，區域/分區的數量）和代理商幫助。例如，諾克斯維爾警察局，我們最小，只有兩個地區，組織了跨地區的聯合唱名冊，使我們能夠在大約四天。另一方面，夏洛特-梅克倫堡的運營跨 13 個部門（每師 5 到 6 個班次），需要更多的調查人力，大約需要 14 天的時間調查。由於我們兩個站點（波特蘭和夏洛特-梅克倫堡（Mecklenburg）），我們僱用並培訓了當地的研究生來協助調查（三名來自波特蘭州立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的四所大學，分別）。這些研究生都是手工挑選的，並且是來自同行的推薦。項目負責人。這大大有助於有效地管理人員跨多個區分區進行調查。

我們的唱名拜訪是從向與會人員簡要概述項目，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各機構根據其使用武力的不同來選擇政策，而不是部門（或部門內的個人官員）的政策做不到或做錯了。此外，我們解釋了知情同意的問題，機密性和匿名性。也就是說，調查人員解釋說官員參與是根據聯邦和大學 IRB 的規定，如果他們自願參加，我們需要他們簽署的同意書（請參閱附錄 D 中的“官員同意書”）。我們的介紹也解釋了向官員表示，他們對調查的答復是機密的，沒有人在項目之外工作人員將查看他們

的個人調查。我們的保密承諾必須與缺乏匿名性區分開。因為我們想將態度調查的回答與我們的官方數據（例如使用武力，投訴，訴訟等），我們想確保每個人員在調查過程中，我們需要確定調查對象。為此，我們創建了一個獨特的未與任何官方識別人員建立聯繫的每個人員的識別號編號（例如，徽章編號，工資單編號，汽車編號等）。指示人員警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將獲得一個新的識別號。隨機分配身份證號碼印在調查的最後一頁以及同意書上（裝訂在調查的最前面）。同意書頂部是該官員的名稱，該名稱在點名中已讀出，以確保每個人員均接受調查。已完成的官員調查沒有姓名，因為同意書已從調查中分離出來一旦將其交給項目人員，並指示官員，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撕下同意書上的印刷名稱。由於我們具有相同的標識同意書和調查中每位官員的電話號碼，我們能夠匹配同意已完成調查的表格。

巡邏人員的調查通常需要 10 到 25 分鐘才能完成。如果官員們對該調查。指示官員分別完成調查，不要討論任何項目。那些沒有參加調查的人要么身體缺席，要么拒絕參加。接下來，我們討論每個機構的回應率。

調查回復率

表 5-1 顯示了我們八個機構的回應率。既然我們感興趣在調查所有負責巡邏的警察時，第一列中的巡邏編號代表位於官方部門巡邏名冊上的人員數量，並且因此分配給巡邏功能。行政類型分配，儘管在巡邏級別，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因為他們有可能參與使用武力，從而運用少一些致命的政策，是遙不可及的。因此，此列代表巡邏人員的數量，當項目人員到達進行調查時，“預期”將是點名。表 5-1 中的第二列代表了在我們的點名拜訪期間要進行調查的實際身體狀況。即使我們有先驗計劃在他們計劃的休息日到位以調查巡邏人員的數量，我們無法控制那些不按計劃休假，出庭，受傷的人，因其他情況而處於軍事職責，被暫停或不在場的人。我們找到站點之間分配的巡邏人員（紙上）與每個班次可用的那些。這種變化通常根據部門規模，在較小程度上受空間差異的影響，因為更大的契合度在較小的第一列和第二列之間（即，預期的和存在的之間），更集中的機構。表 5-1 中的第三列描述了參加該活動的巡邏人員的數量該調查。從上一列中減去此列表示巡邏次數拒絕參加調查的官員。

表 5-1 中的第四列顯示了參加我們的調查，涉及我們在每次唱名冊中期望的人員數量。在我們八個機構中，我們累計成功調查了超過兩個正式安排在場的三分之二的巡邏人員。

表 5-1 中的最後一列說明了參加點名並參加了調查。雖然整個過程中有一些細微的差異網站（從聖彼得堡的 91.50 到阿爾伯克基的 99.08），百分比顯示：只要測量員是實際存在。累計，測量師成功完成了大約 96.5 的測量參加部門巡檢（和在職培訓）的巡邏人員的百分比在韋恩堡）。接下來，我們介紹巡邏人員的調查結果。

分析和發現

*更少的致命武力政策認知*我們調查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徵詢軍官對他們的看法部門少用致命的武力政策。為此，我們集中精力請官員有關其總體政策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協助，限制，清晰，指導，並審查公平性）。以下是官員對上述每個問題的回答，所有這是李克特（Likert）的標準項目，使受訪者可以回答不同級別的同意和不同意（即“強烈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並“強烈不同意”）。我們首先詢問軍官他們的“政策協助軍官決定的程度”製作”（請參見表 5-2）。在大多數程度上，無論是哪個代理機構，大多數受訪者和政策類型，他們認為總體上他們的政策有助於他們的決策。最多諾克斯維爾（91.6 同意和 32.5 同意“強烈”）報告了積極的回應，阿爾伯克（Albuquerque）軍官（90.9 人同意，“30.4”人“強烈”同意），而聖彼得堡人報告的整體協議數量最少，約為 74%。在評估政策限制時，我們詢問了官員們是否認為該政策太過嚴格限制。表 5-3 顯示了結果，其中似乎有很大的差異跨機構。來自四個機構的大多數官員（即聖彼得堡，佔 74.6%；夏洛特-梅克倫堡，佔 66.4%；波特蘭 55.5%；和哥倫布（51.5%）報告說他們同意他們的政策過於嚴格。其餘四名

員中的大多數部門不同意他們的政策過於嚴格（即，諾克斯維爾，60.8%；科羅拉多泉水 57.9%；韋恩堡，53.7%；和阿爾伯克基（51.1%）。在極端情況下，我們發現聖彼得堡軍官最不滿意的回應（即，使用致命性較小的武力政策是過於嚴格），而在諾克斯維爾軍官中找到了最有利的回應。

接下來，我們詢問軍官他們同意他們的致命力較低的程度政策很明確。如表 5-4 所示，大多數人員在不同程度上（範圍從波特蘭的大約 70%到諾克斯維爾的大約 90%）認為他們的政策是明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機構（除諾克斯維爾（Knoxville）），該協議的大部分屬於“有點”類別。再一次，在諾克斯維爾軍官中發現了最有利的殺傷力較低態度大約 45%的受訪者“強烈同意”他們的政策是明確的。

我們還詢問了官員有關他們的政策在“何時”方面提供的指導。如表 5-5 所示，所有人員中的大多數人員部門同意，儘管程度不同，但他們的政策為何時可以使用武力和不可以使用武力的術語。另外，就像之前的指導問題一樣，發現諾克斯維爾軍官是最有利的（約 44%同意，48%同意強烈），而波特蘭軍官是八個機構中最差的（大約 52%同意，只有 18%強烈同意。所有部門，除了諾克斯維爾，模態反應是“有點同意。”

最後的政策評估調查項目側重於監督審查和使用武力報告。這個問題要求軍官評估他們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他們的“關於使用武力報告的監督政策是公平的。”如表 5-6 所示，所有機構的大多數官員都同意對使用武力進行監督審查報告是公平的。我們確實發現該多數同意書存在差異，總體差異為 75%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達成的協議在波特蘭達到 95.4%。就協議強度而言，諾克斯維爾軍官報告說“同意”率最高，為 37%。當我們在所有機構中都達成了很高的總體協議，該協議的大部分（以及響應）屬於“有點同意”響應類別。

摘要

此處報告的巡邏人員調查的第一部分的目的是評估軍官對其使用武力政策的殺傷力較低的看法。我們的主要主題集中在總體政策援助，限制性，明確性，指導性和審查公平性。在人們對使用武力政策的態度的各個方面，我們發現出現了三種模式。首先，儘管我們發現內部和跨部門的響應存在差異機構，巡邏人員普遍對他們使用較少致命力的武力表示贊同政策。

第二，一個機構在巡邏人員的積極態度方面始終脫穎而出他們使用武力政策。該部門是諾克斯維爾，軍官在那里報告在此表中幾乎每張表中，他們政策的積極回應（比例較高）部分（請參閱表 5-2 至 5-6）。

第三，幾個部門（例如，聖彼得堡，波特蘭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通過報告最低的有利百分比來始終保持卓越回應或不利回應。例如，聖彼得堡軍官報告說就提供援助政策而言，八個地點的協議百分比最低同意），即該政策過於嚴格（請參見表 5-3）。波特蘭軍官，另一方面表示注意到他們的政策明確的達成協議的最少數量（請參閱表 5-4）。相同發現波特蘭軍官在何時可以使用武力和不能使用武力方面的模式（請參閱表 5-5）。最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軍官以舉報最少總體同意，對其使用武力進行監督審查是公平的（請參閱表 5-6）。

減少致命力政策的成果

我們巡邏人員調查的下一部分向受訪者詢問了各種他們各自的武力政策的“成果”。更具體地說，我們要求人員評估他們不太致命的使用武力政策對潛在的公民傷害，軍官傷害，公民投訴和訴訟。對於所有物品，我們要求警官用以下一種回應以下：“增加可能性”，“減少可能性”，或“既不增加也不增加”降低可能性。表 5-7 顯示了巡邏人員對他們的減少影響的看法的結果對潛在的公民傷害使用致命的武力政策。所有人員中的大多數機構報告說，他們的政策降低了可能造成公民傷害的可能性，從韋恩堡的 50.3%到諾克斯維爾的 69.7%。有趣的是，雖然大多數受訪者沒有報告說他們的政策增

加了超過 10 人受到公民傷害的可能性韋恩堡軍官的百分比（11.6）做到了。這與諾克斯維爾形成鮮明對比，不到百分之一（0.6）的人認為他們使用武力政策增加了對公民的傷害。

接下來談談受訪者使用武力政策對巡邏人員受傷的影響，我們發現與報告的公民傷害結果相反（見表 5-8）。全部當中代理商，我們發現可能性響應類別之間的差異更大（“增加”“減少”或“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在較高端，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軍官報告說，他們的政策增加了軍官的可能性傷害（分別為 45.7%和 44.2%）。諾克斯維爾軍官報告的比例最低（19.4%）可能導致人員受傷的風險，仍高於任何機構報告的潛在傷害可能性公民受傷。最後，諾克斯維爾軍官是唯一獲得多數票的人群（58%）報告說，他們的政策實際上降低了軍官受傷的可能性。

我們對政策成果的第三次評估處理了潛在的公民投訴。再次，就像評估潛在軍官受傷時發現的那樣，我們發現（參見表 5-9）響應類別之間的差異。有趣的是，六個機構（即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波特蘭，阿爾伯克基，韋恩堡，聖彼得堡和哥倫布）他們的政策實際上提高了公民投訴的可能性降低可能性。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軍官報告了更高政策減少的可能性百分比（分別為 37.4 和 33.2）可能性。最後，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從聖彼得堡的 33.5%到諾克斯維爾（42.6%）報告說，他們的政策並未增加或減少潛在的公民投訴。

最終結果項目評估軍官對致命力降低的影響的看法有關潛在訴訟的政策。如表 5-10 所示，最有利的評估是在諾克斯維爾軍官中發現了武力政策，據報導，將近一半的軍官（49.4%）該政策降低了潛在訴訟的可能性。最不利的評估該政策是在波特蘭受訪者中發現的，他們的百分比最高（31.3）該政策增加了潛在的訴訟，並且該政策的最低百分比（22.2）減少了可能發生的訴訟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聖彼得堡和諾克斯維爾，在所有機構中，模態反應是政策“都沒有增加”也不降低潛在訴訟的可能性。

摘要

巡邏人員調查本節的重點是評估受訪者對以下方面的看法：較少使用致命武力政策對各種重要成果的潛在影響。也就是說，我們問官員們是否認為他們各自的政策是增加，減少還是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對公民和官員，公民造成潛在傷害的可能性抱怨和訴訟。在所有這些結果中，都有一些突出的發現。首先，諾克斯維爾作為一個整體，受訪者再次表達了對其政策最有利的評估，他們報告說，他們的政策降低了潛在的公民和官員受傷，公民投訴和潛在的訴訟。其次，在所有結果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出現的模式，尤其是尊重機構內部和機構之間的差異程度。在可能性上潛在的公民傷害，所有部門的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致命武力政策降低了可能性，儘管韋恩堡的人數最少此響應類別中人員的百分比。

相比之下，在潛在的軍官受傷方面，我們發現跨機構，儘管在每個部門中，受訪者都報告了更多的可能性與公民受傷相比，軍官受傷有所增加。雖然模態響應機構認為，該政策“減少了軍官受傷的可能性（聖約翰大教堂除外）。模式是“增加”的彼得斯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諾克斯維爾是在此回復類別中找到大多數人員的唯一機構。對於潛在的公民投訴，我們發現回應的差異更大，儘管（諾克斯維爾除外）約 30%（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至 40%（哥倫布）的受訪者百分比認為他們的政策“增加了這種可能性”行動，而報告的百分比大致相同—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可能性。

最後，對於潛在的訴訟，各機構之間的模式響應是“減少”可能性”（即，諾克斯維爾和聖彼得堡）或“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可能性”（即所有其他可能性）。與所有其他機構相比，波特蘭是最高的認為他們的政策“增加了可能性”的軍官比例（31.3%）潛在的訴訟。

培訓和減少致命力政策

接下來，我們要求受訪者評估其機構致命性較低的學院的適當性和在職培訓。這兩個問題都使用了李克特問卷調查表，並帶有回答“非常同意”，“一定程度上同意”，“一定程度上不同意”和“不同意”類別強烈。”此部分還允許軍官報告學院和在職培訓領域他們認為可以得到更多關注。如表 5-11 所

示，大多數軍官在不同程度上同意他們的服役前較少的致命力訓練是足夠的。諾克斯維爾和阿爾伯克基軍官最受好評（分別為 91% 和 90.4%），而聖彼得堡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處於協議的低端（62.8% 和 65.9%）。雖然對職前評估的致命性訓練較少，但在所有方面機構，積極多於消極，重要的是要注意協議（模態響應）位於“有點同意”類別中。回應了職前培訓的充分性（見上文表 5-11），隨後是描述應該受到更多關注的培訓部分（請參閱表 5-12）。考察三個機構（即聖彼得堡，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我們發現，總體上最不認同的是崗前培訓足夠的共識，我們發現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除其他外）都認為，更多的關注應該“手工”支付（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為 25%，在波特蘭為 14.1%）和“武器/致命力量”（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為 20.2%，波特蘭為 15.6%）。聖彼得堡軍官報告說，需要“更多/繼續”培訓（14.5%），以及“防禦性”培訓戰術/控制技巧（14.5%）和“場景/角色扮演/實際應用”（17.7%）指令。有趣的是，沒有一個諾克斯維爾軍官表示最滿意。他們對職前培訓的態度表示需要“更多/繼續”的培訓，在進行後續調查的人員中，有 41.4% 的人指出，應該進行動手操作。

調查第四節的最後兩個問題著重於對服務少了致命力訓練。就像在職前培訓中提到的那樣，我們發現八個機構之間的協議。如表 5-13 所示，在韋恩堡之間達成了協議（同意率為 56.1%，僅“強烈”同意為 13.8%）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同意率為 59.4%， “非常”同意為 14.2%）。在另一端是哥倫布軍官，其中 88.5% 的軍官同意他們的在職培訓是足夠的。

當被要求提供應接受的在職培訓領域的信息時更多關注（請參閱表 5-14），韋恩堡 23.5% 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27% 軍官報告說，他們認為應該進行“更多/持續的培訓”。一個相似的人們也注意到了這種情緒，這不僅是最不利的在職培訓評估代理商，還包括阿爾伯克基（25.9%），聖彼得堡（41.1%）和夏洛特-梅克倫堡（32.1%）的受訪者。在服務中最有利的看法中進行致命武力訓練後，我們發現大約五分之一的哥倫布軍官要求更多關注“地面戰鬥/攻勢”，而諾克斯維爾受訪者中有 30.4% 請求更多的“親身實踐”培訓（這與他們要求的類似職前培訓課程）。

摘要

本部分調查的目的是評估軍官對適當性的看法他們在服役前和服役中使用致命訓練的程度較低。而大多數來自所有機構的受訪者都認為兩種培訓都足夠，我們確實發現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的差異。一，*職前*評估減少致命性使用部隊訓練通常比*在職*訓練更有利。在服務前培訓方面，諾克斯維爾和阿爾伯克基軍官最受青睞，而聖彼得堡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軍官最不受歡迎。對於在職培訓，據報導，哥倫布軍官的反應最為滿意，而反之則最差。為韋恩堡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而著稱。一部分受訪者回答了我們關於這兩個領域的開放式問題需要更多關注的培訓類型。各機構中最不利的崗前培訓的意見，大量的聖彼得堡軍官等等希望更多地關注“防禦策略/控制技術”，“方案/角色”娛樂/實踐應用，以及“更多/繼續”培訓，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軍官通常想要更多的“親手/動手”和“武器/致命武力”。訓練。就對現役部隊持最不利態度的機構而言培訓以及其他領域，韋恩堡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警官人數很多想要“更多/繼續培訓”（許多其他受訪者也一樣）以及“防禦性”戰術/控制技術的指示。

背景 and 人口統計

在最後一節中，我們報告了各種受訪者背景下的發現，以及人口因素以及未來的願望。而一般的模式（即多數）這些因素在各個機構之間有些相似，我們確實發現了相當大的差異，因為好。如表 5-15 所示，來自所有機構的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男性-從韋恩堡的 93.2% 到聖彼得堡的 81%。對於兩性和種族（如下），考慮到軍官可能存在的保密問題，我們選擇不問調查中的受訪者。相反，在製定這些措施時，我們利用了官方機構記錄（作為我們主要部門花名冊的一部分），將該數據與我們唯一的鏈接每個人員的識別號。

在種族方面，儘管我們確實發現，所有受訪者中大多數都是白人各機構之間的差異。對於非白人受訪者，在諾克斯維爾（4.4%），而發現最多的是阿爾伯克基（39.1%）。而且，在我們的五個城市中，模態非白人受訪者是黑人。模態非白人受訪者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阿爾伯克基是西班牙裔，而波特蘭的莫代爾非白人受訪者是亞洲人。我們還要求官員報告其目前的婚姻狀況。除了聖彼得堡，所有機構的大多數官員都已結婚（在波特蘭（阿爾伯克基）達到 61.7%）。總體而言，約有十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離婚了-從諾克斯維爾的 8.5%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 14.1%。為了可能在以後推斷出社交影響力，請官員告知關於他們是否有家庭成員也從事警務工作。該在所有站點中，大多數受訪者的家庭成員都不是警察。擁有一個（或多個）受訪者的比例最高，是在阿爾伯克基（38.2%），而夏洛特-梅克倫堡（30%）的百分比最低。就軍事經驗而言，大多數受訪者（無論沒有任何軍事背景。我們確實發現了這種經歷的變化在各個站點之間，有 44.2%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軍官報告有軍事背景，而僅有 22.9%的波特蘭軍官報告了這種經歷。我們跟進了這個問題，就像我們稍後針對大學經歷所做的一樣，詢問被調查者（他們回答“是”）是否相信他們的軍事經驗有助於他們成為一名警察。隨著輕微除了諾克斯維爾（76.7%的回答“是”）外，受訪者絕大多數報告說他們相信他們以前的軍事經驗幫助他們準備成為一名警察（範圍從韋恩堡的 98.3%到波特蘭的 85.5%）。關於教育，我們要求軍官報告其最高水平的正式他們完成的教育（即從“中學以下”到“大學學位”）。有趣的是，絕大多數受訪者俱有某種形式的大學經歷（範圍從阿爾伯克基的 79.8%到波特蘭的 99.2%）。在整個大學經歷中，我們發現完成水平的變化。例如，大多數大學經驗諾克斯維爾，聖彼得堡和阿爾伯克基在大學學習兩年或以上（沒有學士學位和以下（分別為 56.6%，53.4%和 53.4%）。相比之下 60.6 波特蘭，夏洛特-梅克倫堡的 50%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 45.9%人員完成了學士學位。我們還發現，研究生的工作（和學位）很多在所有機構的受訪者中普遍較少（從哥倫布的 3.7%到美國的 13.8%波特蘭）。如所報告的學士學位，研究生工作和研究生學位所證明的那樣，波特蘭的受訪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巡邏人員，而事實恰恰相反諾克斯維爾和阿爾伯克基巡邏人員。正如我們為軍事背景所做的那樣，我們詢問了軍官是否相信他們的大學經驗（從“一些”大學到研究生學位的各個層次）幫助他們做好了準備他們的職業是警察。有趣的是，我們沒有找到相同程度的事實像我們對那些報告軍隊的人一樣，支持大學經驗對警察的幫助經驗。在那些有大學經歷的人中，我們僅在科羅拉多州的三個機構中找到斯普林斯，波特蘭和韋恩堡，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大學工作幫助他們做好成為警察的準備。有趣的是，兩個部門之間具有大學經驗的人員（例如，阿爾伯克基和諾克斯維爾）的比例最低發現回答的受訪者比例最低（分別為 40.4%和 32.3%）“是的”，他們的大學經歷使他們為警務做好了準備。我們的最後三個指標（即年齡，組織經驗和整體警務）經驗），就像之前報導的有關性別和種族的經驗一樣，並沒有問到受訪者，而是從每個站點的主名單中收集。³⁵從受訪者的年齡來看，我們發現站點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我們年齡最大的受訪者（平均年齡約為 38 歲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的軍官中，發現年齡偏大，中位數為 36）。平均年齡我們其餘站點的平均年齡從阿爾伯克基的 34.3 歲到 36.7 歲不等老在韋恩堡。關於組織任期，巡邏人員的平均經驗為阿爾伯克基為 5.1 年，韋恩堡為 9.1 年。最少數量的人員在阿爾伯克基（平均= 5.1，中位數= 4.0），諾克斯維爾（平均=6.9，中位數= 5.0）和聖彼得堡（平均值= 7.5，中位數= 4.0）。我們的調查還問受訪者之前曾在其他警察機構工作過，如果有的話，還有多少經驗。我們這次增加了組織任期，以獲取總體警察經驗。這允許我們要說明某名人員將 15 年經驗轉移到我們其中一位的情況他/他可能已經工作了一年的網站，並將這些信息報告給我們。而準確地記錄了他/她的組織任期一年，該人員的總經驗為錯過了，因此他們可能不會像一般人那樣思考和處理警察信息有一年經驗的人。這項措施使我們能夠考慮到這種情況差異。如表 5-15 所示，將組織經驗與總體經驗進行比較經驗，各機構的平均警務經驗年限增加。結果揭示與組織經驗指出的趨勢相似。也就是說，經驗最少的軍官仍然在阿爾伯克基（平均= 6.4，中位數= 4.0），諾克斯維爾

(平均= 7.9, 中位數) 中發現= 7.0) 和聖彼得堡 (平均= 8.0, 中位數= 4.0) 受訪者, 而經驗最豐富的受訪者在韋恩堡 (平均= 10.3, 中位數= 9.0), 波特蘭 (平均= 10.3, 中位數= 9.0) 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平均= 10.4, 中位數= 8.0) 受訪者。

最終表 5-16 根據受訪者的職業期望來評估他們的職業抱負。

他們對提升為更高級別的專業單位的相對重要性是他們退休後對最高排名的期望。為了第一關於垂直和橫向提升的重要性的兩個問題, 我們利用了標準李克特調查項目, 其中受訪者根據相對重要性回答 (即, “非常不重要”, “有點不重要”, “非常重要”和“非常重要”)。在晉升至更高級別, 受訪者通常會在各個網站之間達成協議, 關於它的整體重要性。對於每個站點, 模態響應都“有點”重要, 只有三個站點 (即, 諾克斯維爾, 阿爾伯克基和聖彼得堡) 做到了 (至少) 60 百分比的受訪者認為, 晉升到更高的職位很重要 (即, 結合“有點”和“非常”響應)。有趣的是, 在其他五個站點中, 回答這種晉升非常“高”的官員比例與認為它“非常重要”的人相比並不重要。鑑於受訪者在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上有些分歧在職業方面, 我們發現轉向專業部門時的態度要好得多。在每個代理商, 但波特蘭 (大多數情況下, 三分之二及更高) 都相信在不同程度上對橫向提升至關重要。諾克斯維爾軍官放置了在所有網站上進行垂直促銷的重要性更高 (即, 較高的受訪者比例報告說這對整體和“非常”都很重要), 聖彼得堡在專業單位。實際上, 儘管每個機構都報告“非常重要”的百分比更高與上移相比, 在整個組織中移動的反應是, 沒有機構能夠接近在聖彼得堡的受訪者中發現 40.6%。基於這些結果, 很明顯官員們至少在此刻都希望轉移到專門部門排名上升。

最後, 作為他們未來願望的另一個指標, 我們要求受訪者指出他們退休時期望保持的排名。鑑於不同的垂直差異在我們的代理商中發現, 產生了不同的等級結構, 其中列出的一些分類是與某些部門相關, 而與其他部門無關。如果不存在給定等級該特定機構, 在該單元格中放置了一個星號。³⁶ 我們發現, 大約五分之一哥倫布的韋恩堡, 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相信他們將在巡邏隊退休。

另一方面, 很少有受訪者 (從哥倫布的 1.6% 到哥倫布的 7.4% 諾克斯維爾 (Knoxville) 認為他們將在助理/副科長或科長級別退休。隨著波特蘭例外, 他因其獨特的“偵探”反應而傾向於分散反應選擇, 諾克斯維爾 (大多數機構) 的大多數受訪者認為, 他們會退休於中層管理職級 (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 60.9% 到科羅拉多州的 50.4% 哥倫布)。³⁷

摘要巡邏人員調查的最後部分的目的是捕獲各種背景和人口因素 (其中一些是從其他官員那裡收集的組織數據) 以及受訪者的未來願望。跨各種因素, 我們發現了站點內部和外部的變化。同時, 一些模式是揭示。

所有受訪者中, 大多數是白人, 已婚 (聖約翰大教堂除外)。彼得斯堡), 男性, 沒有軍事經驗, 在治安方面沒有親戚, 並且至少有一些大學經驗。在確實具有軍事和/或大學背景的受訪者中, 人們注意到, 更強大的經驗 (就準備成為一名警察而言) 軍事。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約為 35 歲, 年齡最大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的受訪者中發現了軍官。經驗範圍從不到一年到 38 年, 而阿爾伯克基, 諾克斯維爾和聖彼得堡的最少有經驗的 (組織和整體) 受訪者。就警察的總體願望而言, 警察 (在所有地點) 都表達了更多有興趣晉升到專業部門而不是晉升。最後, 模態響應指出, 所有受訪者中的大多數認為他們最終將在某些地方退休中層管理職位的類型。

第 6 章

強制報告數據

除了調查官員有關其機構使用武力政策的情況外, 該項目的第二階段涉及三件官方物品的收集和分析數據: 使用武力報告, 公民投訴和訴訟。在本章中, 我們研究力報告以調查哪些政策類型與不同程度的武力相關, 以及犯罪嫌疑人和軍官受傷。

方法

在每個站點，我們收集了 24 個月的部隊報告數據。時間框架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從一個站點到另一個站點，以確保我們有一個一致的時間段，而沒有任何政策更改實質上（即政策的內容或類型發生了變化，例如改變了戰術安置）或報告（即，部隊報告格式已更改或可報告部隊的閾值已更改）（有關確切的時間範圍，請參見腳註 26）。一些研究站點編碼幾乎所有電子數據（即波特蘭，夏洛特-梅克倫堡，哥倫布），僅維護其他數據紙質副本（例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韋恩堡，諾克斯維爾），但其他副本電子數據和紙質副本之間的結合（聖彼得堡，阿爾伯克基）。那些城市僅在紙上捕獲武力行為的使用，就要求我們將數據編碼為電子形式格式。即使在某些（或大部分）數據已經過電子編碼的城市中，我們通常不得不回到紙質原件上，以充分編碼我們當時的所有變量感興趣的（即，部分部隊表格已由各機構電子編碼，但必須由項目人員提供紙質版的信息作為補充）。例如，在阿爾伯克基，所用力量的類型被捕獲，我們無法比較強制類型與其他城市使用的類型相同，僅是因為其在數據集中的編碼方式。因此，我們必須製作紙質報告的副本，然後將其與電子案子進行匹配，以闡明使用的力的類型，並將其編碼到數據集中。儘管我們對許多相關的情境和上下文變量感興趣從力報告數據中，我們要捕獲的關鍵變量涉及力的類型用於響應向警官提出的抵抗嫌疑人的類型。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確保每個城市編碼的部隊類型具有可比性。因此，我們在每個城市建立了“抵抗力和武力”的“通用措施”。

對於市民電阻，分為以下幾類。

1. 合規涉及可疑行為響應軍官的指示而沒有抵抗。

2. 被動抵抗被定義為可疑對警察的口頭交流或指示沒有反應的行為。

在此的行為類別不得言語化或在防禦或激進的模式，而是通過不活動來展示（例如，被忽略或忽視的警察嘗試進行口頭交流或控制，ii 行，無法做出實際反應或移動）。

3. 口頭抵抗包括嫌疑人口頭拒絕警察口頭交流或指示。

此類別中的可疑行為本質上必須是口頭的，而不是身體上的（例如，他或她將不遵守警察指示，獨自離開或不打擾他或她）。

4. 防禦性抵抗被定義為可疑企圖逃避警察的控制企圖。

此類別中的可疑行為必須涉及某種形式的身體行為。防禦模式（例如，嘗試離開現場，逃離，躲藏不被發現，遠離人員的掌握）。

5. 主動抵抗包括嫌疑犯企圖或實際攻擊或打擊一名軍官。

此類別中的可疑行為必須涉及某種形式的身體攻擊性行為（例如沖向警察，用手，拳頭毆打警察，腳踢或任何可能被視為武器的工具，例如刀，棍，煎鍋）。

6. 最後，致命的抵抗被歸類為可能導致死亡的企圖或實際襲擊。

警察將使用武力的行為分為無武器戰術和武器戰術。對於無武器戰術分為以下幾類。

1. 首先，我們將手銬編碼為它在數據集中或在使用力報告表格時被記錄下來。

2. 牢牢抓住一名軍官抓獲/拘捕嫌疑人，這也可能涉及押送人員引導犯罪嫌疑人的行動（例如，將犯罪嫌疑人放入巡邏車中）。這種力是只是在警官接觸或引導嫌疑犯時進行低水平的強制操作，但不能與犯罪嫌疑人作鬥爭或具有侵略性。

3. 壓力點（即疼痛依從性）技巧）會導致特定身體部位疼痛的握持物（例如，錘子鎖，手腕鎖，手指握住）。

4. 控制動作超越了牢固的抓地力或疼痛依從性技術並牽涉到一名軍官用武力企圖控制犯罪嫌疑人（例如手掙扎著將嫌疑人的手銬起來，手臂技巧，熊抱等）。

5. 刪除涉及犯罪嫌疑人被砸，推或推倒在地的牆上的情況，緊貼汽車或其他任何表面。

6.最後，空手打擊身體用手，拳頭，腳，腿或身體的任何其他部位（例如，打耳光，拳打腳踢）。對於武器戰術，以下類別都是自定義的，分為化學噴霧劑，警棍，CED，撞擊彈藥（例如豆袋）和槍支。³⁸

分析和發現

通過工作量測度測力的頻率我們首先研究人員在八個城市使用武力的頻率。此外，我們研究了與三種工作量測度有關的使用武力的頻率：呼籲服務，報告犯罪和逮捕。如表 6-1（底部行）所示，使用力範圍在過去的兩年中，範圍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 738 到哥倫布的 5,787。比較中通過標準的服務呼叫來強制使用，我們發現城市。例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使用了 1.4 的力量。每千次通話次數服務。從另一角度看，警員每 729 個服務呼叫便使用一次武力。與波特蘭（因呼喚次數最多而使用武力的城市不同）服務）人員每 1,000 個服務呼叫使用 9.8 次武力，或每 102 個呼叫使用一次服務。換句話說，當使用服務呼叫作為比較點時，波特蘭使用武力的頻率比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高出七倍。通過報告的數量比較城市時，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犯罪。在這裡，夏洛特-梅克倫堡使用武力的頻率最少。軍官一次使用武力每提交 87 件報告的第一部分索引犯罪。相反，韋恩堡曾使用一次力量第 I 部分每 12 項都將犯罪定為索引。因此，韋恩堡的官員使用武力的次數超過了七倍經常比夏洛特-梅克倫堡的軍官高

最後，在比較逮捕行動中的兵力使用情況時，還發現了實質性的變化。與要求服務類似，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在逮捕方面最不常使用武力（每 12 次逮捕就提交一份部隊報告）。另一方面，哥倫布軍官使用最常使用武力（每進行 2.3 次逮捕就提交一份武力報告）。因此，哥倫布使用武力的頻率比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高出五倍。

力和阻力類型

接下來，我們將對物理力類型（無武器戰術）進行細分，如下圖所示表 6-2。數字是根據所使用的力量類型相對於每個城市提交的強制報告。韋恩堡使用的物理力最多，為 91.1%。這不是鑑於這是唯一一個日常巡邏人員不攜帶武器的城市，這太令人驚訝了 CED。在連續數據的另一端，僅一半以上（53.9%）的武力報告由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參與了無武器戰術。在牢牢把握方面，一些城市（例如，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報告使用的人數比其他城市（例如，波特蘭和阿爾伯克基）高得多報告很少使用這種武力。看來，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函數報告程序的數量比該級別上實際使用力的差異。根據例如，聖彼得堡的部門官員通常會舉報這種舉動使用時有效。然而，在波特蘭，官員報告說，儘管使用了這種形式的經常使用武力，與其他更嚴重的武力一起使用時，軍官通常不報告力量形式。

關於其他軟手戰術，諾克斯維爾報告使用了最大的壓力點（10.9%），而夏洛特-梅克倫堡報告使用最多控制動作（77.3%）並擊落（55.0%）技術。最終，韋恩堡軍官在幾乎每 3 次用力報告（32.0%）。下一次最頻繁的硬碰的城市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以 20.7% 的比率排名。聖彼得堡和哥倫布都報告使用了用力相對較少（分別為 7.0% 和 6.9%）。

在表 6-3 中，我們檢查了基於武器的部隊類型的細分。再次，數字根據所使用的力量類型相對於每次提交的力量報告總數來計算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使用最多的武器是 62.7%，而韋恩堡使用超過 25% 的某種形式的武器。當整體看這張桌子時顯然，使用的大部分武器是化學噴霧劑和 CED。接力棒和影響彈藥相對較少。例如，阿爾伯克基最常使用警棍僅在 2.7% 的案件中使用了這種武力。看著化學噴霧劑，阿爾伯克基和韋恩堡在遭遇的部隊中分別有 24.8% 和 22.1% 依靠這種力量分別是夏洛特-梅克倫堡，諾克斯維爾和波特蘭，分別報告約四到五百分。

在表 6-3 中最突出的力量類型可能是 CED。尤其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報告說，在所有遭遇的部隊中有一半使用了 CED（49.5%）。與城市次高的使用頻率是波特蘭，為 23.4%，不到科羅拉多州的一半斯普林斯報告。可以理解，Fort Wayne 報告很少部署 CED（只有一個配備 CED 的人員）。

最後，波特蘭報告稱槍支指向和其他形式的槍支使用率大大提高部隊報告中未明確規定的部隊。例如，波特蘭警官報告指出他們的槍支佔 8.0%。第二高的城市是夏洛特-梅克倫堡 4.3%。

表 6-4 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施加力使用情況。為了便於演示，武力的類別可分為以下幾類：軟手（即堅硬抓地力，壓力點，控制動作，擊落動作），硬手（即空手打擊）和化學噴霧和 CED /影響（即 CED，警棍，彈藥）。注意排名力用法根據最高水平是一個艱難的命題。作為國家機構調查結果如第 3 章所述，以及第二階段選定的八個城市，通常沒有接受力排名。但是，根據國家機構的調查結果，常用排名與表 6-4 中使用的排名一致，因此按此順序顯示。如下表所示，哥倫布最有可能使用最低的形式力（軟手，65.1%）；韋恩堡最有可能使用中級手/化學噴霧劑，佔 47.1%，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最有可能使用最高水平（CED /影響，51.3%）。在任何一個城市中，很少有致命的武力事件。相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手感最少（22.0%），波特蘭的手感最少。手/化學噴霧劑（14.5%），韋恩堡的 CED /影響最小（4.1%）。

表 6-5 列出了公民的抵抗力。

幾乎所有城市報告的高水平公民抵抗。除波特蘭外，所有城市都佔百分之九十找出或報告公民以某種方式抵抗的所有情況。在查看類型時抵抗力的報告顯示，不遵守行為的程度差異很大，而差異較小，儘管在防禦性和侵略性身體方面仍然相當可觀。就.....而言未能遵守（即被動和言語抵抗），哥倫布表明幾乎所有力量案件涉及這種抵抗，而阿爾伯克基和韋恩堡佔 30% 範圍。對於身體防禦的抵抗，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聖彼得堡，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的比例都在 70% 到 80% 之間，而波特蘭和阿爾伯克基則在在 40% 的範圍內。總體而言，從相對角度來看，變化不太明顯積極的身體抵抗力。除聖彼得堡以外，這種形式的範圍其餘七個城市的阻力在 31% 至 51% 之間。因此，諾克斯維爾（51.3%）報告的侵略性身體抵抗力是兩倍以上聖彼得堡（20.0%）。

與表 6-4 相似，表中使用了最高水平的物理力。

八個城市的抵抗力最高。如下表所示，哥倫布報告說，最不遵紀守法的案件是可疑抵抗的最高形式（25.7%）；堡韋恩最有可能報告防守身體抵抗（64.0%），諾克斯維爾最多可能會報告侵略性身體抵抗（48.8%）。有更少的實例諾克斯維爾報告的傷亡率最高（3.9%），在任何一個城市中都是如此。鑑於解釋軍官使用武力的方式有些困難與迄今為止基於系列表的電阻相比，表 6-7a 和 6-7b 提供了更多統一的方式來解釋八個城市中最高水平的武力和抵抗。使用表 6-4 中提供的力排名（0 = 軟，1 = 硬/化學，2 = CED /碰撞，4 = 致命），表 6-7a 顯示，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平均力水平最高（1.31），而哥倫布最少（0.47）。同樣，使用表中提供的阻力等級 6-6（0 = 無，1 = 不遵守，2 = 防禦，3 = 攻擊性，4 = 嚴重），表 6-7b 顯示：阿布奎基的平均抵抗力最高（2.53），而波特蘭的最低（1.92）。當同時查看表 6-7a 和 6.7b 時，可以看到對於某些城市，阻力和力量的排名非常相似。例如，阿爾伯克基警官第二大部隊，但面對最抵抗的嫌疑犯。此外，夏洛特-梅克倫堡兵力使用量排名第四，抵抗力排名第三。但是，有些城市顯示相對於阻力大小，所用力的大小之間存在更多的脫節至少在總體上如此處所示面對。例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警官使用了最高的力量，但僅遇到第五高（即最高等級）的抵抗力。

波特蘭顯示出相似的斷開程度（即，使用比面臨的阻力）。但是，有幾個城市，特別是韋恩堡和諾克斯維爾，反向模式。例如，諾克斯維爾軍官報告說抵抗力第二高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武力僅次於第五。雖然這些比較沒有提供有關阻力/力的各個微觀動力學的全貌，提供城市總體位置方面的總體比較。

雙變量分析

接下來，我們考慮不同部門如何（通過部隊政策）指導官員相對於面對的主體抵抗力應使用的力的類型，這樣我們就可以挖掘更深入地研究軍官如何在其個人內部使用各種形式的武力政策背景。表 6-8 顯示了我們研究中將阻力與力量聯繫起來的六個部門。其他兩個城市（韋恩堡和哥倫布堡）未通

過其政策將抵抗力量聯繫在一起，而是簡單地佈置連續力，而與特定類型的力沒有明確的聯繫抵抗性。有趣的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採用輪力連續體設計他們不想讓官員“線性思考”的既定目的，仍然使抵抗力與在其政策文本內施加強制。

我們首先研究每個城市的官員如何回應這些嫌疑犯。

在整個遭遇中最大的阻力是無法遵守（即被動）和語言抵抗力）。如表 6-9 所示，大多數此類遭遇導致軍官使用某種類型的軟手戰術（例如，牢固的抓地力，控制動作，壓力點，下來）。在將武力與抵抗聯繫起來的城市中，只有阿爾伯克基允許軍官對口頭或被動地犯罪嫌疑人採取比軟手手段更具強制性的手段抵抗。⁴²換句話說，阿爾伯克基允許軍官使用化學的硬手戰術噴霧和/或 CED 對那些非身體上不遵守的人。儘管如此，阿爾伯克基仍然相當依賴輕柔的戰術。表 6-10 還描述了警官面對嫌疑犯的遭遇未能遵守，但在這種情況下採取了強硬手段（例如，打擊嫌疑犯）用手，拳頭，腳）。韋恩堡軍官最有可能使用硬手戰術（22.7%）這些情況，但他們的政策並未指定禁止人員使用這種武力（記得他們的政策沒有將抵抗和武力聯繫在一起）。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軍官用力儘管此類政策限制了此類遭遇，但大約每五（19.0%）次此類遭遇中就有一次發生用法（表 6-8）。相反，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的政策只允許這種武力面對八次這種類型的遭遇，但沒有一個軍官用硬手報告

罷工。

表 6-11 列出了不符合化學噴霧用法的情況。再一次，

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有 8 個案件懷疑，沒有結果。哥倫布有 31.4% 的病例使用化學噴霧劑其次是聖彼得堡，佔 23.5%。供 CED 使用（表 6-12），阿爾伯克基警官在八起案件中有三起使用了這種武力（37.5%），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則使用了 CED 58 名被動或口頭抵抗嫌疑犯中有 26 名（44.8%）。表（6-13）描述了以下情況嫌疑人沒有以他們最高的抵抗方式來遵守，並且在少數情況下軍官用了警棍。諾克斯維爾最高，為 9.4%，但這僅佔 32 個中的 3 個案件。

總體而言，當觀察犯罪嫌疑人的最高抵抗水平是未能遵守（表 6-9 至 6-13），看來部門的政策影響不大。對於例如，雖然案件數量很少（N = 8），但我們看到阿爾伯克基軍官沒有必須對此類嫌疑犯施加更高形式的力量（例如，硬手，化學噴霧，CED）即使他們的政策允許這樣做。相反，我們看到其他城市的官員使用因未能遵守嫌疑人而受到限制的武力。例如，科羅拉多州 Springs 警官在 44.8 個案件中對被動或口頭抵抗嫌疑犯使用了 CED，而諾克斯維爾軍官在 21.9 起案件中使用了這種武力。下一組表格（6-14 至 6-18）與上一組表格採用類似的方法，但是在這些表格中抵抗的形式是身體防禦（即逃避警察的身體行為）企圖進行控制，例如支撐，拉開和/或逃離軍官）。考慮相對於所面對的阻力類型所使用的力的類型，同樣重要的是放置表 6-8 中的調查結果顯示了每個城市的政策允許的範圍。例如，在所有城市中，都允許對這種類型的抵抗採取軟手，但其他形式的武力是是否允許（取決於城市）。例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允許人員使用化學噴霧劑和 CED，但不要用力擊打或用撞擊的方法（例如，指揮棒的打擊或彈藥）。其他城市為此水平混合併匹配不同的變化抵抗性。

與以前未能履行案件類似，大多數人身防禦遇到這種情況，軍官使用了某種軟手戰術（表 6-14）。再次，科羅拉多斯普林斯（Springs）是唯一的城市，在這種城市，軍官用軟手戰術對這種抵製做出反應少於 50% 的情況。在對結果進行硬手戰術檢查時（表 6-15）很難根據政策差異來識別模式。例如，在波特蘭，不允許對防禦力強的嫌疑人進行嚴厲打擊的城市，使用頻率是 13.0%。但是，在三個允許硬碰硬的城市中（阿爾伯克基，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的百分比非常相似，分別為 14.7%，15.3% 和 14.9 百分比。與波特蘭類似，科羅拉多溫泉限制硬擊擁有防禦力的嫌疑犯，在其遭遇的 22.1% 中使用了這種武力。最高的頻率城市是韋恩堡（31.7%），該城市沒有將力量與抵抗聯繫在一起。

除了阿爾伯克基（18.4%）和韋恩堡（18.1%）外，如表 6-16 所示，對身體防禦嫌疑犯而言，化學噴霧很少見。另外，在許多城市中，CED 的使用（表 6-17）更為頻繁。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在這種情況下，使用 CED 的頻率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高（50.1%）。有趣的是，通常限制 CED 的兩個城市（聖彼得堡和夏洛特-實際上，在這些類型的抗藥性中使用 CED 的頻率方面實際上有所不同案件。聖彼得堡，指示軍官在對身體有攻擊性的抵抗力上使用 CED 犯罪嫌疑人（但不是人身防禦）在 23.9% 的時間內依賴這種武力。反過來，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採取了類似的政策，儘管限制性較小，但使用了 CED 僅佔 10.5%。最後，警棍的使用，例如無法抵抗如表 6-18 所示，在具有防禦力的可疑嫌犯中很少見。韋恩堡是最高，僅為 2.0%。在整個城市中，有六個城市的接力棒使用案例少於 10 個兩年期間。

接下來，我們研究每個城市的官員如何應對侵略性抵抗嫌疑人（例如，對企圖或實際上打擊了一名軍官）。從表 6-19 開始，我們看到除科羅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在與人打交道時，大多數遭遇都涉及軟手戰術侵略性嫌疑犯。諾克斯維爾的數量最多，為 87.4%，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最低，為 39.9%。認真檢查後發現差異很大如表 6-20 所示。在這裡，韋恩堡軍官在哥倫布軍官使用 35.3% 的遭遇時採取了硬手戰術這樣的力量只佔他們遭遇的 13.9%。轉向使用武器，表 6-21 著眼於化學噴霧和攻擊性武器抵抗性。在這些情況下，阿爾伯克基和韋恩堡使用的化學噴霧最多（分別為 32.1% 和 30.9%），而夏洛特-梅克倫堡和諾克斯維爾使用最少（分別為 6.3% 和 7.1%）。

關於 CED 的使用，表 6-22 顯示了 Colorado Springs 官員在積極應對時更有可能訴諸 CED 與其他城市相比，抵抗力強的嫌疑犯。具體來說，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官員在這類案件中，CED 佔 51.1%。下一個最接近的城市是波特蘭（33.2）百分。最後，表 6-23 檢查了警棍的使用情況和具有攻擊性的可疑物。如圖所示，整個指揮棒的使用很少。阿爾伯克基（3.8%）和韋恩堡（2.6%）指揮棒使用最多，而聖彼得堡（0.3%）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0.9%）使用最少。鑑於有關檢查部隊使用武力的表格數量龐大電阻類型（表 6-9 至 6-23），接下來的三張表提供了更統一的外觀。

表 6-24 結合了表 6-9 至 6-13 的不同類型的力

與嫌疑人遭遇的關係，其中最大程度的嫌疑人抵抗是不遵守。表 6-25 和 6-26 通過組合物理防禦力遵循類似的邏輯（表 6-14 至 6-18）和身體抵抗力（表 6-19 至 6-23）。看著這三個表作為一個整體整體出現了幾個主題。首先，哥倫布對這三種抵抗都使用了最柔和的手法。其次，韋恩堡在處理所有三種類型的抵抗性。對於後一個發現的一種解釋可能是事實：韋恩未配備 CED。另一種解釋是，他們的政策可能會被考慮與將抵抗力量聯繫在一起的六個機構相比，限制較少。但是，哥倫布也不能將抵抗力量聯繫起來，我們在那個城市找不到類似的結果。第三，科羅拉多處理三種類型的阻力時，最常彈出 CED。也許車輪設計有助於解釋這一發現，儘管從政策文本來看似乎很明顯不鼓勵軍官對被動或口頭抵抗嫌疑犯使用 CED。第四，阿爾伯克基在處理兩者時最依賴化學噴霧在身體上具有防禦性和侵略性的嫌疑人。第五，哥倫布軍官最有可能使用對未遵守嫌疑人進行化學噴霧，這似乎與其政策（將化學噴霧劑置於連續政策的較低位置）。第六，諾克斯維爾儘管限制使用警棍，但仍未能遵從嫌疑人，因此警棍使用率最高（9.4%）在他們的政策範圍內。

摘要

從這組分析中很難說明明顯的政策效果。例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對 CED 的高頻使用，或諾克斯維爾對指揮棒的高頻使用，針對被動和言語防禦的嫌疑人，儘管他們的政策建議不要這樣做；要么波特蘭警官對防禦性犯罪嫌疑人採取強硬手段的程度。但是，還有其他發現似乎與代理機構的政策和類型有關與所面臨的可疑抵抗類型有關的力量，就像所有城市的官員都在允許的範圍內或一致。

多元分析

除了檢查與可疑抵抗有關的各種形式的力量雙變量方式，我們還希望更全面地了解警官使用

控制可疑的抵抗水平和其他可能解釋警官使用原因的因素力。結果，我們運行了兩個具有最高力水平的多元模型（有序對數）作為因變量（0 = 軟手，1 = 硬手和化學噴霧，2 = CED 和衝擊武器，3 = 致命力量）。⁴³

表 6-27 概述瞭如何定義自變量以及

與假定的強迫關係。表 6-28 提供了有關以下內容的描述性統計信息：我們首先檢查最大的作用力，如表 6-29 所示。在這模型，我們將 Albuquerque 用作參考類別，因為他們的政策可能被認為不那麼限制範圍比表 6-8 中列出的其他城市（例如，除了衝擊力，所有其他形式的力都位於連續體的底部）；因此，我們會期望阿爾伯克基軍官使用更多武力。因此，我們假設每個城市的官員在模型中使用的力量將少於阿爾伯克基軍官。除了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結果顯示，假設與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軍官相比，城市中的所有城市都不太可能使用更高形式的武力。的這些，只有波特蘭未能達到統計意義。相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官員與阿爾伯克基相比，大多數人使用更高水平的武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能是先前分析中如此大量使用 CED 的結果。一般來說，這樣調查結果在政策效果方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即政策轉化為行為差異）。

表 6-30 還檢查了最高級別的力量。在此模型中，我們使用 Charlotte-梅克倫堡（Mecklenburg）被列為參考類別，因為他們的政策可能被認為更具限制性與表 6-8 中列出的其他城市相比（例如 CED 和衝擊力位於城市的頂部）連續體）；因此，我們希望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軍官使用更少的武力。因此，我們假設模型中每個城市的官員將比夏洛特使用更多的武力，梅克倫堡州軍官。

在這裡，我們發現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阿爾伯克基，波特蘭和聖約翰的軍官。彼得斯堡的所有部隊都比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軍官使用更多的力量。但是，沒有諾克斯維爾，韋恩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軍官。結果，我們再次在政策方面找到了部分支持效果（即政策轉化為行為差異）。

摘要

就像我們從二元分析得出的摘要評估一樣，多元分析表明很難確定任何類型的一致政策效果。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發現在採取不同政策方法的情況下，官員會按照人們的預期行動，而在其他情況下我們則不這樣做。最明顯的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運用最高水平的武力排除了政策和其他控制措施（例如，可疑的抵抗，懷疑擁有武器，懷疑人口統計數據）。

嫌疑犯和武力

在本節中，我們研究人員報告嫌疑犯受傷的程度。特別是，我們要檢查傷害的任何差異是否可能與我們的八個機構使用的不同類型的武力政策。我們從表 6-31 開始。圖是根據相對於總力的傷害頻率來計算的每個城市提交的報告。如圖所示，到目前為止，夏洛特-梅克倫堡報告的人數最多的可疑傷害佔 73.5%。其次是諾克斯維爾（45.9%）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37.1%）。接下來的四個城市（韋恩堡，波特蘭，阿爾伯克基和哥倫布）都報告了在 26% 至 27% 的範圍內。最後，聖彼得堡的受傷人數最少，為 15.9 百分。

表 6-32 列出了可疑人員受傷的類型。請注意，沒有百分比為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或阿爾伯克基市提供，因為該信息無法可靠地捕獲他們使用武力的報告表格。如圖所示，韋恩堡的瘀傷最多（17.4%），波特蘭擦傷最多（50.4%），諾克斯維爾割傷最多（49.2%），韋恩堡最多骨折（2.2%，儘管由於病例數很少，所以我們要謹慎）和堡壘韋恩受“其他”傷害最多。⁴⁶有趣的是，在韋恩堡五個類別中的三個類別中排名第一。此外，受傷人數最多的城市（夏洛特-梅克倫堡）在任何個人傷害類型類別中均未排在首位。

出現了幾個有趣的參考點。首先是夏洛特-梅克倫堡和聖彼得堡都將 CED 的使用範圍限制在具有攻擊性的可疑犯罪嫌疑人（連續性較高）就可疑傷害而言，它們處於相反的兩端（夏洛特-梅克倫堡報導的最多受傷，而聖彼得堡最少）。此外，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在遠距離使用 CED 比其他所有城市的官員更多，但他們在受傷。第二，可以說是三個限制政策最少的城市（韋恩堡和哥倫布因為

沒有將抵抗力聯繫起來，而阿爾伯克基因為沒有允許在任何形式的抵抗力上使用任何形式的力量，但撞擊力除外（如果未遵守嫌疑人），則所有因涉嫌傷害而處於中低範圍。一個可能假設較少的政策限制可能導致更多的傷害（即，因為官員將有更多的傷害自由），但實際上，我們發現此類政策與傷害相對較少相關。第三名，諾克斯維爾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受傷百分比。但是，他們的政策大不相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採用滾輪設計，並保留硬手戰術和衝擊力，以抵抗侵略性嫌疑人，而諾克斯維爾允許軍官不僅使用硬手戰術和衝擊方法對於具有防禦力的嫌疑犯，還包括化學噴霧劑和 CED。四，如果懷疑受傷按照傷害最大到傷害最小的順序進行排名，然後與可疑抵抗力進行比較級別（請參閱表 6-7b），發現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例如，聖彼得堡報告的平均抵抗力最低，受傷嫌疑人的百分比最低。進行此類比較時，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阿爾伯克基，在抵抗力方面排名最高，但在傷害方面僅排名第六。第五，如果將可疑傷害按大多數傷害排序為最小傷害，然後進行比較到官兵水平（見表 6-7a），與抵抗水平。例如，夏洛特-梅克倫堡受傷最多，但第四名最高的兵力，而阿爾伯克基受傷僅次於第六但第二高力量水平。

軍官受傷與武力

在本節中，我們研究了官員在報告期間受到傷害的程度他們的部隊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根據 2007 年聯邦調查局的出版了《被殺和毆打的執法人員》，全美共有 57 名警官國家被公民殺害，有 59201 人受到襲擊（每 100 名軍官 11.4 人的比率），其中 5,479 人造成了文件傷害（每 100 名警官 3.0 例）。我們的數字是經過計算的關於傷害頻率與每人提交的武力報告總數的關係。請注意，沒有為阿爾伯克基提供百分比，因為該信息不是使用武力報告表可靠地記錄下來。如表 6-33 所示，諾克斯維爾報導軍官受傷率最高（14.8%），其次是夏洛特-梅克倫堡（13.4%），科羅拉多斯普林斯（12.7%），韋恩堡（12.2%），聖彼得堡（9.3%），波特蘭（9.0%）和哥倫布（8.1%）。

表 6-34 列出了受傷人員的受傷類型。沒有百分比對於 Colorado Springs 和 Albuquerque，因為此信息無法可靠地捕獲到他們的強制報告表格。如圖所示，波特蘭的瘀傷最多（16.5%），夏洛特-梅克倫堡是擦傷最多（43.8%），諾克斯維爾割傷最多（33.6%）和骨頭骨折（2.9%，儘管我們非常謹慎，因為案件數量很少），而哥倫布是“其他”案件最多的受傷。⁴⁷有趣的是，諾克斯維爾在五個類別中的兩個類別中排名第一。出現了幾個有趣的參考點。首先，軍官受傷的百分比平均而言，比可疑傷害要低得多。實際上，最高的城市軍官受傷百分比（諾克斯維爾，14.8%）仍低於最低的城市可疑傷害百分比（聖彼得堡，15.9%）。因此，官員的程度在所有城市中，受傷人數遠低於涉嫌受傷的人數。

其次，與懷疑受傷。小範圍的傷害從哥倫布的 8.1% 上升到僅 14.8% 諾克斯維爾的百分比。回想一下，聖約翰州的可疑傷害範圍是 15.9%。夏洛特-梅克倫堡的彼得斯堡高達 73.5%。第三，夏洛特-梅克倫堡和聖彼得堡都將 CED 的使用限制在具有積極抵抗力的嫌疑人身上（連續劇），但夏洛特-梅克倫堡報導的軍官比例第二高受傷的人數最多，而聖彼得堡僅佔七個城市中第五高的百分比。此外，在所有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使用 CED 的頻率遠高於軍官。其他城市，但這個城市的軍官受傷率仍然是第三高。第四，兩個城市的政策限制最少（韋恩堡和哥倫布（因為他們沒有將抵抗力聯繫起來）落在軍官的中低範圍受傷。人們可能會認為，限制性較小的政策可能導致更多的傷害（例如，由於官員將有更多的自由），但實際上我們發現此類政策與傷害比較大。第五，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取得了第一名，受傷率第二高。但是，他們的政策大不相同。在特別是，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軍官被限制使用 CED 或衝擊力懷疑他們，除非他們積極抵抗。諾克斯維爾的政策對使用 CED 和撞擊武器，允許這種力量用於展示防禦抵抗。第六，如果軍官的受傷程度從最多傷到最少受傷，然後與可疑的抵抗力水平相比（見表 6-7b），有相當數量的找到相似之處。例如，諾克斯維爾（Knoxville）報告了第二高的平均抵抗力水平，受傷率最高的軍官 其他城市的程度相似

（即，犯罪嫌疑人的抵抗力越強，據報告受傷的官員越多）。

第 7 章

市民投訴數據

與部隊報告一樣，該項目第二階段的關鍵部分涉及收集投訴數據。在本章中，我們將檢查投訴以調查政策類型與公民投訴的數量，類型和結果之間的關係。

方法

投訴的數據收集過程反映了部隊數據的過程，包括每個城市相同的 24 個月期限。這些時間框架確保了一致的兩年期間，每個站點的內容或報告均未更改使用武力政策。就像部隊報告數據一樣，一些研究站點對所有報告進行了編碼電子投訴數據（例如，哥倫布，夏洛特-梅克倫堡，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其他人僅保留紙質文件（例如，韋恩堡，諾克斯維爾和聖彼得堡），其他的則具有電子和紙質數據的組合（即阿爾伯克基）。僅網站將投訴案件的紙質檔案保存為電子格式。即使是在以電子方式提供數據，研究小組必須參考投訴文件的紙質副本，以便獲得必要的信息（例如性格和紀律）。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必須從多個外部來源收集數據。例如，在阿爾伯克基，內政部對許多投訴信息進行了記錄和電子存儲。但是，某些關鍵變量（例如投訴人的人口統計信息）是更好地由市獨立審查辦公室收集，該辦公室負責監督投訴調查。因此，我們必須從各個來源收集投訴數據，以便充分捕獲比較八個站點中每個站點的投訴所需的所有變量。我們希望確保收集的投訴數據在各個站點之間具有可比性。由於每個站點的投訴過程各不相同，因此這被證明具有挑戰性。對於例如，投訴僅在某些地點（例如韋恩堡）由內部事務部調查，由內政和其他地方官兵的指揮鏈相結合（例如，哥倫布，夏洛特-梅克倫堡，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聖彼得堡和諾克斯維爾），或其餘地點的部門實體和外部監督機構的組合（即，波特蘭和阿爾伯克基）。此外，評估投訴的過程調查價值也各不相同。為了確保我們將類似類型的跨站點的投訴，僅由某些部門或部門調查過的投訴包括外部實體進行分析。因此，被拒絕，拒絕的投訴，滅活，不被視為違反政策，經調解，撤回，在攝入時解決或因故取消的研究不包括在內。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公民對官員的投訴上。我們的目標是獲得更好地理解每種投訴的類型，數量和結果部。總之，我們能夠收集我們八個地點的所有調查過的公民投訴。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在以下分析中，只有外部投訴反對宣誓的軍官。因此，針對未宣誓就職的警察的投訴沒有納入研究。

在我們每個研究站點中，與投訴相關的許多特徵事件，提起投訴的公民以及接獲投訴的官員集。但是，出於當前的目的，允許比較的鍵變量為跨站點進行，並允許將調查結果與每個站點的部隊政策相關聯，指控官員的不當行為類型。具體來說，我們的重點集中在兩個方面先前的研究在檢查時已確定為重要指標的指控類型有關使用武力的投訴：武力和不禮貌的指控（Terrill 和 McCluskey，2002）。在每個站點上，對暴力指控和不禮貌指控均進行了編碼從投訴數據。

除了編碼力量和不禮貌的投訴外，調查結果也進行了編碼。從數據中編碼了四個主要發現，分類為持續的，免責的，不持續的或沒有根據的。最後，常見的措施還制定了紀律處分措施。紀律處分被編碼為無，監督行動，命令諮詢，書面譴責，中止，終止或“其他”。“其他”類別反映了不經常執行的操作，例如降級或在收集數據時待處理。

分析和發現

投訴頻率

我們的分析從檢查八個方面的公民投訴頻率開始部門。表 7-1 列出了所有公民投訴的頻率和百分比每個站點。應當指出的是，本章介紹的分析著重於針對八個部門的官員的投訴指控。在某些情況下，多個可能在一次事件中針對軍官提出了指控，而在其他事件中實例中可能針對某公司中的多名官員提出了多項投訴指控事件。我們將每項不當行為指控視為關注的結果。其他話說來，*投訴指的是對官員提出的每項不當行為的單獨指控。*

根據表 7-1，韋恩堡的市民投訴總數為 94

兩年期間在哥倫布達到 2,542。基於公民投訴總數提起訴訟的韋恩堡，夏洛特-梅克倫堡和諾克斯維爾使用了最高的百分比強行指控。例如，在韋恩堡（Fort Wayne）的 94 名公民投訴中，有 43% 是針對使用武力。此外，在所有外部投訴中，只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因使用武力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幾乎所有外部投訴的四分之一是在諾克斯維爾。聖彼得堡和阿爾伯克基是兩個地方外力投訴分別只有 8.2% 和 14.5%。類似的結果是因外部不當投訴而被發現，韋恩堡和諾克斯維爾是最高的百分比，而阿爾伯克基和聖彼得堡的百分比最低。將外力的總數與不禮貌的投訴，並針對所有外部投訴總數進行審查每個站點的投訴。在韋恩堡，94 個外部投訴中有 88 個（93.6%）是涉嫌武力或不當行為。這大大高於第二高的水平部門，諾克斯維爾（55%）和夏洛特-梅克倫堡（53%）。雖然韋恩堡有最少的公民投訴，其中絕大多數是武力或不禮貌的違法行為。

摘要

本引言部分的目的是報告公民投訴的總數（即指控）以及使用武力的次數（佔總數的百分比）不禮貌的指控。儘管我們發現我們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總數）城市出現了兩種清晰的模式。首先，關於公民投訴總數在我們各機構中，到目前為止，使用武力和不禮貌投訴的百分比韋恩堡最高，而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則較少（見表）7-1）。其次，在頻譜的另一端，我們發現了聖彼得堡和阿爾伯克基與所有相比，該報告的強迫和不禮貌投訴比例最低公民投訴。

投訴處理

除了針對這八類投訴的類型和頻率之外部門，我們還收集了有關投訴結果的數據。儘管有不當行為指控本身，尤其是武力過度/不當，給警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部門的指責並不一定意味著不當行為的發生。也就是說，即使儘管所有投訴都被部門認為具有調查依據，但投訴是通常難以證實（Lersch 和 Mieczkowski，2000 年）。因此，檢查投訴的處理方式，以確定投訴的頻率，尤其是針對過度/不當使用武力和不滿，在整個部門中得到了證實。兩年期間。我們對投訴處理的分析始於所有投訴處理的總數部門調查的公民投訴類型。表 7-2 列出了頻率和部門間四種常見處置指標的百分比：持續（即，不當行為發生），無法持續（即，不當行為無法得到證明或被證明），被免責（即，所涉行為是適當的）或無根據（指稱不當行為）被發現是錯誤的）。⁴⁸ 這些數字為投訴結果提供了基準跨部門調查。

儘管表 7-2 中的結果顯示了每種發現類別的頻率和百分比，當前的討論集中在每個站點上持續存在的公民投訴數量。根據公民投訴總數，持續處置的數量不等從韋恩堡投訴總數的大約 10% 到近 30 聖彼得堡的百分比。

表 7-3 列出了公民因使用武力和失禮。回顧一下表 7-1，暴力投訴的頻率大致在範圍內跨部門提出的公民投訴總數的 8% 至 43%。根據表 7-3 中的結果，這些強迫投訴中相對較少的持續了反對來自八個地點中任何一個的官員。實際上，外力投訴的百分比持續性從零（韋恩堡和聖彼得堡）到百分之五（在阿爾伯克基）。

表 7-3 還顯示了針對不禮貌投訴的處理方式。相比使用武力性格中，發現持續性的勸阻性被發現要多得多頻繁。回憶一下表 7-1，其中約百分之八（阿爾伯克基）至百分之 51（韋恩堡）部門的投訴是出於謹慎。持續勸阻的總數投訴率大約為 8%（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至 28（諾克斯維爾）。⁴⁹

摘要

本節的重點是評估投訴的處理方式（即持續與所有其他城市）。當我們全面審查，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指控時，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發現。首先，關於所有公民投訴，聖彼得堡（29.4）和阿爾伯克基（17.7）的持續投訴比例最高，韋恩堡（9.6）和哥倫布（8.9）的比例最低。回想一下很難將波特蘭的百分比與其他城市進行比較。在審查使用武力和不禮貌指控時，很明顯暴力投訴的百分比持續存在。在說明這一點時，我們發現在阿爾伯克基（5.0%）和夏洛特-梅克倫堡（3.8%）。因此，在高

端，我們發現每二十個中只有一個持續使用武力投訴。另一方面，持續發現有關不當指控的投訴。諾克斯維爾被發現具有最高的持續指控的百分比，而哥倫布最少。

紀律處分

我們還研究了在八個城市中針對官員採取的行動類型被指控行為不檢。這些結果在表 7-4 至 7-6 中給出。我們開始於審查針對每個城市針對各種類型的公民投訴採取的各種行動，這是表 7-4 中的報告。第一行表示針對所有投訴採取的行動總數類型。關於紀律處分的編碼應注意兩個方面。一，總訴訟數量可能會超過投訴總數。這是由於事實單個投訴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例如，某官員可能會收到書面譴責和暫停一項投訴。此外，可能已經採取了行動即使沒有發現投訴也採取了措施。二是紀律處分通常基於整個投訴調查進行管理，這意味著在以下情況下針對軍官的多項指控，紀律是基於投訴案件的情況。由於我們的分析著重於每個單獨的投訴指控，針對每個單獨的投訴指控都採用相同的紀律處分。從而，出現的某些頻率最初可能看起來很高。例如有 20 在兩年內以阿爾伯克基編碼的停賽。這是由於以下事實：相同的紀律處分將被編碼為與投訴事件。在評估跨學科時應牢記這兩個問題每個城市。

大多數公民投訴導致沒有採取紀律處分。在整個城市，大約 71%（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聖彼得堡）到 92%（在哥倫布）的投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鑑於大多數針對官員的投訴不足為奇沒有得到證實。在整個城市中，採取了五種主要的行動類型。監督行動包括在官員的直接監督級別進行諮詢和培訓。監督行動被認為是非正式的，大多數城市並不認為這是非正式的。本質上是紀律性的。其餘的動作是由命令組成的正式動作諮詢，書面譴責，停職和終止。進行比較的一種方法是檢查採取至少一種行動類型的投訴的紀律性質。儘管我們介紹了所有類型的行動，但討論的重點是各個城市之間的比較書面譴責，中止和終止的正式紀律處分。⁵⁰對於所有投訴類型，表 7-4 中的結果表明，至少採取了行動，在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採取了更正式的紀律梅克倫堡。例如，在聖彼得堡，在 72 年採取了某種紀律處分在 245 個總動作中。⁵¹在這 72 項行動中，約有 53% 是正式的紀律處分，包括書面譴責，中止或終止。對於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行動的 51% 是形式上的。另一方面，

表 7-4 中的結果表明，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依賴更非正式的行動在檢查所有類型的公民投訴時。關於使用武力公民投訴的紀律處分，有幾種模式出現。如表 7-5 所示，再次很少採取正式行動，這是因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跨站點使用武力的公民投訴。一旦同樣，波特蘭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比其他城市更頻繁地依賴非正式行動。就正式紀律處分而言，夏洛特-梅克倫堡（3.1）和諾克斯維爾（2.7）記錄了最高的百分比。

轉向紀律處分，針對不正當投訴（見表 7-6），正式很少採取行動，但與使用武力相比，行動的金額始終較高投訴。波特蘭，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諾克斯維爾依靠非正式行動來解決不禮貌的投訴多於其他五個城市。另一方面，夏洛特-梅克倫堡因不滿而採取正式行動和停職的比例最高，哥倫布沒有對任何不禮貌的公民投訴採取任何正式行動。本節的目的是闡明總體上的紀律處分

公民投訴以及使用武力和禮節的投訴。一件事就是非常清楚的是，正式的紀律處分（即書面譴責，停職和終止），在所有類型的投訴中，都是例外，而非非常規。什麼時候我們比較各個城市，我們發現一些共同的趨勢。更具體地說，在所有指控，以及出於武力和不禮貌的指控，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以及諾克斯維爾僅針對謹慎的投訴）持續較少地依賴正式的紀律處分比其他所有城市都多。就正式紀律處分而言，確實領先的城市各種投訴類型中，聖彼得堡（針對所有公民投訴），阿爾伯克基（針對不禮貌的指控）和夏洛特-梅克倫堡（針對所有投訴以及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指控）。

工作量測算的投訴頻率

雖然前面的部分關注於描述力的頻率和在與各個城市進行比較時，城市間不禮貌的抱怨（以及隨後的結果）總體投訴總數，其餘各節重點介紹對我們的主要投訴的更深入分析令人關注的領域-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指控。我們通過以下方式開始討論檢查多長時間外來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八個城市，涉及四個部門的工作量衡量標準：服務要求，舉報的犯罪，逮捕和使用武力報告。表 7-7 報告了使用武力投訴的這些結果，

表 7-8 給出了不禮貌投訴的結果。比較使用武力通過服務呼叫的投訴，我們發現八個城市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在波特蘭，每 1,631 個服務請求中，公民就提出一項強制申訴。相反，使用在聖彼得堡，每 17,885 個求助電話中就有 1 人投訴服務。因此，以呼叫服務為基準時，波特蘭獲得了大約十倍的收益暴力投訴比聖彼得堡的警察多。關於不禮貌的投訴，在波特蘭和夏洛特-梅克倫堡發現了類似的模式。波特蘭有一個每千個服務請求的不當投訴率大大高於其他七個城市。另一方面，夏洛特-梅克倫堡（Charlotte-Mecklenburg）發生率最低：一個不禮貌的投訴每 10,663 個服務電話。在比較第一部分報告的每個城市的投訴率時，也存在差異犯罪。每千人中，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武力和不禮貌投訴率最高第一部分在八個城市的犯罪。公民每 202 部分 I 提出使用武力申訴第 197 部第 I 部罪行中的犯罪行為和提起審慎投訴的案件。另一方面，聖彼得斯堡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每 1959 年和 1,004 個部分要提交一次我分別犯罪。考慮到犯罪數量，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人員收到使用武力投訴的頻率大約高出十倍，而且不禮貌投訴頻率大約是聖彼得堡官員的五倍。在查看與以下情況有關的使用武力和不禮貌投訴的頻率時在第一部分犯罪的逮捕人數中，哥倫布的警官率最高。哥倫布每 27 人逮捕一次使用武力投訴，每 27 人逮捕一次謹慎的投訴 23 逮捕。再次，聖彼得堡的逮捕率最低。聖彼得斯堡每 314 人被捕時就有使用武力的投訴，還有不禮貌的投訴每 161 人被捕。在逮捕人數方面，哥倫布的官員收到了外部投訴大約是十二次（使用武力）和七次（痛苦）經常比聖彼得堡的官員高。最後，我們研究了在有關方面使用武力和不禮貌投訴的頻率兩年期間每個城市提交的使用武力報告的數量 什麼時候查看表 7-7 和 7-8 中的結果，發現了幾種有趣的模式。對於五在這八個城市中，計算了每個部隊報告中的武力和不禮貌投訴數量大約每 10 到 25 份強制報告中就有一項投訴。但是，有兩個城市投訴率要低得多。首先，韋恩堡每 50 人有 1 人抱怨報告和每 42 項強制性投訴中的一項不禮貌投訴。第二，聖每提交 95 支部隊報告，彼得斯堡就有 1 支部隊投訴，而一種是不禮貌的每提交 49 份強制報告，就會發生投訴。另一方面，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投訴率高於其他城市。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公民使用一種武力每四次舉報投訴一次。禮節性投訴也是如此，其中一項每提交四份強制報告就進行投訴。因此，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大約使用了強制投訴的頻率幾乎提高了 24 倍，不禮貌的投訴幾乎提高了是聖彼得堡（費用最低的城市）的 12 倍。

摘要

本節的重點是比較外部使用和使用武力的投訴。反對採取一系列重要的部門工作量措施（請參見第六章）進行類似的使用力分析）。這樣，一些城市從其餘的自己。在有利結果方面，兩個部門領先於其他部門。也就是說，聖到目前為止，在每個公民要求服務的情況下，彼得斯堡使用武力公民的投訴最少，犯罪，逮捕和武力報告。關於不禮貌的公民投訴，聖彼得堡每次逮捕和強制報告的次數最少，每次呼叫和犯罪的次數最少。夏洛特梅克倫堡（Mecklenburg）也表現出色，因為他們是最少禮貌的公民每次通話和犯罪的投訴數量最高，而每次電話投訴的犯罪率僅次於第二逮捕。

在頻譜的另一端，四個部門中的三個部門被發現顯示出最不利的比較。也就是說，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軍官每次使用武力報告和犯罪行為引起的大多數武力和不禮貌公民投訴（與哥倫布）。波特蘭軍官被發現擁有最大的武力和最謙遜的公民每個市民致電的投訴。最後，哥倫布軍官擁有最大的武力和最大的不滿每次逮捕都會引起公民投訴，並與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並列為最謹慎的公民每宗罪行的投訴。

武力和謹慎人員總計

接下來的分析擴展了對使用武力和對軍官級別不禮貌。也就是說，我們研究了八個城市的跨官員的此類投訴，以闡明投訴總數（每位官員）的範圍，官員之間的平均投訴量，以及有部隊宣誓就職的人員所佔的百分比和/或不禮貌的公民投訴。在此過程中，我們的分析僅限於公民投訴在個別人員（通過姓名或徽章使用武力和謹慎態度）下使用號碼）。該決定基於以下事實：我們不想通過包括未透露姓名的人員，歪曲了個人的總數。例如，在哥倫布整體上有 242 項針對“警察部門”的投訴，如果包括在內這些指控，似乎是一名軍官對兩人的指控如此之多，一年學習期。因此，我們排除了此類情況以及我們對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總數與表 7-1 中先前引用的總數不同。⁵²表 7-9 顯示了有關外部投訴的各種人員級別總計武力和謹慎。我們首先介紹官員人數（在我們的專欄中）收到了 x 次投訴。當我們檢查公民投訴的分佈時在我們的城市中，我們發現兩年的總數從一個投訴（每個城市）到十四歲（在哥倫布）。顯然，在某些城市（例如，聖彼得堡和韋恩堡）就每位官員的投訴數量而言（在較低的位置結束）比其他人員（例如哥倫布和波特蘭）的人員總數更多分散（以及更高級別）。

在這些總數之下，我們還列出了公民對武力和不禮貌（任命官員的地方），表示總數的平均數每個官員的投訴⁵³以及標準差。顯然有一定程度的我們城市之間的差異。例如，韋恩堡，聖彼得堡，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的投訴平均約為四分之一，而哥倫布和波特蘭平均每位官員近兩次投訴。

表 7-9 中的最後三行代表組成投訴總數（每個城市），每個部門的宣誓人數（以可能會收到公民投訴的潛在人員總數，以及宣誓率在投訴人員中的人員。例如，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地區共有 387 起公民因武力和禮貌而提出的投訴，而他們的約 35% 的宣誓人員中至少有其中一種抱怨。在整個城市，我們發現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宣誓率最低公民因武力和/或不禮貌而投訴的人員（分別為 9.2 和 10.3），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34.5%）和波特蘭（26.7%）則位於頻譜的另一端。

摘要

本章本節的目的是擴展對公民的分析向軍官級別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為此，我們提出了（每個機構）收到的公民投訴人員的數量（和平均值），以及與宣誓人員總數的比較。結果顯示出一些有趣的東西比較。首先，每個站點的每個官員的投訴範圍從 1 到 14。此外，平均投訴總數（在公民確定的官員中）是最低的對於韋恩堡，聖彼得堡，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最高的是在哥倫布和波特蘭發現。其次，在檢查部門宣誓率方面至少有一個公民投訴的人員，我們發現各個城市之間存在差異。最少的發現在公民中因武力和/或不滿而抱怨的宣誓人員百分比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科羅拉多州最高。

多元分析

最終分析通過檢查外部使用武力和來自多元框架的不禮貌的抱怨。這裡的目的是確定是否一些城市更有可能收到關於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而控制理論上相關的因素。對於此分析模型，我們包括三個提出申訴的公民的特徵（即性別，種族和年齡）。公民性行為和性別是二進制變量，其中男性投訴人和非白人投訴人被編碼為一。公民年齡反映了申訴人提出申訴時的年齡（以年為單位）。在此外，我們還提供了一些虛擬變量，用於衡量提出投訴的城市。⁵⁴

表 7-10 提供了多變量分析中使用的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信息。表 7-11 給出了邏輯回歸結果，預測了外部使用力和不禮貌的投訴。在控制公民特徵時，每個城市都有一個與 Fort 相比，收到武力或不禮貌投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韋恩。儘管所有影響都很大，但阿爾伯克基和聖彼得堡是城市具有最明顯的差異。這兩個城市的官員比其他城市，要比 Fort 軍官對他們進行武力或不禮貌的投訴韋恩。最後，我們發現，所有公民特徵均無統計學意義。

摘要

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多元方法來預測使用強迫和不禮貌的公民投訴。這樣，我們就可以隔離

每個城市的影響，控制其他城市以及理論上相關的公民控制（例如性別，種族和年齡）。在比較城市方面，我們發現在每種情況下我們的七個研究地點接受武力或謙虛的公民抱怨比我們的參考類別-韋恩堡最明顯的在韋伯堡發現了阿爾伯克基和聖彼得堡的不同之處。就我們而言公民控制，在我們的多元模型中沒有統計學上可區分的。

第 8 章

民事訴訟數據

該項目第二階段的最後一部分涉及收集和分析民事訴訟數據。在本章中，我們將檢查這些數據以調查公民據稱警察的不當行為（尤其是濫用武力），其結果或處置指控，以及城市的貨幣支出。

方法

與使用武力和投訴數據類似，我們在每個站點收集了 24 個月的數據在與第 6 章和第 7 章所述的相同時間範圍內。到目前為止，試圖收集民事數據事實證明，訴訟數據比項目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具挑戰性。甚至在那些我們成功的城市所收集信息的實質通常是有限的。我們經歷的許多困難已經由先前的學者討論過（Cheh, 1995, Fyfe, 1986; Worrell, 2001），但 Archbold 和 Maguire (2002) 最好的總結是：有關部門數據收集協議和/或部門或城市的協議不足的問題不願向研究人員發布此類信息。在阿爾伯克基和哥倫布，警察局的城市律師選擇不將這些數據提供給我們的研究團隊。在阿爾伯克基，我們不斷得到應許數據將無法成功公開。在哥倫布。^{ss} 因此，阿爾伯克基和哥倫布未能提交所要求的數據。我們離開讀者可以得出結論，說明為什麼可能會這樣，並且暗示披露調查結果可能具有的數據。在夏洛特-梅克倫堡，警察局官員願意收集和披露數據，但最終我們無法獲得在項目結束之前進行分析。最後，諾克斯維爾向我們提供了民事訴訟數據，但格式不足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因此無法得出任何實質性依據結論。

其餘四個城市願意並能夠在一個城市中披露民事訴訟數據。我們可以用來比較城市的格式。但是，我們提醒您，所提供的信息範圍仍然有限。具體來說，我們唯一能夠完全自信地獲得的信息 glean 包括在我們為期兩年的研究期內提起的訴訟數量，結果或這些案件的處理方式以及貨幣支付的程度。結果，這些數據就是我們能夠依靠以下分析。

分析和發現

鑑於提起的民事訴訟案件相對較少（與武力或民事訴訟相比）投訴），我們不會在要求服務的範圍內提出訴訟，報告犯罪或被捕。相反，我們檢查了表 8-1 中所示的結果。前兩行同時顯示了兩年內提起的訴訟總數學習期以及總數和百分比聲稱存在某種形式的不當行為強制使用。如圖所示，兩個城市之間的區別最為明顯提起訴訟（例如，韋恩堡和波特蘭）以及提起訴訟最少的兩個城市（即，聖彼得堡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韋恩堡（Fort Wayne）經歷了整體上最適合的訴訟（n = 91），以及受力（n = 51）。波特蘭提起訴訟的頻率第二高整體（n = 75），以及受力（n = 48）。這兩個城市也相對較高他們的全部訴訟的百分比涉及不當使用武力的指控（韋恩堡為 56.0% 和波特蘭的 64.0%）。聖彼得堡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位於另一端光譜。聖彼得堡收到 22 起訴訟，其中三起（13.6%）為武力，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共收到 17 宗訴訟，其中三宗（17.6%）為武力。

表 8-1 中的中間兩行表示所有已提起訴訟的案件處理方式

以及涉及武力的案件的案件處置。如圖所示，雖然有城市如何標記各種處置結果（例如，被解散，待定，定居，虧損），在某些城市中也有一些獨特的分類。在特別是，波特蘭有兩起“仲裁”案件（一個案件勝訴，一個案件敗訴），韋恩（Wayne）提出了很多拒絕（n = 43）的申訴（即，未滿足要求的案件）在民事制度中前進的最小證據。從這些結果中收集有意義的物質的最好方法可能是計算該城市敗訴或解決的案件佔總數的百分比提起的訴訟數量。使用此策略並從所有提起訴訟的行 St. 彼得斯堡丟失/解決案件的比例最高，為 54.5%（即 22 起案件中的 12 起）。

緊隨其後的是波特蘭，該公司在 75 起案件中解決了 32 起，輸掉了 42.7%。

韋恩堡（Fort Wayne）的緊隨其後，百分比為 33.0（91 個案例中的 30 個）。

最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在損失或解決率僅為 23.5%的情況下表現最好（17 例中有 4 例）。

將類似的策略應用於部隊部署（即第 4 行），我們看到聖彼得堡丟失/解決案件的百分比最高，為 66.0%（即 3 個強制案件中的 2 個）。

這是其次是波特蘭（Portland），在 48 起案件中，有 20 起和解/敗訴，佔 41.7%。堡

韋恩（Wayne）的第二高比例是 39.2（51 例中的 20 例）。

最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發生了最好的輸掉或解決這三個案件的案件。

最後，表 8-1 的最後兩行描述了各城市的貨幣支出

在兩年的研究期內解決他們的訴訟。如圖所示，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四個城市的最高支出為 \$5,259,326。但是，請務必注意，幾乎所有這一數字（5 250 000 美元）是由於一宗案件涉及若干官員的爭端而產生的。涉及城市的薪酬結構，包括加班費。而且，沒有一個案件涉及部隊涉及金錢支付。波特蘭緊隨其後，所有人的支出最高，為 1,292,649 美元訴訟和涉及暴力的訴訟 967,656 美元。其餘兩個城市更少的支出。聖彼得堡最終支付了 145,899 美元，但其中只有 5,500 美元適用於強制案件。韋恩堡因遺失/解決案件而支付的總金額略低，為 113,899 美元，但在部隊案件方面更多（54,674 美元）。在以下情況下應注意謹慎將表 8-1 底部腳註中所示的貨幣支出解釋為-數字是根據可用信息報告的。

摘要

儘管我們只能收集和分析有限的信息關於我們四個城市的民事訴訟，出現了一些重要發現。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展銷狀況非常好。在為期兩年的學習期間，僅提起了三起有關濫用武力的訴訟。其中，兩名被解僱，一名在項目結束時仍在等待中。另一方面，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在研究期間，沒有濫用武力的案件得以解決或丟失，隨後也沒有支付任何款項。緊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之後的是聖彼得堡，僅解決了兩個案件。而且，這兩個案例的總支出僅為 5500 美元。相反，波特蘭和韋恩堡都有 20 起涉及不當使用的案件在研究期間穩定下來或失去的力量。但是，貨幣支出這兩個城市之間的交易額可觀，波特蘭為此支付了近一百萬美元訴訟，而韋恩堡最終支付了超過 50,000 美元。一個人須要意識到在韋恩堡 20 宗案件中有 9 宗沒有報告金錢數字，可以大大增加他們的支出，並使其與波特蘭更加同等。

第九章

項目摘要調查結果

第一階段

在第 3 章中，我們介紹了旨在評估各種警察機構在全國範圍內使用武力政策的書面使用類型，特別是那些包含使用力連續體的方法。以下是關鍵摘要發現：

強制連續體策略

<

超過 80% 的應急機構使用某種類型的部隊連續統政策。在這些代理機構中，線性設計是最常用的（73%），其次是矩陣/盒式設計和圓形/輪式設計，每個都有大約 10 個使用它們的代理商百分比。

<

關於部隊戰術的戰術佈置（軟手，疼痛合規控制，硬手）和武器（警棍，化學噴霧劑，CED），以及警察機構如何根據進步程度對這種次序進行排序，關鍵發現未被發現是當前的巨大變化。

<

在概述其部隊進展情況的 476 個機構中，共有 123 個發現了不同的排列，範圍從三到九不同級別（絕大多數（390%或 82.0%，取決於五六個級別）。

<

在列出公民抵抗進展的 371 個機構中，共有 23 個發現了排列，範圍從三個到七個不同的級別（絕大多數（343 或 92.4%）依靠五到六個級別）。

<

對於試圖將強制連續性方法納入其部門的部門制定政策，並向軍官提供有關大多數兵力類型的明確指導給定各種不同類型的抵抗（例如，將公民的抵抗與武力聯繫起來），很難確定通常使用的偏好。

<

最常使用的方法只有 20% 部門，而第二和第三最常用的方法僅是 10% 的一半。

<

化學噴霧劑和 CED 的放置似乎提供了最大的效果，警察管理人員在部隊中的正確位置方面面臨的挑戰連續統一體。

<

大約有 30% 的代理商使用化學噴霧劑時會感到疼痛合規技術，另外 30% 的部門化學噴霧劑採用硬手策略，並且超過三分之一機構使用撞擊武器噴灑化學噴霧。幾個，不多；屈指可數部門甚至將化學噴霧劑的濃度降低到空手軟技術（n = 12）和致命力一樣高（n = 6）。

<

與化學噴霧相比，它的變化較小關於 CED 的位置，但遠未達成明確共識。近 60 百分之幾的機構將 CED 置於衝擊武器級別，而另有 2.0% 的人將其與致命武力一起放置。剩餘的機構將 CED 置於某種程度的強製作用下（機構將 CED 與空手戰術保持在同一水平另有 13.1% 的 CED 採用疼痛順應技術放置）。

第二階段

在該項目的第二階段，我們選擇了八個警察機構，以對使用武力政策和做法。每個機構對於指導人員使用武力，我們試圖確定哪種類型的政策為警務人員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結果。為此，我們依靠四個數據的主要來源：巡邏人員調查，使用武力報告數據，投訴數據以及民事訴訟數據。在這裡，我們介紹了從以下各個方面收集到的主要發現數據。

巡邏人員調查數據

在我們的巡邏人員調查的第 5 章中，我們捕獲了有關總體上減少致命性使用武力政策，政策的相關成果以及培訓與政策相關聯。以下是這些主要方面的主要發現的摘要部分。

更少的致命武力政策認知

在評估軍官對其致命性使用武力政策的看法時，我們利用了重點關注政策援助，限制，清晰，指導，並審查公平性。在此過程中，我們會根據其總體協議對訂單城市進行排名，與每個相關問題的分歧（即“強烈”和“某種程度上”的回應相結合）調查項目。在本節的最後，我們介紹了跨以下五個主要的政策認知領域。對於本節中的所有排名，得分較低表示更積極或更有利的看法。

幫助

首先，根據各部門對調查的同意程度對其進行排名質疑他們的致命力較低的政策“協助軍官決策”。諾克斯維爾軍官表示最積極的評估，而聖彼得堡表示最不滿意的評價。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阿爾伯克基，3-韋恩堡，4-哥倫布，5-科羅拉多斯普林斯，6-波特蘭，7-夏洛特-梅克倫堡，8-聖 聖彼得堡。

限制性

以類似的方式，我們還根據每個部門與調查問題表明，他們的致命武力政策“過於嚴格”。聖彼得堡軍官諾克斯維爾軍官表示最強烈的信念是他們的政策是限制性的另一端（即政策不太嚴格）。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科羅拉多溫泉，3-韋恩堡，4-阿爾伯克基，5-哥倫布，6-波特蘭，7-夏洛特-梅克倫堡，8-聖 聖彼得堡。

明晰

接下來，我們按照主管人員的同意書來表示部門的等級順序減少致命性的使用武力政策“很明顯。”對政策明確性最有利的評估是來自諾克斯維爾，而波特蘭軍官則最不樂觀明確。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阿爾伯克基，3-夏洛特-梅克倫堡，4-韋恩堡，5-科羅拉多斯普林斯，6-哥倫布，7-聖 聖彼得堡，波特蘭市。8。

指導

在對部門進行指導方面，我們利用了調查項目要求官員在以下方面對他們的政策提供指導的程度

“何時可以使用武力，何時無法使用武力。”在各個部門中，波特蘭在其部門中排名倒數第二。

同意該政策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指導。另一方面，諾克斯維爾，就像他們為獲得幫助和明確所做的那樣，他們對自己的政策持最強烈的積極態度充分指導他們使用武力。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阿爾伯克基，3-夏洛特-梅克倫堡，4-哥倫布，5 街 彼得斯堡，科羅拉多州 6 泉，韋恩堡 7 州，波特蘭市。

評論公平

我們的最後一個主題是評估總體上對殺傷力較小的政策的看法，這與前四個領域著重於政策的解釋和利用，而處理使用武力後的審查程序。下面，我們介紹了評估認為，“對使用武力報告的監督審查是公平的。”在波特蘭軍官中，人們對監督評審公平性的態度有所不同，而最少的是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發現了積極的態度。

<

排名：

1-波特蘭，2-諾克斯維爾，3-哥倫布，4-韋恩堡，5-Charlotte-Mecklenburg，6-Albuquerque，7-St。彼得斯堡，科羅拉多州 8 泉。

摘要

雖然本節說明了各個部門在對其看法進行排名時的差異各自使用武力政策的核心領域，人們可能還會想知道各部門如何根據這些尺寸累積排序。表 9-1 通過結合使用對前五個小節的結果進行排名，

以更全面地描述部門對他們使用致命性較小的武力政策的排名。這並不奇怪，諾克斯維爾

（Knoxville）迄今為止領導所有部門對部隊政策的整體評估，而聖彼得堡是最後一個。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阿爾伯克基，3-韋恩堡，4-哥倫布，5-夏洛特-梅克倫堡（Mecklenburg），科羅拉多州 6 泉市，波特蘭市 7 街 8 號。聖彼得堡。

減少致命力政策的成果

除了評估機構在總體上使用武力政策方面，我們還也有興趣根據重要成果評估政策觀點，所有這些都具有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在行為上進行了研究。也就是說，我們問官員們估計，對潛在的公民傷害而言，使用武力政策的殺傷力較小（研究第 6 章中的行為），軍官受傷（第 6 章中的行為研究），公民投訴（在第 7 章中按行為研究）和訴訟（在第 8 章中按行為研究）。要求官員用以下類別之一回答這些問題：“增加可能性”，“減少可能性”或“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可能性”。

潛在的公民傷害

關於公民傷害，各部門巡邏人員的模態反應是他們的代理機構的武力政策降低了潛在的公民傷害的可能性。這些模態響應的變化使我們可以對具有較低值的訂單代理商進行排名更積極的評估（即報告該政策的受訪者比例最高降低可能性）。就像對部隊政策的總體看法一樣，諾克斯維爾排名第一。頻譜的另一端是韋恩堡，其所佔比例最低的受訪者表示，該政策降低了可能造成公民傷害的可能性。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St. 彼得斯堡，3-阿爾伯克基，4-科羅拉多斯普林斯，5 夏洛特-梅克倫堡，6 波特蘭，7 哥倫布，8 韋恩堡。

潛在的軍官受傷

當被問及武力政策對軍官潛在傷害有什麼影響時，機構的模態反應是“降低可能性”，而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Mecklenburg）意見分歧，雙方都做出了模態反應，認為他們的政策實際上有所增加軍官受傷的可能性。鑑於後者會建議您做出負面評估（對於“降低可能性”找到的最低響應百分比），我們仍然對訂單進行排序從正面到負面的部門。諾克斯維爾再次舉行了最有利的政策態度，而聖彼得堡對其政策的正面評價最低（即人員受傷的可能性）。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科羅拉多斯普林斯，3-阿爾伯克基，4-哥倫布，5-波特蘭，韋恩堡 6，夏洛特-梅克倫堡 7-聖保羅 聖彼得堡。

潛在的公民投訴

評估有關武力政策和公民投訴的態度更成問題比前兩個結果要好。雖然約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部門表示，該政策增加了公民投訴的可能性我們八個部門中有六個部門的回應是，軍官認為他們的政策增加或減少潛在的公民投訴的可能性，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聖彼得堡有模態回應，表明軍官認為該政策增加了公民投訴的可能性。因為對“既沒有增加也沒有增加”的反應降低可能性-表示沒有影響，部門無法對其中一個進行評分另一個。

潛在的訴訟

就像針對公民投訴的結果一樣，對於武力政策對在大多數部門中，潛在訴訟的強度更高，通常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未排名）。我們八個部門中有六個部門的模態回應是認為他們的政策不會增加或減少潛在訴訟的可能性，聖彼得堡和諾克斯維爾的情態回應表明，軍官認為政策降低了訴訟的可能性。

摘要

闡明軍官對武力政策對軍事行動的潛在影響的看法結果多種多樣，模態反應表明等級排序機構的問題較少用於評估公民和官員的受傷情況。諾克斯維爾舉行了最有利的評估政策對公民和官員的傷害都有影響。對政策最不積極的評價被發現是韋恩堡（因公民受傷）和聖彼得堡（因軍官受傷）。在另一方面，大多數部門對公民投訴和訴訟的信念是可以忽略不計。

培訓和減少致命力政策

我們對軍官對致命力降低的看法的最終評估與培訓有關警察收到的信息，大概包含了該機構政策的各個方面。而各部門的大多數巡邏人員都同意他們的培訓是足夠的，我們發現各個站點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以下是售後服務部門的排名和在職培訓分別進行，也可以進行累積培訓（將各個二維）。

職前培訓

就減少致命力的學院（或職前）培訓而言，最有利的是評估在諾克斯維爾（見表 9-2）。光譜的另一端是聖彼得堡。彼得斯堡軍官報告了對兵役前訓練最不積極的看法。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阿爾伯克基，3-哥倫布，4-夏洛特-梅克倫堡，韋恩堡 5 號，波特蘭 6 號，科羅拉多州 7 斯普林斯 8 號街。聖彼得堡。

在職培訓

關於在役部隊訓練，我們還發現部門，而且通常比職前培訓中所提到的態度要少。在哥倫布發現了對現役軍人訓練最有利的看法，而最少的是韋恩堡的巡邏人員中有好感。

<

排名：

1 哥倫布，2 諾克斯維爾，3 夏洛特-梅克倫堡，4 阿爾伯克基，5 波特蘭，6 街 彼得斯堡，科羅拉多州 7 泉，韋恩堡 8。

摘要

表 9-2 中的最後一行通過合併部門來報告總體排名職前和在職培訓中提到的職位。與整體政策一樣認識到，諾克斯維爾領導了其他部門的積極培訓評估。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聖約翰發現總體力量訓練的積極性最低。聖彼得堡。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哥倫布，3-阿爾伯克基，4-夏洛特-梅克倫堡，5 波特蘭，韋恩堡 6，科羅拉多州 7 泉，聖 7 街 聖彼得堡。

摘要

最後，為了進一步總結代理商排名，我們評估了軍官對整體政策的看法排名（表 9-1），政策對潛在的公民和官員受傷（請參閱第 185-186 頁）以及職前和在職培訓與策略相關聯（來自表 9-2）。這三個排名加在一起得出與整個城市的整體評估。因此，最有利的城市總體而言，人們的看法是諾克斯維爾，而最不利的累積評估被發現在聖彼得堡，在較小的程度上，波特蘭和韋恩堡。

整體政策公民/官員受傷排行

排行

1-諾克斯維爾

1-諾克斯維爾

2-阿爾伯克基

2-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韋恩堡 3

2-阿爾伯克基

4 哥倫布

4 街 聖彼得堡

5 夏洛特-梅克倫堡

5 波特蘭
6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5 哥倫布
7 波特蘭
夏洛特-梅克倫堡 7
8 街 聖彼得堡
韋恩堡 8
訓練綜合政策認知排行
排行

1-諾克斯維爾
1-諾克斯維爾
2 哥倫布
2-阿爾伯克基
3-阿爾伯克基
3 哥倫布
4-夏洛特-梅克倫堡
4-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5 波特蘭
5 夏洛特-梅克倫堡
韋恩堡 6
6 波特蘭
7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韋恩堡 6
7 街 聖彼得堡
8 街 聖彼得堡

強制報告數據

在第 6 章中，我們研究了多種比較城市的方式，軍官使用武力，軍官面對抵抗的性質，以及兩者的結合。在此外，我們檢查了嫌疑犯和軍官受傷情況。在這裡，我們嘗試總結關鍵發現，更重要的是，將調查結果置於有意義的背景下，以便讀者可以更輕鬆地評估各種政策方法的優缺點。

與徵兵，舉報犯罪，和逮捕

表 9-3 列出了每個城市的城市使用力變化情況。

被放置在要求服務，舉報的犯罪和逮捕的範圍內。⁶⁰ 跨越每行是城市相對於指標的排名（即通話，犯罪，逮捕）。較小的數字表示較小的力，而較大的數字表示較大的力。這些等級是然後總結所有三個指標的綜合排名。如圖所示，科羅拉多斯普林斯（Springs）表現最好（即，軍官使用的力量最少），而韋恩堡（Fort Wayne）跌倒在相反（例如，軍官使用的力量最多）。

<

排名：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2-夏洛特-梅克倫堡，3-諾克斯維爾，4-阿爾伯克基，5-聖彼得斯堡，哥倫布 6 號，波特蘭 7 號，韋恩堡 8 號。

總幹事部隊

表 9-4 包含了與表 9-3 類似的排名系統，用於統計和排名力，但在這種情況下，將檢查各種類型的力。檢查力這種方式表明，到目前為止，哥倫布軍官使用的武力最少。反過來，波特蘭軍官總體上使用最多的力量。

<

排名：

1-哥倫布 2-聖彼得斯堡，3-科羅拉多斯普林斯，4-諾克斯維爾，韋恩堡 5，阿爾伯克基 6，夏洛特梅克倫堡 7，波特蘭 8。

綜合可疑性

表 9-5 通過對可疑反抗人員的數量進行排序來遵循相同的方法面對類型。此處的區別在於排名是相反的。在這些情況下，降低數字表示更大的阻力，而數字越大表示阻力越小。因此，諾克斯維爾軍官面對最具挑戰性的嫌疑人（即抵抗能力最強的人），而韋恩堡軍官面臨的挑戰最少的犯罪嫌疑人（即抵抗力最小的嫌疑人）。

<

排名：

1-諾克斯維爾，2-夏洛特-梅克倫堡，3-哥倫布，4-阿爾伯克基，5-科羅拉多斯普林斯（St. 彼得斯堡，波特蘭 7 號，韋恩堡 8 號。

相對於抵抗力

反轉表 9-4 和 9-5 之間的排名系統的主要原因是：比較表 9-6 中描述的“相對”力與阻力。舉例來說，一個城市的排名 8 上的力量和抵抗力的第 8 點（總計 16）表示一個城市，那裡的官兵使用了很多武力，但相對來說阻力很小。相反，一個城市的排名 1 對力 1 對電阻（總計 2）表示一個城市，官兵使用的力量很少，但面臨很大的抵抗，相對。那些有很多力量和抵抗力，或者很少有力量和抵抗力的城市是平等對待。例如，城市排名 8 上的力和 1st 導通電阻（即，大量的力和電阻）將總和為 9，和排名等同於城市排名 1st 上的力和 8th 電阻（即一點力量和阻力）。因此，較高的數字和等級表示一個城市使用的力量比面對的阻力要大，而數量和等級較低表示一個城市，官員面對的抵抗力比使用的力量更大。在這個在表 9-6 中，哥倫布軍官相對於面臨阻力。相反，波特蘭軍官使用的武力相對較高到面對的阻力水平。

<

排名：

1-哥倫布，2-諾克斯維爾，3-聖彼得斯堡，4-科羅拉多斯普林斯，5-Charlotte-Mecklenburg，6-Albuquerque，7-Wayne 堡，8-Portland。

摘要

從表 9-3 中獲取匯總級別的發現，並將其與表 9-6 中的調查結果使我們可以對哪些城市進行更明確的評估在使用武力的頻率方面表現更好，同時也考慮了懷疑抵抗。如表 9-7 所示，在匯總和比較排名時，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和諾克斯維爾的票價相對較好；夏洛特-梅克倫堡，哥倫布，聖彼得堡，阿爾伯克基落在中間範圍；波特蘭和韋恩堡的票價相對較差。

<

排名：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1-諾克斯維爾，3-夏洛特-梅克倫堡，3-哥倫布，5 街 聖彼得堡，阿爾伯克基 6，韋恩堡 7，波特蘭 7。

力和阻力比較

在綜合考慮力和阻力後，我們轉向雙變量和多變量檢查。特別是，我們研究了官員的回應方式（即對特定類型的抵抗（例如，不遵守，防禦性的身體，好鬥的身體）。此外，我們還研究了整個控制其他因素的城市可能會引發壓力。主要發現如下：

<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哥倫布和聖彼得堡軍官使用了多種形式的硬招，化學噴霧劑和 CED 對錶現出公正性的嫌疑犯儘管他們的政策建議反對這種武力，但仍未遵守抵抗。

<

同時，阿爾伯克基的政策允許在口頭上使用 CED 抵抗力強的嫌疑犯，但軍官很少使用它。

<

波特蘭的政策建議警官不要在防禦抵抗的嫌犯，而阿爾伯克基，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的政策允許這種武力。但是，官員是所有四個城市都使用了力的形式類似。

<

此外，與波特蘭類似，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政策也建議不要對防禦性犯罪嫌疑人採取強硬策略，但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警察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頻繁地使用這種武力。

<

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通常將 CED 的使用限制為犯罪嫌疑人積極抵抗的情況，但在這兩個城市的官員儘管政策相似，但使用這種力量的方式卻大不相同（例如彼得斯堡軍官經常使用 CED，而夏洛特-梅克倫堡則使用 CED 很少）。

<

與我們的雙變量分析一致，多變量分析表明很難確定任何類型的一致政策效果。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發現軍官按照變化的預期行事政策方針，而在其他情況下則沒有。

摘要

從這一系列分析中，我們無法在人員方面找到明顯的聯繫行為在政策範圍內運作-實際上，我們經常發現軍官在似乎超出政策範圍的嫌疑犯。這種行為不僅限於某種城市或政策方法。儘管調查結果令人質疑政策與政策之間的聯繫行為，讀者應謹慎解釋。首先，肯定有如第 6 章所示，官員的行為屬於其政策範圍內任務。第二，主要是本質上是雙變量的，不允許其他對手控制可能解釋軍官使用他們的部隊的原因的因果因素，從而證明行為實際上是在政策之內，而不是在政策之外（請參閱腳註 43 和 44）。

嫌疑犯和武力

利用來自部隊報告的數據，我們還檢查了可疑傷害。更多具體來說，我們針對可疑傷害發生率計算了可疑傷害率與每個城市提交的部隊報告總數有關。以下是各城市的表現從可疑傷害最少的城市（即聖彼得堡）到最可疑的城市受傷（例如，夏洛特-梅克倫堡）。

<

排名：

1 街 彼得堡，2-哥倫布，3-阿爾伯克基，4-韋恩堡，5 波特蘭，6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7 諾克斯維爾，8 夏洛特-梅克倫堡。從政策角度來看，我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發現：

<

各個城市的傷害範圍差異很大：聖保羅州為 15.9%。彼得斯堡在夏洛特-梅克倫堡的比率為 73.5%。

<

夏洛特-梅克倫堡和聖彼得堡都限制 CED 的使用抵抗力可疑的嫌疑犯，但就嫌疑犯的傷害而言卻落在相反的兩端（夏洛特-梅克倫堡州軍官受傷最多，聖彼得堡最少）。

<

而且，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使用 CED 的頻率比其他城市的軍官，但他們僅佔第三高受傷。

<

可以說，限制性最低的三個城市（韋恩堡和哥倫布不將抵抗力聯繫在一起，阿爾伯克基允許所有類型的對口頭抵抗嫌疑犯施加的力）均落在嫌疑犯的中低範圍內受傷。

<

諾克斯維爾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分別位居第二和第三受傷百分比。但是，他們的政策大不相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採用滾輪設計，並保留硬手戰術和向積極抵抗的嫌疑人施加衝擊力，而諾克斯維爾則允許軍官不僅在防禦上使用硬手戰術和衝擊方法嫌疑犯，還要化學噴霧和 CED。

軍官受傷與武力

利用來自部隊報告的數據，我們還檢查了軍官受傷情況。更多具體來說，我們針對人員受傷的頻率計算了相關人員受傷率每個城市提交的武力報告總數 以下列出了城市與官員受傷最少的城市（即哥倫布）到官員受傷最多的城市（即哥倫布）諾克斯維爾）。⁶¹

<

排名：

1-哥倫布，2-波特蘭，3-聖彼得堡，韋恩堡 4，5-科羅拉多斯普林斯，6-夏洛特-梅克倫堡，-7-諾克斯維爾。從政策角度來看，我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發現：

<

在以下情況下，城市之間在人員受傷方面幾乎沒有差異比起可疑的傷害。

<

小範圍的傷害從哥倫布的 8.1% 上升到諾克斯維爾的 14.8%。

<

軍官受傷率平均低於可疑受傷率。

<

軍官受傷比例最高的城市（諾克斯維爾，14.8%），仍低於可疑比例最低的城市受傷（聖彼得堡，佔 15.9%）。

<

夏洛特-梅克倫堡和聖彼得堡都限制 CED 的使用抵抗，但夏洛特-梅克倫堡報導的第二高百分比軍官受傷，而聖彼得堡只報告了第五高的百分比。

<

而且，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使用 CED 的頻率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軍官，但這個城市仍然只有第三高軍官受傷百分比。

<

限制政策最少的兩個城市（韋恩堡和哥倫布堡）因軍官受傷而跌至中低檔。一個人可能會認為這種政策較少限制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傷害（即，因為官員將有更多的傷害自由），但我們發現此類政策與更少的傷害有關。

<

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受傷的比例最高他們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夏洛特的軍官禁止梅克倫堡使用 CED 或對嫌疑人施加衝擊力，除非他們具有抵抗力。諾克斯維爾的政策對使用的限制較少 CED 和撞擊武器，使這種力量可用於表現出防禦性的抵抗力。

摘要

最後，為了進一步總結代理商排名，我們評估了使用武力（同時也考慮了可疑抵抗的性質-參見第 197 頁）顯示在下面的第一列中，以及各機構在表現方面的綜合排名第二欄中顯示的嫌疑人傷害

(p. 199) 和軍官傷害 (p. 200) 下面列出了第三列中顯示的城市比較總體排名下面。因此，使用從使用力報告數據中收集到的這些多個指標，我們發現哥倫佈在使用武力方面表現最好。

強制使用嫌疑犯/職員受傷合力與傷害排行排名⁶²

排名⁶³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1-哥倫布

1-哥倫布

1-諾克斯維爾

2 街 聖彼得堡

2-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3-夏洛特-梅克倫堡

3-阿爾伯克基

2 街 聖彼得堡

3 哥倫布

3 波特蘭

4-諾克斯維爾

5 街 聖彼得堡

韋恩堡 5

5-阿爾伯克基

6-阿爾伯克基

6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6 夏洛特-梅克倫堡

韋恩堡 7

夏洛特-梅克倫堡 7

6 波特蘭

7 波特蘭

7-諾克斯維爾

韋恩堡 8

市民投訴數據

在第 7 章中，我們研究了公民投訴數據，以評估公民投訴的不同用法。強制八個機構採用的政策方法。為此，我們分析了外部投訴，重點關注與使用武力最相關的兩種投訴類型（即，無禮和使用武力指控）。我們在各個站點的分析著重於解釋投訴頻率，處理方式，紀律，與工作量指標的比較（即要求服務，舉報的犯罪，逮捕和武力），人員總數以及多變量比較。以下是對每個部分的主要發現的總結。

投訴頻率

我們首先比較城市因使用武力和失禮。接下來是城市在公民投訴百分比方面的排名使用武力和謹慎態度（與所有外部投訴相比）。摘要排名為根據我們先前在《公民投訴》第 7 章中提供的更詳細的表格。

使用武力投訴

在我們為期兩年的公民投訴研究期間，在我們八個城市的調查中，聖彼得堡使用武力的人數最少。

相反，我們發現公民對使用武力的投訴比例最高（在所有外部投訴）。對於這些排名，以及本節中其餘的排名，請降低數字反映出更多積極的結果（即更少的抱怨），而相反的情況適用於更高的排名。

排名：

1 街 彼得堡，2-阿爾伯克基，3-哥倫布，4-波特蘭，5-科羅拉多斯普林斯，6-諾克斯維爾，七-夏洛特-梅克倫堡，八-韋恩堡。

不禮貌的投訴

就外部投訴的不滿比例而言，阿爾伯克基在八個城市中排名最低。韋恩堡再一次獲得了基於外在投訴的百分比結果。

<

排名：

1-阿爾伯克基，2。聖彼得堡，3-波特蘭，4-夏洛特-梅克倫堡，5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6 哥倫布，7 諾克斯維爾，8 韋恩堡。

摘要

為了總結使用武力和不禮讓的金額，

表 9-8 在所有外部投訴中所佔的百分比一起。這使我們能夠評估城市在彼此之間的累積累積運價我們一項主要政策成果的條款-投訴頻率。毫不奇怪，堡壘韋恩（Wayne）排名所有城市中最貧窮的。在光譜的另一端是阿爾伯克基和聖彼得堡，在公民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

<

排名：

1-阿爾伯克基，1-聖彼得堡，三波特蘭，四哥倫布，5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6 夏洛特-梅克倫堡，7 諾克斯維爾，8 韋恩堡。

在詳細說明投訴的頻率之後，我們轉向檢查性格。在整個城市中，配置被分類為“持續”，“不持續”。“無罪”或“毫無根據”。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從城市角度比較城市。持續指控的百分比，我們注意到這是例外而不是常規。該主要發現如下：

<

從所有公民投訴的總和來看，我們發現在任何城市都沒有持續量達到 30%。也就是說，最持久的投訴（即最高的百分比）是在聖彼得堡找到的，而最少的是在哥倫布。

<

對於使用武力指控，持續投訴的比例非常高低，範圍從零（在韋恩堡和聖彼得堡）到大約 5%（在阿爾伯克基）。

<

關於不當指控，我們發現持續性比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高出五倍。結束）。哥倫布的持續性不滿投訴最少，而諾克斯維爾的最高。

投訴的紀律處分

接下來，我們研究了公民投訴指控的紀律處分。在比較中在城市中，我們側重於正規紀律（即書面譴責，停職和解僱）不那麼正式（即監督行動，指揮諮詢和“其他”）或沒有製裁。在所有城市中，我們注意到對公民投訴的正式紀律很少見。鑰匙調查結果如下：

<

就所有公民投訴而言，看到正式投訴並不奇怪紀律很少見（哥倫布大約只有 2%到聖彼得堡的 16 %），因為持續水平相對較低投訴。

<

導致某種形式的正式使用武力指控的百分比紀律極低。在整個城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韋恩堡和聖彼得堡沒有單人部隊申訴導致正式學科。從高端看，儘管每三十個指控中就有超過一個，是夏洛特-梅克倫堡。

<

就像針對持續投訴所指出的模式一樣，針對不禮貌導致（幾乎每個城市）有更多的正規紀律相比使用武力。與所有指控一樣，哥倫布的不滿投訴率最低的是某種形式的採取正式行動，而夏洛特-梅克倫堡（因為他們使用武力指控）最多。

有關服務請求，舉報的犯罪，逮捕和武力的投訴

除了從整體上說明投訴過程的頻率（和百分比）總的來說，在各個城市，我們都將投訴置於各種背景下機構工作量度量（如本章前面有關使用武力所做的那樣）。那是，我們審查了公民訴求中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服務，舉報犯罪，逮捕和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投訴

在評估使用武力時，與我們的工作量衡量標準有關的公民投訴（請參閱表 9-9）中，最有利的城市是聖彼得堡，該城市在平均水平上排名第一每 1,000 個服務呼叫，每 1,000 個第 I 部分索引犯罪，每 1,000 個逮捕和每 100 次使用武力報告。在光譜的另一端，因此排名最後的是科羅拉多累積分數最高的彈簧。

<

排名：

1 街 彼得斯堡，2-諾克斯維爾，3-韋恩堡，4-夏洛特-梅克倫堡，5 波特蘭，5 阿爾伯克基，7 哥倫布，8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不禮貌的投訴

每個工作量指標對不禮貌公民投訴的比較（請參閱表 9-10），再次表明聖彼得堡表現最好。另一方面，哥倫布累積使所有城市中的最貧窮者受益。

<

排名：

1 街 彼得堡，2-夏洛特-梅克倫堡，3-諾克斯維爾，4-阿爾伯克基，5 波特蘭，韋恩堡 6，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7，哥倫布 8。

摘要

在總結有關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外部投訴時，每個呼籲服務，舉報的犯罪，逮捕和使用武力，在這兩種情況下，聖彼得堡均排名第一所有城市。排名最低的兩個城市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哥倫布，兩者都更有可能受到外部使用武力和不禮貌的投訴，基於基於公民的工作量度量。

武力和謹慎人員總計

我們的下一個分析擴展了對公民訴諸武力和對軍官級別不禮貌。因此，我們檢查了組成每個城市的公民暴力和不禮貌投訴總數。我們還計算了每位官員的平均投訴數。對於這兩個部分，我們將分析限制在識別出個人官員的情況。

每個宣誓人員的投訴

在推算每位宣誓人員的投訴時，我們將個人人數除以包括外力和不正當指控總數的官員兩年期）由宣誓人員總數決定。

這表明各個城市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宣誓率最低在聖彼得堡發現了因公民武力或不禮貌而受到市民投訴的人員，而大部分（即最不利）是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發現的。

<

排名：

1 街 聖彼得堡，夏洛特-梅克倫堡 2 號，阿爾伯克基 3 號，韋恩堡 4 號，5-諾克斯維爾，6-哥倫布，七波特蘭，八-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軍官投訴平均值

我們擴展了官員分析以比較公民投訴的平均數量為了武力和謹慎，在至少有一個人員的人員之間任命了一個人員抱怨。表現最好（即平均投訴總數最少）的城市是韋恩堡，鑑於他們的外部投訴比例最高，這很有趣武斷和謹慎。發現平均最高的暴力和謹慎投訴總數在哥倫布，因此在這方面是最貧窮的城市。

<

排名：

韋恩堡 1-聖 2 彼得斯堡，3-諾克斯維爾，3-夏洛特-梅克倫堡，5-阿爾伯克基，6-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七波特蘭，八哥倫布。

多元分析

我們對使用武力和謹慎態度的外部投訴的最終審查，在控制公民因素的同時採用多變量方法解釋兩種類型的投訴（即性別，種族和年齡）。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隔離每個城市。我們的分析模型，結合了公民對武力和不禮貌的抱怨（就像我們在上一節中所做的那樣）使用 Fort Wayne 作為參考類別，關於公民投訴的匯總調查結果（見表 9-8）。我們的分析顯示：

<

雖然收到投訴的可能性在統計上低於 Fort 韋恩（Wayne）在所有城市中，阿爾伯克基和聖彼得堡代表了最與韋恩堡形成鮮明對比。就我們的公民控制而言，在我們的模型中統計上可區分。

摘要

最後，為了總結一些分析，我們結合了三個方面的排名對公民投訴進行單獨檢查，以揭示整個城市的累積順序。更多具體來說，我們添加以下城市排名：公民總人數和勸阻（來自表 9-8），兩個工作負載排名（結合表 9-9 和 9-10 的結果）以及外部每個宣誓人員的強迫和不禮貌投訴（來自第 209 頁）。我們的綜合排名揭示聖彼得堡在以下方面表現最佳（綜合得分為 3 分）公民抱怨武力和不禮貌，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則累積了最差的（即，綜合得分為 20）。

公民總力量/粘性綜合工作量測度排行

排行

1-阿爾伯克基

1 街 聖彼得堡

1 街 聖彼得堡

2-諾克斯維爾

3 波特蘭

3-夏洛特-梅克倫堡

4 哥倫布

4-阿爾伯克基

5-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韋恩堡 4

6 夏洛特-梅克倫堡

6 波特蘭

7-諾克斯維爾

7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韋恩堡 8

7 哥倫布

公民/宣誓誓詞公民力量/粘性排行
排行

1 街 聖彼得堡

1 街 聖彼得堡

2-夏洛特-梅克倫堡

2-阿爾伯克基

3-阿爾伯克基

3-夏洛特-梅克倫堡

韋恩堡 4

4-諾克斯維爾

5-諾克斯維爾

5 波特蘭

6 哥倫布

韋恩堡 5

7 波特蘭

7 哥倫布

8-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8-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民事訴訟數據

在第 8 章中，我們研究了民事訴訟數據，以評估這些數據如何反映在民事訴訟中。我們的八個機構使用了不同的政策方法。該企業被證明具有挑戰性關於部門數據收集協議不足和/或城市不願向研究人員發布此類信息。⁶⁴實際上，只有四個城市提供了可用數據（即，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波特蘭，韋恩堡和聖彼得堡）。在兩個城市（即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官員試圖向我們提供所需的數據，但我們找不到我們想要的格式。在其餘兩個城市（即阿爾伯克基和哥倫布），儘管越來越多的人反復提出要求，但城市檢察官拒絕提供這些數據超過一年。我們將它留給讀者來得出為什麼會如此的結論，以及未能披露此類數據可能對與這些發現有關的發現有何影響城市可能已經排名。

與部隊有關的訴訟數量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聖彼得堡提起的與武力有關的訴訟數量最少，在我們兩年的學習期間，韋恩堡的學習最多。城市排名如下如下（括號內提起的與武力有關的訴訟總數）：

<

排名：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N = 3），1-聖彼得堡（N = 3），3 波特蘭（N = 48），4 韋恩堡（N = 51）。

和解或敗訴的與部隊有關的訴訟數量

在我們調查期間，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解決或敗訴的與武力有關的訴訟數量最少

兩年的學習期間，波特蘭和韋恩堡的學習時間最多。城市排名如下如下（在括號中解決或敗訴的與武力有關的訴訟總數）：

<

排名：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N = 0) , 2-聖彼得斯堡 (N = 2) , 3-韋恩堡 (N = 20) , 3-波特蘭 (N = 20) 。

部隊相關訴訟的金錢支出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Colorado Springs) 因與武力有關的訴訟而獲得的金錢支出最少，在我們兩年的學習期間，而波特蘭則最多。城市排名如下 (括號中的貨幣付款) :

<

排名: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 0) , 2-韋恩堡 (\$ 113,899) , 3 街 彼得斯堡 (145,899 美元) , 波特蘭 4 位 (967,656 美元) 。

摘要

最後，如果我們比較這四個代理商在整個上面列出的三個民事訴訟指標 (強制訴訟，已解決/敗訴的強制訴訟和強制訴訟的金錢支出)，我們發現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發展最好。

民事訴訟綜合排名 ⁶⁵

1-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2 街 聖彼得堡

韋恩堡 3

4 波特蘭

第 10 章討論

當我們進行這個項目時，我們試圖回答一些巨大的經驗問題。在最簡單的層面上，我們想了解什麼是武力政策的使用在全美範圍內運營，哪些政策可帶來更大的利益結果。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將最後一章介紹給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社區。

警察管理員

我們國家郵件調查的結果表明，持續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納入武力政策的書面使用中。由此得出兩個主要發現研究。首先，大多數警察機構仍然使用武力連續法，大多數情況下線性連續體。其次，在戰術上沒有常用的戰術手段連續體 (即各機構動用各種武器和武器的地方)。當前使用武力連續體的機構的警察管理人員關於採用強制連續性的方法，應該安慰他們，因為他們大多數全國各地的同事都認為，使用武力連續性作為更好決策的指南製造。文章主要出現在貿易期刊上 (參見 Aveni, 2003; Peters and Brave, 2006, Petrowski, 2002 和 Williams, 2002) 試圖引起關於潛在使用連續體的負面影響並未導致許多機構放棄使用這種連續體。不幸的是，機構在連續體上放置不同的部隊選擇的地方是種類繁多，尤其是在化學噴霧劑和電子設備方面。

在回答第二個總體經驗問題 (即使用武力政策提供更有益的結果?)，我們依賴於對 8 個案例的深入研究收集的數據警察機構。要了解哪種不同的政策更好 (或最好)，是多方面的，維度，如第 5 章至第 9 章的概述中所述。最後，我們發現其中一些在我們的部門中，有一定的政策要比其他的要好，而對於他們可能還沒有取得的其他成果。回到詹姆斯·威爾遜 (James Q. Wilson) (1968) 的開創性工作中，警察局長認為經營組織時的各種受眾。一些酋長優先考慮軍官的關切，因此會對我們的結果發現感興趣，這些發現更多地與我們感興趣的事物相關官員對政策援助，明確性和指導性以及受傷的看法當與公民進行有力的接觸時，他們可能會收到。這種方法，可能那些認為他/她是“警察”的軍官們很愛戴酋長，這與 McGregor 更加一致 (1960) 認為是 Y 理論管理。另一方面，一些酋長可能會看待公民需要在考慮最佳政策和實踐時最為突出，因此會考慮結果，例如對公民的武力使用頻率，公民受傷以及武力/痛苦公民投訴是主要結果。最後，一些酋長可能會優先考慮行動部門的整體運作，使官員和公民的關注次要。

這種方法將更符合 McGregor 對 Theory X 管理的觀點，並且可能會重視組織結局，例如宣誓就職人員之間的抱怨，使用武力遵守政策和提起訴訟。接下來是對這些關注點的討論，酋長們可能會考慮，因為它們與我們的發現有關。

官員關注⁶⁷

一種警察行政管理風格，將軍官的觀點放在首位信念可能對巡邏人員調查的結果特別感興趣。對於例如，我們發現某些機構的軍官認為他們使用武力政策會影響公民/官員受傷，投訴和訴訟的可能性。諾克斯維爾的官員，阿爾伯克基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比其他機構的官員更相信他們的政策方法有助於減少公民/官員受傷。相反，模態調查回應顯示，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警官認為他們使用武力政策實際上增加了軍官受傷的可能性。有趣的是，這些機構還認為，與官員們的觀點相比，他們的政策過於嚴格。我們的其他機構。因此，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警官可能會覺得過度的限制性政策會增加受傷的風險。警察管理人員也可以參考涉及實際報告數量的分析與各機構在該機構中提交的武力報告總數有關的軍官受傷情況我們兩年學習期的課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哥倫布和波特蘭最好（即，軍官受傷最少），而諾克斯維爾和夏洛特-梅克倫堡則表現更差（即，受傷最多的軍官）。如果將這些實際人員受傷率綜合考慮根據有關軍官受傷情況的調查結果，夏洛特-梅克倫堡州的官員可能希望重新評估他們的政策方法。簡而言之，這個城市的巡邏人員不僅相信他們的政策使他們遭受更多的傷害，對熊的傷害數量進行統計分析這種感覺在現實中消失了。另一方面，當聖彼得堡軍官感受到他們的政策時導致更多的傷害，我們的分析確實是這種情況。實際上，聖彼得堡有受傷率第三低。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可能只是想見見官員打電話注意斷開連接，並確保他們的受傷率實際上相對較低。

市民關注

警察管理人員主要關注公民如何看待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可能對巡邏人員的感知和傷害較不感興趣，而對巡邏人員更感興趣我們的其他一些指標。例如，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諾克斯維爾的發展都很好考慮軍官多久使用一次武力來應對各種工作量措施（即要求提供服務，舉報的犯罪行為和逮捕）。換句話說，這些人員一般而言，城市依靠更少的力量來完成自己的任務。⁶⁸但是，波特蘭和堡壘韋恩軍官處於另一端。這些城市的官員傾向於依靠與公民相遇時採取更強制性的手段。結果，警察高管對於官員的頻率，對潛在的公民擔憂更加敏感使用武力，不妨考慮與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諾克斯維爾類似的政策，避開在波特蘭和韋恩堡採取的方法。

親警察管理人員可能考慮的另一個指標是公民投訴。

當我們比較公民對使用武力和謹慎的投訴時，有記錄的使用武力，聖彼得堡和韋恩堡的作戰情況最好。因此，管理員誰可能會通過與公眾接觸使用武力來優先處理公民投訴，

考慮採用這兩個城市的政策，儘管它們可能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夏洛特-梅克倫堡所認可的方法這個結果很差。有趣的是，注意到了感知行為的準確性和斷開連接在上述兩個機構中。也就是說，聖彼得堡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僅有的兩個機構，軍官對此做出的模態反應是，他們使用武力政策增加了公民投訴的可能性。有關投訴的行為數據表明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軍官們準確地感知了他們政策的影響力，而聖彼得堡不是。

部門整體關注

正如某些酋長可能會優先考慮官員或公民的關注一樣，管理風格，其他人可能會把部門的整體功能視為當務之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值得關注的結果可能是公民對一個監獄中宣誓就職人員總數的武力和不禮貌投訴部。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約有 10% 投訴中排名最高的人員，而波特蘭和科羅拉多州則排名最高彈簧的數量是其兩倍多半，是最糟糕的。作為警察的榜樣酋長們，聖彼得堡和夏洛特-梅克倫堡採取的政策方針似乎是這個結果比其他例子更具示範性。對於管理風格專注於關注點的高管而言，另一個結果是整個組織是我們對訴訟的分析。雖然這些數據僅限於一半我們的機

構，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全線表現最佳（即，武力訴訟的數量提交，結算/丟失和付款）。關於對警察最重要的兩個指標領導人（即訴訟和解/敗訴和賠付），波特蘭表現最差。在訴訟中使用武力，可能會引起警察局長的興趣，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和波特蘭根據我們的工作量衡量，在力的另一端。因此，在訴訟方面表現最好的組織通常較少依賴武力完成自己的目標，而在訴訟方面表現最差的部門，一般用力比較容易。

警察研究員

除警務人員外，本研究的另一個主要對象是研究社區。在這個項目的四年中，我們遇到了許多挑戰，教訓。下面我們重點介紹一些方法，這些方法可以幫助那些評價這項工作和/或計劃的人進行類似的研究工作。我們還解釋了我們的一些局限性項目，以及我們希望在將來使用武力研究方面看到的東西。

學習挑戰

在過去的四年中，我們面臨著許多挑戰。在這裡，我們針對這些挑戰提供一些思考。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為讀者提供更好地了解這類研究工作的“細節”；但我們也希望其他研究人員可能會從這些挑戰中學到一些東西，這可能對他們的研究有所幫助。我們最初的挑戰發生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的過渡階段。因為我們想選擇八個機構進行深入檢查，所以在全國範圍內經常使用的政策方法，我們無法識別並確保這些方法直到項目的第一階段（即代理商調查）完成。這創造了一個時間兩個階段之間的滯後。此外，我們還有嚴格的代理商選擇標準，減慢了這一過程。雖然方便抽樣的代理機構會容易得多（例如，選擇過去與我們合作過的地方機構或部門），我們會感覺採用的方法提供更有效的經驗和可靠的結果。一旦選擇了八個代理商，我們將面臨許多其他挑戰。我們在這裡重點介紹其中一些。首先，由於我們在該領域工作了兩年，人員流動有時是一個問題。在我們的一個城市中，最初是警察局長同意退出研究，我們必須尋求新任負責人的批准，確保繼續參與。與此相關，我們的主要代理商聯繫人或聯絡人已分配給我們有時在項目期間被重新分配，要求我們重新開始更換。

其次，由於該項目涉及大量數據元素，因此有時在參考某些內容時難以識別（或找到）“正確的人”我們尋求的信息。有時，這個人（書面上）不是您會想到的那個人可以幫助您獲取所需的數據。這裡的關鍵是四處走動適用，並且超出人員的部門清單來與該人聯繫誰有權訪問（並可以獲取）所需的數據。第三，因為我們要調查分配給巡邏的警察的人數任務，而不是選擇人員樣本，該項目的這一部分需要大量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意味著項目人員通常會在現場工作一周到十天以便在每個地理位置至少拜訪兩次巡邏班。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每天參加五次不同的唱名會議。儘管這樣的努力肯定很費力，我們感到所獲得的優勢（即有效和可靠的數據，極高的響應率）與其他人使用的某些其他調查方法不匹配（例如，放棄調查以擁有代理商人員分發，互聯網調查等）。

最後，當務之急是我們制定軍官部隊的“通用措施”，主體抵制（作為此贈款的基礎），因為代理機構並不總是使用相同的定義或術語。這通常需要我們返回並重新編碼這些根據部隊報告中的描述採取的措施。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必須要求硬拷貝，即使許多數據已通過電子方式捕獲。這減慢了項目，但再次應反映出我們對研究結果的信心。

研究局限性

如本報告全文所示，本研究具有許多優勢，也有許多限制。例如，我們的兩個主要數據來源是調查（即代理和巡邏人員）。鑑於在兩個分析級別上使用武力查詢都是很少，我們沒有確定的適用於我們研究的措施。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構建了自己的問題，即使已經對一些警察進行了預測試來自各機構的人員，一旦他們採取措施，我們的信心就會增強在其他研究站點之間複製。

除了我們的兩次調查面臨的局限性之外，使用官方記錄（這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項目數據）還具有許多缺點。

首先，官方記錄由“利益相關方”記錄下來，並與結果相關。對於

例如，軍官填寫使用武力報告的方式可能表明本身的行為或事後的事由證明（例如 CYA），而相同對於回憶起自己與警察之間發生的事件的事件的公民適用。所以，無論是記錄對公民使用的武力的軍官還是公民填寫針對官員的投訴，每個行為者對官方文件的看法各不相同表明警察與公民的遭遇如何發生的真相可能介於官員對事件的說明和公民的版本。同時，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必須考慮記錄行為記錄並不像研究人員那樣關注數據的完整性。例如，在有官員的情況下，根據官員使用力報告表，一系列的框來檢查所使用的每種力（例如，牢固的握持力，護送，壓力點，擊倒，拳打，踢等），在以下情況下，顯示的是較高水平的力量（例如，踢），而較低水平的力量（例如，牢固的抓地力），只有較高的力量才被檢查並記錄在案。同樣，官方文件中的實例（例如使用武力，軍官受傷，公民傷害等），其中向官員提供了“其他”回應類別，包括許多行為，我們發現有時在公開場合會有進一步的解釋結束了時尚，而在其他時候，盒子只是被選中“其他”。後一種方法沒有為我們提供了將“其他”重新編碼為行為的離散分類的機會。另一個限制涉及確定內部力和阻力的時間順序個人接觸，這是先前作品中討論的一個問題（Terrill, 2001； Terrill 和 Mastrofski, 2002）。官員在其敘事描述中提供的詳細程度有時，我們無法確定阻力和受力的行為的具體順序。

因此，如第 6 章所述，根據我們對使用政策範圍內的武力。同樣，提起投訴的公民也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例如官員，而不必擔心建立高質量的官方數據。例如，有公民普遍向警察投訴而沒有具體官員的情況命名，這影響了我們計算精確的軍官級別總數的能力。這迫使我們從我們的分析中排除這些投訴（在我們的其中一個站點中是相當可觀的）第 7 章。

附加數據限制是巡邏以外各個組織層的功能官員和公民文件。在某些情況下，缺少正式記錄或缺少我們無法進行全面的數據分析。例如，沒有這些城市捕獲了可疑的財富或舉止，這兩個事實已被證明是相當公平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的一致預測指標。我們的一個研究站點也未能抓住公民使用武力形式的種族，這是警察使用武力的另一個關聯。進一步，如第 8 章所述，民事訴訟數據僅在以下四個案例中提供並可用：

八個城市。

最後，儘管我們相信本研究中的八個中型代理商提供了很好的概括性，我們的發現可能無法轉化為所有類型的警察部門。也就是說，該項目的結果可能無法推廣到較小的農村地區機構或非常大的城市地區，其中動用武力政策和結果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

未來研究

最後，我們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建議。首先，研究人員應該繼續研究哪種政策似乎效果最好。如本報告全文所述，最有效的方法實際上取決於一個觀點和一個指標考慮。因此，未來的研究應確定此處報告的發現是否複製到其他設置。此外，研究人員可能會針對如何根據眾多不同的指標對代理商進行排名。其次，我們發現大多數代理機構在其書面政策中都使用強制連續性並且他們壓倒性地選擇了線性設計。謹此進一步詢問。例如，有人可能會問警察高管“為什麼”他們經常採用這種方法，感知的利弊。或者，可以檢查為什麼放置就戰術部署而言，化學噴霧劑和 CED 似乎構成最大的困難。第三，研究人員必須對測量和編碼的難度保持良心通過使用官方記錄來使用武力行為，尤其是使用武力報告。我們創造了軍官部隊和公民抵抗的共同措施，將強烈建議未來研究人員考慮某種形式的類似方法。不採用一般措施跨機構進行比較的能力成為一項嚴峻的挑戰，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任務。最後，關於收集數據，尤其是從警察部門收集數據不應該害怕“變髒”。易於收集的數據始終是一項獎勵，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情況可能無法提供最可靠和有效的信息。因此，一個好的研究者在獲取最高質量的數據與不耗盡數據之間經常會遇到一種平衡的行為。

不同的）研究機構，以說服部門不必收集某些數據編輯，以調查一線官員的政策，複製照片並

從硬拷貝文件編碼（手動），到與數據分析員坐在一起，試圖弄清楚如何將“數據字段”轉化為單個數據，並提出類似的比較指標在過去的四年中，這無疑是我們更方便地前往各個地點的方式。這項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必須在實地進行，而實地訪問則需要持續進行和實質性的工作！在我們的經驗中，研究人員經常會被跟踪找出如何輕鬆獲取數據（例如，經常是不完整的電子數據），與警察局長，或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取下一份諮詢合同。簡而言之，我們懇求我們的研究同事加倍努力以獲取最佳數據可能。

確定您的代理機構使用的“連續體”類型。請明白不存在正確或理想的連續體設計。而是代理商全國各地只喜歡一種設計，而不是另一種。幫助指導您，我們提供了當前一些連續體設計的基本示例存在，但我們希望您的代理機構的連續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例如，根據阻力/力量選項的數量和位置）。

考慮到這一點，請圈出以下五個連續體設計（AE）中的一個與您的代理機構相似（但不一定完全匹配）連續統一體。如果您機構的連續體設計與以下五種之一不同例如，我們要求您圈選 F 並協助我們了解您的政策。

[A]線性設計（例如，台階，梯子，樓梯），**沒有**圖形表示

例如：

公民抵抗/威脅級別對應軍官部隊攻擊性（致命）

致命的力量攻擊性（非致命）

驚人的演習，電氣設備活性

疼痛順應，化學噴霧

被動口頭命令，空手合規

在場，言語方向

[B]的線性設計（例如，步驟，梯子，FLETC 模型）**WITH** 圖形表示

[C]部分車輪/圓形設計